中国军事通史 第四卷

秦朝军事史

目　录

第四卷　秦代军事史

书末附图：

3、秦军南平百越示意图

4、陈胜吴广起义发展进攻示意图

5、巨鹿之战示意图

绪　论

《秦代军事史》，上承战国，下启西汉，共7章、27节，约17万字。其基本内容为秦代的战争、军制、国防以及武器装备、军事思想和军事人物。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在全面客观地综述秦代军事历史发展过程的基础上，阐明秦代军事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基本特点及其在中国军事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研究、总结秦代军事史的经验和教训，吸取精华，弃除糟粕，“古为今用”。

研究秦代军事史，首先必须弄清秦代在历史上所处的特殊地位，而后才能对各种有关的军事问题做出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和评价。秦代，自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建立秦朝，至秦二世三年（前207年）秦朝灭亡，首尾总计不过15个年头，仅仅是人类历史长河中极其短暂的一瞬。但是，这一瞬却非同凡响，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大统一局面，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分水岭。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文明的民族之一，在夏、商、周三代的奴隶制时期，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已达到相当水平，出现了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① 的局面。但是，国家集中、统一的程度还不高，有许多邦国存在。至春秋战国，随着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兼并、争霸之战不已。直到公元前221年，才在秦王政的领导下实现空前大统一，创建了中国历史上，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的、封建统一国家——秦朝。从此开创了中国历史大一统的新纪元，奠定了大一统的政治制度。其深远的历史影响，下及汉唐明清，长

① 《诗经·小雅·北山》。

达二千余年。正如前人所云："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① "秦也者，古今之界也。自秦以前，朝野上下，所行者皆三代之制也。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② 甚至不少学者认为，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某些称谓，诸如"支那"、"赛尼"、"希尼"等等，也都是由"秦"的音译演变而来。秦代在历史上所处的承前启后的地位和特点，不仅仅体现于政治领域，也同样体现于军事领域，表现于战争、军制、国防、军事学术等各个方面。

秦代的战争较先秦有很大的发展。它不同于夏、商、周时期部族、方国、诸侯间的征服战争，也不同于春秋时期的大国争霸战争和战国时期的七雄割据、兼并战争，而是随着时代的前进，战争的性质、规模、类型都具有新的时代特点，出现了我国封建社会中大规模统一战争、大规模民族战争和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争。

秦代统一战争即秦灭六国的战争，始于秦王政十一年（前 236 年），终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 年），以秦的全面胜利，韩、赵、魏、燕、楚、齐六国的彻底灭亡，国家的空前大统一而告结束。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统一战争，它不仅在规模、时间、空间上都远远超过了以往历次战争，尤其重要的是在战争目的上发生了新的飞跃。以战国时期的历次战争为例，战略目标大者为兼并，小者为蚕食；而秦灭六国的战争则不同，其宏伟的战略目标是"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③，从而把封建割据、兼并战争发展为封建统一战争。没有统一战争的胜利，就不可能开辟大一统的新纪元。当时新生的封建制度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强烈要求政治上的统一，而七雄并立、诸侯割据的存在，正是历史前进的一大障碍。统一战争恰恰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这一客观要求，对于促进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社会发展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秦代军事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统一战争的最

---

① 谭嗣同：《仁学》卷上。

② 恽敬：《大云山房文稿·三代因革论》。

③ 《史记·李斯列传》。

大特点就是有多政权、多势力并存，以一方消灭其他各方为根本目的，因而需要高超复杂的战争指导艺术。秦统治者在以一敌六的形势下，运用“连横”的谋略和远交近攻的思想，成功地对六国采取利用矛盾、分化瓦解、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策略，从而保证了统一战争的胜利。这一经验后来广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借鉴，成为历代战争中极为重要的策略思想和指导艺术。

秦代的民族战争主要的有两次，即秦始皇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前215～前214年）北击匈奴的战争和秦王政二十五年至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22～前212年）南平百越的战争。前者兴师30万，以匈奴远遁、收复河南（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一带）、开地千里，继之以大修万里长城而结束；后者陆续增兵至50万，以平定百越、徙民岭南、设置闽中、南海、桂林、象郡而告终。这两次民族战争不仅其规模和成效都远非先秦所比，而且战争的目的也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如果说先秦华夏族同周边少数族的冲突基本上是为了争夺生存空间，那么在秦始皇统一中原、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之后，北击匈奴、南平百越则是为了统一边疆、开拓边疆。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各民族间的交流、合作与融合是历史的必然，中原的统一以及中原和边疆的统一也是历史的必然。而“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①。当时匈奴正处于向奴隶制转化的阶段，蒸蒸日上，不断南下，对秦王朝的边防构成重大威胁。秦王朝是封建统一国家，急欲扩大自己的统治，“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②。因而秦匈之战成为不可避免，其阶级内容为新兴地主阶级对正在形成的新兴奴隶主阶级的战争，在客观上属于封建统一国家保卫边疆、开拓边疆、统一边疆的战争，对于保护中原经济文化和促进内地与边疆的统一都具有重要意义。至于南平百越，则更是统一战争的继续。当时百越大

---

① 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

② 贾谊：《过秦论》。

部分尚处于原始部落阶段，没有统一的政权存在。他们自古以来与中原交往密切，并在战国时成为楚国的势力范围。因“秦始皇并楚，百越叛去”①，遂导致10年之久的秦越战争。通过这场战争统一了岭南广大地区，对祖国的统一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在北击匈奴和南平百越的战争中，秦统治者采取的战略方针各不相同。针对匈奴游牧经济生活，飘忽不定，军事行动多游击袭扰，地理环境寒苦，不利农耕等特点，采取以防御为主的方针，即在军事打击、解除其威胁之后，全力加强边防建设，以利保护中原的安全。针对百越地理环境适于农耕、许多部族处于半开化的特点，采取以开拓为主的方针，即在全面军事占领之后广设郡县，实施同内地一样的统治，并通过大量徙民进行开发。这两条方针在秦代都取得了成功，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经验。

秦代农民战争即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领导的大起义，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其来势之猛、规模之大、斗争之激烈都是空前的，不到3个月革命烈火即燃遍大河上下、长江南北，不到3年就彻底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当时我国正处于封建社会上升发展阶段，大起义之所以爆发，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秦朝的“暴政”，即无穷的徭役和残酷的刑罚，使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简单再生产难以维持，广大劳动人民陷入苦难的深渊，从而激化了人民群众同地主阶级的最高代表——封建统治集团的矛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农民战争的任务不是更新社会制度，而是排除历史前进的障碍。秦末农民大起义恰恰抓住了当时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主要障碍，提出“伐无道，诛暴秦”②的政治口号。这一口号成为农民大起义的政治纲领，不仅动员了广大农民群众，而且也动员了其他各阶级、各阶层、各地区的反秦势力，最大限度地孤立了秦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从而保障了军事上的最后胜利，结束了秦王朝的“暴政”，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这一历史经验，对后

① 《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

② 《史记·陈涉世家》。

世农民起义战争也具有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秦代的军制，是先秦军制，特别是战国军制的继续，尤其是商鞅变法后秦国军制的继续。但在全国统一后新的历史条件下，与大一统的政治、经济制度相适应，秦代军制更加显示出其开创性的地位和意义。如果说商鞅变法后秦国军制的最大特点是“上首功”①，“利禄官爵抟出于兵”②，“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③，那么，统一后秦代军制的最大特点，则是确立高度集中统一的军队领导体制，从而维护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周代的所谓“天子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卿大夫“百乘”④制度，实质上就是各级奴隶主贵族都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这种军权分立的状况，随着西周的灭亡、东周的衰落和诸侯的强大，从而加剧了春秋战国长达五百余年的争战。历史经验表明，政治和军事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政治上的统一就不可能有军事上的统一，而没有一个强大统一的军队，就不可能有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秦代正是在这方面首次提供了重要历史经验。

秦代鉴于历史上诸侯“相攻击如仇雠”、“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⑤ 的教训，在统一天下的当年秦始皇即定下果断的决策，宁愿以“子弟为匹夫”⑥而废除了历史上沿袭很久的分封制，从而强化中央集权，消除军队分立的政治基础和历史传统，防止“立国”、“树兵”⑦的隐患。与此同时，还确立了加强军队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和措施，把军权高度集中于封建国家的最高代表——皇帝的手中。武装力量的征发、调遣和动用之权直接属于皇帝，没有皇帝的玉玺、虎符和竹节，任何人都调动不了50人以上的部队。太尉虽为全国最高武官，但若不得皇帝的委任，则无权

---

① 《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

② 《商君书·赏刑》。

③ 《荀子·议兵》。

④ 参见《汉书·食货志》。

⑤⑥⑦ 《史记·秦始皇本纪》。

统率和指挥军队，实质上只是皇帝的参谋、顾问和助手之一。战争的决策权也属于皇帝，而负责战场指挥的将军则由皇帝任免，战事一结束即将还于朝，兵归郡县，将不得专其兵。同时在武装部队中设置相应的监察机构和监察官员，控制和掌握部队的行动，以确保其对皇帝和国家的忠诚。与各级政权组织相适应，上自中央政府、下至地方郡县、直至基层的乡、亭、里，层层都设有主管军事工作的机构、官员或分工负责的专人，从而加强对全国武装力量的统一领导。与当时以封建小农为主体的经济基础相适应，推行统一的郡县征兵制，先以适龄青年服“正卒”兵役，训练标准的“材官”（步兵）、“轻车”（车兵）、“骑士”（骑兵）、“楼船士”（水兵），两年后转为预备役，随时应召参战，从而做到寓兵于民，农战结合，预备役与现役结合，既有强大的常备军，又有雄厚的兵源。与全国统一后面临的形势、任务相适应，将全国武装力量区分为中央警卫和作战部队、边防守备部队、地方郡县部队，从而履行巩固国家政权、保卫国家安全、维护国家统一的责任。

通过上述制度和措施，秦代在我国历史上建设成第一支空前强大而统一的封建国家军队，对于促进和发展祖国的统一事业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这是秦代给后世留下的极为重要的历史经验。后世封建统治者凡是忽视军队统一建设的，诸如西汉的七王之乱、西晋的八王混战、唐代的藩镇割据等等，无不给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历史的发展造成各种不同程度的危害。

秦代的国防，更具有承前启后的开创意义，其成就之伟大、业绩之辉煌、影响之深远都是前无古人的。在秦代以前，虽然诸侯国防御工程的大量设施已在历史上出现，但由于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尚未形成，所以还谈不上有统一的国防。建设一个强大、统一而巩固的国防，在我国历史上正是从秦代开始的。其主要成就有以下几点：

一是大规模的边防军事筑城。为了防御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骑兵的南下，秦王朝动员了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战国时代秦、赵、燕等国所筑北部边防长城的基础上，修筑了新的、被

世界誉为人类古代文明奇迹之一的万里长城。万里长城同大量的关、塞、亭、障相结合，同大规模的边防驻军相结合，遂形成一个强大、巩固、统一的边防防御体系，对于保障秦王朝的安全和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是大规模的军事交通建设。秦灭六国后，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和进一步统一边疆，在“决通川防，夷去险阻”① 即拆除各种诸侯割据设施的同时，立即在全国开始统一的战略交通的建设。先后修建了由首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通往全国各战略要地及北部边防各军事重镇的驰道，由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通往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的直道，由岭北通往岭南的新道，由今四川南部通往今云贵高原的五尺道，开凿了连接湘水与漓水的灵渠。通过这些大规模的工程，将秦代的都城和内地与边疆有效地联系在一起，极大地加强了国防，促进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

三是大规模的战略储备。秦代以厉行耕战政策而致天下统一，对粮食的战略储备极为重视。上自中央，下至郡县，层层都有负责粮食储备的机构和设施，形成了储备体系。在各级普遍储备的基础上，尤其重视各个战略地区的重点储备，如关中地区有著名的咸阳仓，中原地区有著名的敖仓，巴蜀地区有著名的成都仓，东部沿海地区有著名的琅邪仓，等等。这些重点储备，成为秦代国防建设中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对于秦代进行大规模统一和开拓边疆的战争和开展大规模国防工程建设，都起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四是大规模地开发与建设边疆。秦代在北逐匈奴、南平百越之后，除采取重兵戍边和筑长城、修道路等措施外，还采取一项徙民实边的重大措施。在北方对于从匈奴占领下夺回来的河套地区和沿黄河新设的 44 县，都迁去了大批的民众。在南方则设置了更多的郡县，先后徙民数十万到岭南，与岭南人民杂居共处。这一措施既巩固了边防，充实了人力、物力，又促进了边疆地区的

---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二年碣石刻辞。

开发和建设，具有深远而重大的历史意义。

秦代的军事思想，也同样比先秦时期有所发展和前进。秦代存世时间虽然短暂，加之秦始皇焚书坑儒，因而未见有兵书传世，但军事思想归根结底是在战争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秦代的大规模统一战争、大规模民族战争和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争的实践，都推动了军事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例如，在秦代统一战争和南平百越的战争实践中，即体现了多对象、多方向、多战场情况下的战略思想和作战指导艺术。前者以关东六国为作战对象，在多方向、多战场实施作战，运用军事、政治、外交相结合的综合手段，通过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而取得全面胜利；后者以五路大军并进，席卷岭南，以空前规模的分路合围而取得平定百越的胜利。这种战略思想和作战指导艺术是先秦所没有的，先秦（尤其是战国）有过许多大规模的战争和军事集团之间的冲突，但没有像秦代这样的多对象、多方向、多战场的战争实践和战略指导。又如，在秦末农民起义战争中，直取咸阳，分兵略地；当秦军集中兵力发起疯狂反扑和镇压时，许多义军采取流动、游击的作战形式，处处打击、疲惫、消耗、削弱敌人，使强大集中之敌顾此失彼，常常陷入被动和遭受挫败；而起义军则此伏彼起，到处点燃反秦斗争的烈火，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直至最后决战而夺得胜利。这种流动作战的形式，是先秦所没有的，实质上就是历史上的人民战争和游击战争，并成为后世人民群众反抗封建统治者的重要武装斗争形式。

秦代军事史不仅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正面经验，而且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军事活动超越了国力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毫无疑问，秦代在统一、开拓边疆的战争中和国防建设中所取得的各项成就都是空前伟大的。但是，这些成就是在国力所不能承受的条件下，以人民所无法忍受的牺牲为代价而换得的，因此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秦代结束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的战乱局面后，人民所渴望的是休养生息，社会所急需的是和平稳定的发展，而秦代统治者在东灭六国之后所给予人民的

喘息时间则过于短暂，前后不到 7 年。随即一方面大兴阿房宫、骊山墓等骄奢淫逸的土木工程；一方面又展开大规模的统一、开拓边疆的战争和大规模的国防建设工程，并以酷刑苛法为手段确保这一切的完成，从而把全国人民重新投入苦难的深渊。当时秦代总人口不过 2000 万，而北击匈奴用兵 30 万，南平百越用兵 50 万，修阿房宫、骊山墓用众 70 万，筑长城、修驰道所用民力也不下数十万，几乎把壮劳力和物力、财力都征调殆尽，终于导致秦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和秦朝的灭亡。秦亡于暴，其军事活动超越了国力所能承受的条件是构成秦代各种暴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因而也是导致秦代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人类的全部军事史表明，军事活动和国防建设在任何时代都必须以一定的国力(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和科技力等等）为基础，否则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事与愿违。这是一条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秦代以穷兵黩武、急功近利的反面教训揭示了这一规律，这和它的许多正面经验一样，都是军事史上宝贵的前车之鉴。

如上所述，研究秦代军事史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但是，由于秦代的历史极短，所保存下来的文献资料极少，给研究秦代军事史带来不少特殊困难，致使对许多重大问题都难以做出翔实的考辨和准确的判断。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故在研究方法上特别注意到以下四点：

一是秦朝与秦国结合研究。秦朝历史很短，秦国的历史却很长，秦朝是由秦国发展、变化而来，特别是经过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全面奠定了秦朝统一的基础，秦代军事史中的许多重要问题，诸如秦代的军制、武器装备等等，只有结合研究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制度、政策和特点，才能有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认识。还有一些具体问题，如秦代军队的军功爵制，离开《商君书·境内》篇的有关材料就无法搞清；只有把这些材料同其他有关材料结合起来，才能对军功爵制的性质、内容、作用、意义、发展、变化做出适当的阐述。因此，研究秦代军事史必须同研究秦国历史的某些情况相结合，要做适当而必要的追溯，这是二千多年来研究秦

代历史的一个重要方法，当然也是研究秦代军事史的一个重要方法。

二是秦代与汉代联系探讨。汉承秦制，从各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秦代基本制度。许多问题由于秦代时间过短，史料阙如，难以定论，但却可以从汉代史料中窥见秦代的一斑甚至全豹。汉代不仅直接继承了秦代的基本制度，而且汉初对秦代的历史作过专门的分析总结，诸如贾谊的《新书》、陆贾的《新语》以及《淮南子》等，都论述和记载了不少有关秦代军事史的问题；至于《汉书》则所记更多，有些秦代史料难以解决的问题，从汉代史料中则可做出相应的分析探讨。例如，在秦代中央政府中到底有没有太尉一官，今人颇有一些怀疑①，因为在秦代史料中无法找到确定无疑的直接证据。但通过对汉代史料的分析，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汉初刘邦首以卢绾为太尉，继之者有周勃、灌婴、周亚夫、田蚡等人，而《汉书・百官公卿表》却明确地说："太尉，秦官。"《汉官仪》也记载说："太尉，秦官也，武帝更名大司马。"②可见太尉一官并非刘邦所首创，乃是汉承秦制而来。所以，研究秦代军事史时有许多问题必须同汉代有关情况联系起来探讨，这是很重要的，也是历来治秦史的传统方法之一。

三是历史文献与出土文物相互印证。近二十几年来，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秦代与秦国的地下文物和地下竹简有不少新发现，如举世闻名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以及云梦秦简等等，都给研究秦史提供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包含有丰富的军事内容，填补了二千多年来不少空白。研究秦代军事史应特别注意这些新发现的史料，将新旧史料做综合比较的分析。例如，关于秦代兵役的起役年龄问题，新旧史料即颇有不同之处。《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曾载，秦昭王"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参战，说明起役年龄为 15 岁。云梦秦简所载《编年纪》中的主人公喜，却在 17 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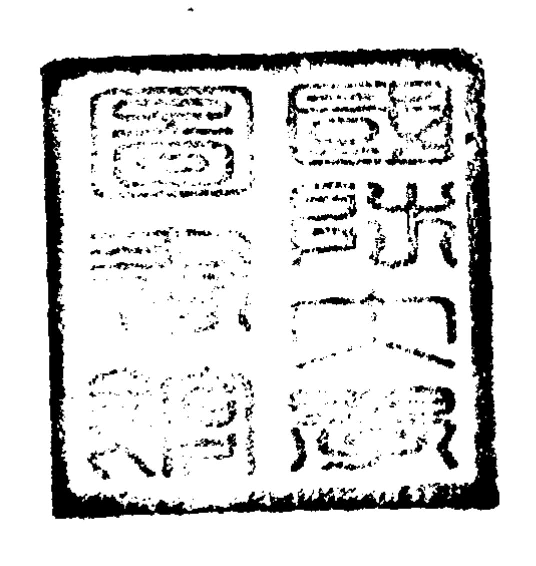
---

① 参见《秦汉官制史稿》第一章第四节。

② 《汉官六种》第 122 页，中华书局 1990 年 9 月版。

时傅籍，说明起役年龄应为 17 岁。很显然，二者的区别不是时代不同所致，而是因情况不同而异，前者系特殊性的征调，后者乃一般性的法定起役年龄。值得注意的是，特殊性征调不仅存在于统一前的秦国，更存在于统一后的秦朝。由此可知，既有法定的起役年龄，又有不受法定年龄限制的特殊征调，一切依战争的需要为转移，这就是秦代兵役制度的重要特点之一。兵役问题如此，其他问题也是如此。只有对新旧史料做相互印证的比较分析，才能更客观地反映事物的本质。

四是思想材料与实践材料综合分析。撰写秦代军事史的最大难点，莫过于军事思想问题。秦代有赫赫武功，国防建设成就斐然，但在军事思想理论上迄今未见有兵书传世，有关人物的军事言论也如吉光片羽，寥若晨星。在这种情况下，要真正反映出秦代军事思想的时代特色和本质，就必须把有限的思想材料和丰富的实践内容综合起来分析研究。诸如东灭六国反映了什么样的战争指导艺术，北筑长城反映了什么样的国防思想，南平百越反映了什么样的战略方针等等，都寓有深刻的理论思想在其中。因此，以主要军事人物、主要军事言论和主要军事实践活动为依据，才能总结出秦代军事理论所特有的主导思想。



第一章　秦的由来和发展

自春秋至战国，我国社会经历五百多年的发展变革和激烈的诸侯争霸、割据、兼并战争，奴隶制度全面崩溃，新生的封建制度得以确立，历史大统一的条件渐趋成熟。公元前 221 年，在秦王政的领导下，取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建立起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统一王朝。从此，开创了中国历史大一统的新纪元。

秦代的统一和后世历代王朝不同，既不是经过农民起义战争后的改朝换代，也不是少数民族自边陲进入中原而混一华夏，它是在氏族部落的基础上，经过自身的长期发展奋斗，逐渐地由小而大，由弱而强，由落后而至先进，由称王一方而至完成统一大业。因此，在阐述秦代军事史时，有必要对统一前的秦人和秦国的历史，尤其是军事上的发展情况，做些简单介绍和交代，以利窥其全貌，知其始终。

第一节　早期的秦人

秦人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华夏族的组成部分之一，并参与了我国历史的早期活动。根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秦人的祖先是“帝颛顼之苗裔”，其著名的首领伯益（即大费，亦称伯翳、柏翳），曾经和大禹共同平治水土，受到帝舜的赞扬。又曾为帝舜主管畜牧业，六畜兴旺，“鸟兽多驯服”，因而被帝舜“赐姓嬴氏”。这就是秦人祖先嬴姓的由来，也是古代东方其他一些部落嬴姓的由来。根据《孟子·滕文公上》的记载，伯益对开创古代农业生产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史记·夏本纪》中还记载说，禹即位后曾经“举益，任之政”，临死前又曾经“以天下

授益"，但因"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遂由夏启建立了夏朝，伯益没有得到天下。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传说，都和古代畜牧业有关，诸如"伯益知禽兽，子孙不绝"①，伯益"为舜朕虞，养育草木鸟兽"②，"伯翳综声于鸟语"③，等等。这些传说虽然未可尽信，但它表明，秦人祖先是我国古代开化很早的一个氏族部落。他们深受中原文化的哺育，过着以原始狩猎为主的生活，很善长于畜牧业经营，同时又有一定的农业生产知识，同农业经济有一定的联系。正是这些情况和条件，给秦人祖先后来的长期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随着夏朝的建立，伯益失去了自己的权力，其"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④，继续过着氏族部落的生活。自夏末商初开始，秦人祖先又活跃起来，其首领费昌"去夏归商，为汤御"⑤，参加了历史上著名的商汤灭夏桀的鸣条之战。此后，他们始终效忠于殷廷，"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⑥。其中有一部分秦人的祖先"在西戎，保西垂"⑦，即在今陕西渭河流域的中游一带同戎人杂处，守卫着殷王朝的西部边陲⑧。这部分人中最著名的首领是蜚廉及其子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⑨。后来周武王伐纣，殷朝灭亡，恶来被杀，蜚廉为殷朝的灭亡而殉死。

西周建立后，原来的殷人及其所属的氏族，包括秦人祖先在内，都变成了周王朝的氏族奴隶。居于渭水中游的嬴姓氏族和居于东方的一些嬴姓氏族被迁往周朝的西部边陲，先后在今甘肃天水一带定居下来，这便是春秋战国时秦人的直接祖先。他们在周

---

①② 《汉书·地理志下》。

③ 《后汉书·蔡邕传》。

④⑤⑥⑦⑨ 《史记·秦本纪》。

⑧ 根据郭沫若著《两周金文辞大系·秦公殷铭文考释》，西垂"泛指西方边陲"；根据李学勤著《殷代地理简论》，商王朝外服范围"其西界达渭水之中游"。故这里将西垂定为今陕西渭河中游一带。

王朝的统治下，长期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但因他们保有中原文化的传统并富有游牧生活养成的善于驯马驾车和勇敢战斗的特长，后来渐渐被周王朝所重视。蜚廉的四世孙造父，以善御得幸于周穆王，曾为穆王驾车西巡，东归时日驰千里，平灭了徐偃王的叛乱，因而立功，得赐赵城（今山西洪洞北赵城镇西南），由此改姓赵氏，成为战国时赵国统治者的祖先。恶来的五世孙非子，由于“好马及畜，善养息之”①，得到周孝王的赏识，专门为周王朝养马，结果“马大蕃息”②，被周孝王封为附庸，令其“邑之秦（即秦城、秦亭，在今甘肃清水县东北），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③。从此，历史上才正式有了“秦”的名称。所谓“秦”，《说文解字》说：“伯益之后所封国，地宜禾，从禾舂省。一曰秦禾名”。由此可知，“秦”字和农业生产是密切相关的，“邑之秦”，即在秦这一带地方立邑定居，做周朝的附庸，以抗西戎。

自非子受封之后，秦人在同西戎长期的斗争中发展。当时戎人的势力非常强大，于公元前771年攻入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沣水东岸），周幽王被杀，西周沦亡。这时，秦襄公率兵救周，力战有功，同其他诸侯一起将戎赶出了镐京。次年，周平王为了逃避戎人的进攻，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秦襄公又率兵护送。于是，周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赐之被戎人占领着的岐（今陕西岐山县东北）以西之地，令其赶走戎人后在这里建国。至此，秦襄公于公元前770年正式建立起奴隶制的诸侯国，完成了秦人由氏族制度向阶级社会的过渡，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以上就是早期秦人的基本情况。他们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建立起正式的国家和军队，但却早已形成颇为可观的氏族武装，并同其他氏族发生了大量的武装冲突。秦人的氏族武装，不像夏、商、周中原王朝正规军队那样先进，是全体氏族成员兵民合一构成的，不是独立的军事组织。但它却有自己的鲜明特点：一是尚武精神很强，在长期以狩猎为主的生活中形成了勇战善斗的

---

①②③《史记·秦本纪》。

传统，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惜前仆后继，英勇牺牲；二是凝聚力很强，因同一定的农业经济相联系，过着相对定居的生活，不像戎人部落那样高度分散和流动，而有较好的集中性和统一性，能够在作战中发挥其团结对敌的力量；三是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很强，因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虽久处边陲与戎人杂居而没有被同化，对待中原王朝同戎人的关系上总是倾向于前者，为保卫殷、周两朝的西部边陲，从而为保卫中原地区和关中地区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支早期秦人的氏族武装，就是后来秦国军队的前身，为秦军的发展奠定了许多基本的特征和传统。

第二节　春秋时的秦国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是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这时，周天子的权威江河日下，不能号令诸侯；齐、晋、楚、吴、越等国相继争霸中原，战争连绵不断；中原地区的奴隶制已濒临崩溃，各种社会改革方兴未艾，逐步开始向封建制过渡。就在这样的历史潮流下，秦国获得两次突飞猛进的发展，并经历一个由弱而强、由盛而衰的过程。

一是在秦文公（前765～前716年在位）时代，大举东进，取得对戎人作战的重大胜利，"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①。这一胜利对于秦国的历史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岐，是周人的故居，即古代的周原，是关中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秦人占领这一地区后，既获得了极优越的自然条件，又获得了具有丰富文化知识和农业生产知识的"周余民"。从此，秦国的经济生活便很快地由以畜牧业为主过渡到以农业为主。与此同时，秦文公还逐步建立起奴隶制国家的基本法律和制度，如文公十三年（前753年）"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②，文公二十年（前746年）"法初有三族之罪"③等等。这样，

①②③《史记·秦本纪》。

随着对戎人作战的胜利，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初步奠定了国基。

二是在秦穆公（前659～前621年在位）时代，把奴隶制的秦国推进到全盛时期。穆公勤于求贤，重用百里奚、蹇叔、由余等谋臣，先后制定“东进、西进、南进三大政策”①。在东进中，曾于公元前645年的韩原（今山西河津、万荣间）之战俘虏晋惠公，迫使晋国献出河西（今山西、陕西两省间黄河南段之西）之地；但在公元前627年的崤（今河南洛宁西北）之战败于晋军，东进受阻。西进曾取得巨大胜利，“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②。南进曾攻占鄀国（在今河南淅川南），至穆公去世停止下来。穆公时代极大地扩展了疆土，一跃成为与晋、齐、楚相匹敌的大国，其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都比较雄厚。公元前636年秦穆公送晋公子重耳（即晋文公）返国继承君位时，派出的护卫部队有“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卒五万”③，说明秦军既有强大的车兵，又有强大的步兵，并有少量的骑兵，而当时中原各国，尚无骑兵出现。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请粟”于秦，秦国的运粮车、船相继千里不绝，被称为“泛舟之役”④，可见秦国的农业经济已相当发达。

穆公时代的秦国虽然繁荣强盛，但整个奴隶制度在中原地区已濒临崩溃，在秦国亦由盛而衰。穆公一世英明，临死时竟以177人殉葬，其中包括一些高级贵族子弟在内，引起国人对奴隶制的强烈不满，以致人们由此认为“秦不能复东征也”⑤。此后秦国长期停滞不前，同晋的战争常常失败，但竭力维持着自己的大国地位。直至春秋末吴军破楚入郢（今湖北江陵），秦出兵车500乘挽

---

① 马非百：《秦集史·国君纪事七》。

② 《史记·秦本纪》。

③ 《韩非子·十过》。

④ 《左传》僖公十三年。

⑤ 《左传》文公六年。

救了楚的灭亡，仍能在列国纷争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三节　战国时的秦国

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是我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是我国封建制度确立、发展并由政治上的诸侯分立走向统一的时代。这个时期的秦国，开始时尚处于落后的奴隶制时代，到战国中期经过变法革新，实现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国势迅速强盛起来。到战国后期经过大力对外扩张，削弱了东方各国，奠定了统一中原的基础。

战国初期，中原各国接连变法革新，魏国最先强大起来，一度称霸中原，并对秦国展开持续的进攻。秦国则内忧外患不断，频繁地更易国君，对魏作战一败再败；到秦简公七年（前408年），西河之地全部被魏国夺去，秦军退守于洛水一线，被动挨打的局面日甚一日。

战国中期，秦孝公（前361～前338年在位）时代秦国才发生真正的转机。孝公对秦国的长期混乱与落后深感“丑莫大焉”①，“常痛于心”②，下决心要变法革新。他以著名的法家人物商鞅为谋主，于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两次下令变法，进行比较彻底的封建改革。变法的主要目标是奖励农战，富国强兵，主要手段是推行法制，主要打击对象是各级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制度，主要内容有什伍连坐（一家犯法，什伍各户同罪）、奖励军功（以军功确立尊卑爵秩）、鼓励耕织（发展农业生产，强本抑末）、推行县制（强化中央集权）、开阡陌封疆（实行封建土地私有制）、统一度量衡等。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③；“兵革大强，诸侯畏惧”④。从此，秦的国势蒸蒸日上，由落后衰败变为先

---

①② 《史记·秦本纪》。

③④ 《史记·商君列传》。

进富强，同魏国的战争也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到孝公二十二年（前 340 年），收复河西部分失地，并取得进一步发动战略攻势的主动权。

孝公死后，商鞅被害，但秦国统治集团仍行商鞅变法的制度和政策，秦军发展为“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① 的强大武装力量。遂以不可阻遏之势进行长期持续的扩张，利用关东各国之间的矛盾，采取连横破纵、远交近攻等各种策略，不断发动大规模进攻，在战国中后期接连取得一个又一个的巨大胜利。其中主要胜利有以下一些：

（一）惠文王八年（前 330 年），大破魏军于雕阳（今陕西富县北），斩首 8 万，魏国被迫献出河西地。两年后魏又被迫献出上郡 15 县，秦从而控制了全部关中地区。

（二）惠文王后元七年（前 318 年），楚、赵、燕、韩、魏五国联军及匈奴军合纵攻秦，被秦军击退于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次年，秦军乘胜出关东下，大破三晋联军于修鱼（今河南原阳县），斩首 8.2 万。

（三）惠文王后元九年（前 316 年），秦军南下灭蜀，扩地至今云南北部。

（四）惠文王后元十三年（前 312 年），两次大破楚军，夺取了全部汉中地区。

（五）武王四年（前 307 年），攻克韩国重镇宜阳（今河南宜阳），斩首 6 万。

（六）昭王十四年（前 293 年），秦将白起大破韩、魏联军于伊阙（今河南洛阳龙门），斩首 24 万，给了魏、韩两国一次最严重的打击。魏、韩从此一蹶不振。

（七）昭王二十七年至三十年（前 280～前 277 年），秦军连续大举攻楚，水路夺取了黔中郡和巫郡，陆路夺取了楚都郢，楚被迫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

---

① 《史记·张仪列传》。

（八）昭王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前 275～前 273 年），秦军两次兵临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西北），大破魏、赵联军于华阳（今河南郑州南），斩首 15 万，魏被迫献南阳郡请和。

（九）昭王四十七年（前 260 年），秦将白起大破赵军于长平（今山西高平），坑降卒 45 万，赵国元气大伤。

长平之战后，秦对赵、魏等国的战争也曾有过失利，如昭王五十年（前 257 年）秦军败于邯郸城下，庄襄王三年（前 247 年）秦军被魏公子信陵君所率的关东五国联军击败，等等。但是，这些失利都未曾有损于大局，秦军仍然继续不断地东进。例如，昭王五十一年（前 256 年）攻赵，取 20 余县，首虏 9 万。不久，灭掉了西周。庄襄王元年（前 249 年），又灭掉了东周。庄襄王三年，夺取赵国 37 城。这样，到公元前 246 年秦王政（即秦始皇）元年时，秦地已经居“天下之半”①，“诸侯譬如郡县”②，奠定了统一中原的雄厚基础。进一步完成统一大业，已成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之势。

---

① 《战国策·东周策》。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

第二章　秦灭六国的统一战争

秦灭六国的统一战争（参见附图 1），是在下述历史环境和背景下展开的。

第一节　战国末期的形势

一、战国末期历史发展中的主要矛盾

到公元前 3 世纪中叶的战国末期，我国已经进入了封建制时代，但我国社会仍然处于诸侯割据和混战的局面之中。齐、楚、燕、赵、韩、魏、秦“七雄”经过战国中期的变法革新，都已基本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和过渡。崭新的社会制度出现于大河上下和长江南北，封建制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制度不仅已经确立，而且有了相当的发展。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各诸侯国之间的矛盾，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具有了新的性质和特点。

新的阶级矛盾，主要是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矛盾，它取代了以往奴隶主阶级同奴隶阶级的矛盾。在新的地主阶级中，有居于统治地位的军功地主和官僚地主，有从奴隶主转化而来的贵族地主，还有随土地私有制发展起来的一般地主。在新的农民阶级中，有获得封建国家“授田”的一般农民，有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还有一无所有的“庸客”(即雇农)。新的封建制剥削方式，较旧的奴隶制剥削方式是一个很大的历史的进步。一般农民有了自己独立的经济，政治地位和生活条件有了一定的改善。正如《汉书・食货志》所载：农夫一家五口，可耕田百亩（约合今 31 亩），

亩产粟一石半（约合今3斗），百亩可收一百五十石，除什一之税外，余一百三十五石，全家一年的基本生活费用所差不多。当然，在战乱频仍的战国末期，一般农民的生活是很苦的，佃农和“痛客”更苦一些。但是，总的看来封建制度处于上升发展的阶段中，生产力同生产关系处于基本相适应的状态中，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还没有普遍地尖锐、激化起来。这远比春秋末期奴隶主同奴隶之间那种尖锐、激烈、复杂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缓和得多。

新的民族矛盾，主要是已经封建化的中原华夏某些诸侯国，同正在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某些周边少数族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中原华夏族和周边少数族都在急骤地发展前进，彼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交往与融合不断增多，同时也伴随着不少冲突和矛盾。一方面，某些已经形成部落联盟而强大起来的周边少数族，特别是北方的游牧族匈奴、东胡等等，在其统治集团策划下，常袭扰燕、赵、秦等国的边境，掠夺财物和人口；另一方面，某些经变法革新而强大起来的中原诸侯国，也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不断把自己的封建统治推进到周边少数族地区。因此，战国末期的民族矛盾和冲突日益增多，规模也不断扩大。例如，为了防御匈奴，燕、赵、秦等国都在北边修筑了长城，常年派重兵戍守。为了同游牧族作战，赵武灵王曾实行“胡服骑射”，打败林胡、楼烦，开辟大片土地。赵国的名将李牧，曾大破匈奴十余万骑兵，解除了匈奴对赵国的严重威胁。燕将秦开，也曾打败东胡，辟地千里。秦国则先后征服了关中以及巴、蜀地区的一些少数族。楚国也积极向东南和西南发展，分别兼并了越国，设置了黔中郡。这些情况表明，战国末期的民族关系，在相互交往、融合增多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由统治阶层引起的矛盾和冲突，但这不是战国末期历史发展中的主要矛盾。

战国末期历史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是新生的封建主义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中诸侯分立的政治状况之间的矛盾。新生的封建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处于上升发展的阶段，它所需要的最基本

条件就是和平、安定和统一。而华夏族各诸侯国的政治状况则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完善，成为历史前进的主要障碍。这一主要矛盾的集中表现，就是秦国同东方六国的战争以及东方六国之间的战争。这种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已达数百年之久，它的性质也随着历史发展中主要矛盾的变化而变化着。到战国末期，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特别是秦国同关东六国之间的战争,已经由春秋时代的争霸战争,战国初、中期的兼并战争，逐渐演化为封建统一战争。随着封建统一战争的进展，上述主要矛盾得到克服和解决，我国历史走向空前统一的新时期。

二、合纵抗秦外交的破产

在秦国日益强大、咄咄进逼的形势之下，关东六国的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只有合纵抗秦才是他们共同利益之所在，因而先后发动了六次合纵抗秦的行动。但是，由于六国之间矛盾重重，合纵难以巩固，乃至互相混战，长期不止。在秦国的强大军事威胁和连横外交的反击之下，各次合纵抗秦均以破产而告终。

第一次合纵抗秦在公元前318年，当时秦军刚开始出关东下，对魏、韩的威胁较大，对其他各国的威胁尚未构成。在魏相公孙衍的鼓动下，勉强组织起一个攻秦联盟。但实际上齐国没有参加攻秦的行动，楚、燕两国很不热心，只有三晋联军在积极作战。次年，秦军大败三晋联军于修鱼，第一次合纵抗秦即宣告破产。

第二次合纵抗秦在公元前298年。当时齐国处于强大地位，孟尝君为相，决心以秦为敌，组织起齐、韩、魏抗秦联盟，连续三年对秦作战，一度攻入函谷关，迫使秦国归还了侵占韩、魏的部分土地。这时，齐国统治集团内部发生矛盾，孟尝君流亡魏国(不久任魏相)，齐魏关系破裂；齐开始大举攻燕，不愿再与秦为敌，秦亦主动与齐修好，故第二次合纵抗秦的联盟不宣而散。

第三次合纵抗秦在公元前287年。当时纵横家苏秦极力劝说

齐湣王拉拢各国反秦，齐湣王采纳此议，会合燕、赵、韩、魏等国共同攻秦，秦昭王被迫放弃了侵占魏、赵的部分土地。但齐湣王的真实意图在于灭宋，秦昭王让出魏、赵部分土地后，齐国立即发动了灭宋战争，引起各国震恐，第三次合纵抗秦随之破产。

第四次合纵抗秦在公元前 257 年。当时秦军已围困赵都邯郸三年，赵国竭尽全力固守，同时大力开展外交活动，呼吁各国救赵抗秦。各国慑于秦军的威势，皆动摇不前。后在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等人的努力下，各国终于联合起来，击败秦军于邯郸城下，解了赵围。但是，邯郸之围一解，合纵即告破产，楚国去灭鲁，魏国向东扩展，燕、赵之间开始长期混战。

第五次合纵抗秦在公元前 247 年。当时秦国不断大规模兼并魏、赵、韩三国的土地，秦的边界已近魏都大梁。在此严重形势下，信陵君以个人的威望竭力发动一次合纵抗秦的活动，各国派兵救魏，击败秦将蒙骜，追至函谷关。事后，秦国以万金行间于魏，魏安僖王中计，解除了信陵君的兵权，合纵抗秦即随之破产。

第六次合纵抗秦在公元前 241 年，当时秦国已经灭亡西周和东周。东与齐国相连，把韩、赵、魏拦腰截断，已造成对东方各国的严重威胁。在此种形势下，赵、楚、魏、燕、韩五国又结成了合纵联盟，由赵将庞煖统率五国联军攻秦，一直打到蕞（今陕西临潼东）。但秦国一发兵反击，楚军即闻讯逃跑，其他四国军队也纷纷溃退。从此，合纵抗秦的外交彻底破产，再也无法组织起统一的行动。

三、关东六国的衰败

自战国初期以来，关东逐渐形成齐、楚、魏、赵、燕、韩六大强国，其中以齐、楚、魏、赵的实力最强，皆足以同秦国相抗衡。但是，六国的封建改革都远不如秦国彻底，内政不善，外交不力，长期互相混战，因而日益衰败。到战国末期时，其基本概况如下。

（一）**魏国**　其变法革新最早，在战国初期曾是称霸中原的强国，也是秦军东进的最大障碍。后因与齐国互争中原霸权，在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中两次败于齐军，元气大伤，从此无力抵抗秦军的进攻。经秦军近百年的打击和蚕食，损失了“山（华山）南山北，河外河内，大县数十，名都数百”①；到战国末期仅保有大梁南北数十城邑，被迫不断地割地事秦。魏安僖王在位 34 年（前 276～前 243 年），始终昏庸无为，一再排斥在诸侯中深孚威望的信陵君魏无忌。信陵君曾率合纵联军打败过秦军，但被安僖王解除了兵权，忧郁而死，致使魏国的政治更加昏暗。此后，景湣王（前 242～前 228 年在位）、王假（前 227～前 225 年在位）一仍旧故，苟延残喘而已。

（二）**韩国**　韩国历来是七雄中较弱小的一个，无力独自抗秦，几次配合魏军作战都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到战国末期仅保有都城阳翟（今河南禹县）及其附近数十个城邑，处于秦国的三面包围之中，没有什么实力可言。韩桓惠王（前 272～前 239 年在位）长期在位，毫无作为，于公元前 254 年称臣于秦。其后韩王安即位（前 238～前 230 年在位），亦唯仰秦的鼻息而已。其存亡的命运，完全取决于秦国对它的态度和秦国战略决策的需要。

（三）**赵国**　拥有今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及山西、内蒙的部分地方，是战国末期关东最强的一国。军事上经赵武灵王（前 325～前 299 年在位）“胡服骑射”的改革后，战斗力很强，出现过赵奢、廉颇、乐乘、李牧等许多名将，曾多次挫败燕、齐、魏、秦和匈奴的军队。但赵国的政治情况长期不佳，国君多昏庸，信谗忌贤，有良将而不能善用。赵孝成王（前 265～前 245 年在位）时统御无方，长平之战临敌易将，四十余万赵军被歼，赵元气大伤。接着又陷入同燕国的长期战争，几乎置秦国的威胁于不顾，以致大片土地被蚕食。悼襄王（前 244～前 236 年在位）时继续同燕国作战，并将名将廉颇赶走，使赵国更加衰弱。赵王迁（前 235～前 228 年

---

① 《史记·魏世家》。

在位）时仍继续同燕国作战，连名将李牧也被谗杀，从而完全失去了抵抗秦军的能力。

（四）楚国 楚自春秋时代就是南方的一大强国，常常争霸于中原。进入战国以后，进一步发展壮大，号称带甲百万。但其封建改革最不彻底，社会矛盾复杂，旧贵族势力占优势，政治腐败，因而国势不振。楚怀王（前328～前299年在位）时受纵横家张仪的欺骗，齐、楚联盟被破坏，楚国陷于孤立。公元前312年两次攻秦，均遭惨败。公元前301年，齐、韩、魏、秦联军大破楚军于垂沙（今河南唐河西南），从此楚国更加无所作为。公元前278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被秦军占领，被迫不断东迁，国力越来越削弱。到战国末期仍据有江淮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是关东六国中实力最雄厚的一个，但政治情况愈益不佳。考烈王（前262～前238年在位）时春申君黄歇专权二十余年，无奋斗自强之志，一再屈意事秦，迁都于寿春（今安徽寿县），苟且偷安。幽王（前237～前228年在位）时政局开始动乱，春申君被杀。幽王死，哀王立，仅两个多月，其庶兄负刍袭杀哀王而夺取了王位（前227～前223年在位）。这时，秦已灭韩、魏、赵等国，兵临于楚。而楚毫无准备，处于涣散孤弱状态。

（五）齐国 齐据有今山东地区，在战国中期很强，曾取得中原霸权，一度灭亡燕国，又吞灭了宋国，与秦并称东、西帝，是秦在东方的一个劲敌。公元前284年被燕、赵、魏、韩、秦五国联军打败，几乎亡国，从此一蹶不振。到战国末期，在齐王建（前264～前221年在位）的长期统治下，政治极其腐败，重臣和贵族不断被秦国收买，放弃合纵抗秦政策，大力与秦交好，“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①，坐视其他五国一一被秦消灭，束手待降。

（六）燕国 燕据有今河北北部、辽宁大部及其东南部分地方。虽然土地辽阔，但远离中原，地瘠民稀，一向为七雄中的弱者。到

---

①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战国末期，在燕王喜（前 254～前 222 年在位）的长期统治下，既不励精图治，又不合纵抗秦，而陷于同赵（以及齐、魏）国无休止的战争，经常损兵折将，割城失地。及至秦灭韩、赵而兵临燕境时，燕已毫无抵抗能力。

总之，战国末期形势的基本特点是：六国皆弱，唯秦独强，秦灭六国而统一已成为定局。

第二节　统一战争的准备和决策

秦庄襄王三年（前 247 年）五月，13 岁的嬴政继承了王位，即历史上千古一帝的秦始皇。秦王政初期，由于年幼，朝政大权由太后（嬴政的母亲赵氏）和相国吕不韦掌握。这时，就客观形势和力量对比而言，秦国已经具备了完成统一事业的条件。但是，其国内政治上还存在着严重的障碍，即太后听政，形成吕不韦和嫪毐两大集团，不能专心致力于统一事业。秦王政九年（前 238 年），22 岁的嬴政开始亲理国事，为排除障碍、进行统一战争，做了如下一些准备。

一、政治准备——铲除吕、嫪集团

吕不韦原是阳翟（今河南禹县）的大商人，家累千金。为了搞政治投机，他利用各种手段帮助嬴政的父亲——异人得立为秦孝文王的太子。后来异人继承王位（即庄襄王），吕不韦便当了秦国的丞相，兼任嬴政的师傅，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阳 10 万户，有家僮万人，食客 3000 人，成为最有权势的人物。庄襄王死后，吕不韦被尊为相国，号称仲父，权倾天下。吕不韦还利用自己的权势，按照自己的想法，召集门客们编纂了一部内容庞杂而规模宏大的理论著作——《吕氏春秋》，企图“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①，

① 《吕氏春秋》卷十二，《季冬纪·序意》。

以便影响和控制秦王政。

除吕不韦集团之外，太后的亲信嫪毐也组成一个阴谋集团。嫪毐本是个流氓，后来在吕不韦的帮助下，诈称宦者，得任侍中，长期在太后的身边。他因深得太后"绝爱"，太后临朝，"事皆决于嫪毐"①，逐渐垄断秦国的朝政。太后封嫪毐为长信侯，以太原郡(郡治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为其封国，势力不在吕不韦之下，嫪毐还和太后商定，将来要由他和太后的私生子来取代嬴政的王位。

吕、嫪两大集团的存在，把朝野上下分成两派，既影响着政治上的集中统一，又威胁着嬴政的安全与地位，对秦国进行统一战争、完成统一中原的大业，构成了严重障碍。

秦王政九年四月，正当嬴政为了亲自执政去到雍的蕲年宫举行加冠和佩剑的典礼之时，嫪毐乘机作乱，"矫王御玺及太后玺"②发兵，准备进袭蕲年宫，企图杀害嬴政而夺取秦国的政权。这一阴谋被嬴政及时觉察，立即派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兵还袭嫪毐。双方战于咸阳城中，叛军被歼数百人，嫪毐兵败逃走。嬴政下令在全国严加搜捕，不久将嫪毐及其同党全部捉拿归案。同年九月，嫪毐被处死，夷其三族；其同党"皆车裂灭宗"③；其舍人四千余家被夺去官爵，迁往蜀地，从而铲除一大祸患。

接着，嬴政继续穷治嫪毐集团的案件，事连吕不韦，遂于次年十月免去吕不韦的相国职务，令其回到河南洛阳的封地。但是，吕不韦的政治影响很大，在免相岁余之后，仍然有"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④。这种情况的存在，不论对秦国或嬴政本人，都是个潜在而巨大的威胁。嬴政深恐发生意外变故，又进一步采取措施，令吕不韦全家迁徙至蜀。吕不韦自知难逃严惩，于秦王政十二年(公元前235年)服毒自杀。其全族被籍没为官奴

①④《史记·吕不韦列传》。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资治通鉴》卷六，始皇帝九年。

隶，其同党被陆续迁徙至蜀。秦严令国中："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毐、不韦者籍其门，视此。"①

在清除吕、嫪两集团的过程中，曾一度产生极端、偏激的情绪，一些宗室大臣们提出："诸侯人来仕者，皆为其主游间耳，请一切逐之。"②于是，在吕不韦免相之后，随即下了一道逐客令，凡是原籍非秦国人而在秦国做官的客卿，全部驱逐出境。其中有个客卿李斯是楚国人，也在被逐之列，他临行时给秦王政留下一封谏书。书中说，秦穆公任用由余、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孙支等人，才得以开地千里，称霸西戎；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秦国才有今天的富强；秦惠文王任用张仪，才破坏了关东六国的合纵抗秦；秦昭王任用范雎，才使得秦国的公室强大，杜绝了私门。这些人都是客卿，他们为秦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不分是非曲直，把客卿统统赶走，实际上等于让他们去资助秦国的敌人！秦王政看了李斯的上书后，顿时省悟，即时取消了逐客令，派人把李斯追回，进一步提拔重用，由长史擢为廷尉。除李斯之外，其他有才能的客卿也同样得到了重用。如大梁的布衣之士尉缭，在秦王政取消逐客令后来到咸阳，态度十分骄矜，晋见时亢礼不跪，秦王政竟能屈己待贤，"衣服食饮与缭同"③，并提拔他做了国尉。

这样，前后经过三年多的斗争，清除了吕、嫪两大阴谋集团，整顿了内政，选任了贤能，巩固和加强了政权建设，为进行大规模的统一战争扫除了政治障碍。

二、外交准备——离间关东六国的合纵

秦国的军事实力虽然十分强大，但关东六国一旦联合起来，秦国就没有决胜的把握。因此，能否有效地制止关东六国的合纵抗秦，是统一战争成败的关键所在。为了防止和破坏关东六国的合

---

①③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资治通鉴》卷六，始皇帝十年。

纵，秦王政在清除吕、嫪集团的同时，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以配合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秦王政十年，李斯建议说："昔者秦穆公之霸，终不东并六国者，何也？诸侯尚众，周德未衰，故五伯迭兴，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扫）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纵，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①这一建议为秦王政所采纳，遂定下了统一中原的决心，并"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②。于是，在统一战争开始的前夕，首先发动起强大的外交攻势。

同年，尉缭也向秦王政建议说："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纵），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③ 这个建议的实质与李斯的建议相同，当然也被秦王政采纳，遂从国库中拨出巨款，不断加强对关东六国的间谍外交攻势。

在这一攻势中，取得显著成效的有谋士顿弱、陈驰、姚贾等人。他们都长期活动在关东各国，紧密结合统一战争的实际情况，采取各种手段分化瓦解敌人。其中，顿弱重点活动在韩、魏、燕、赵。他向秦王政建议说："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资臣万金而游，听之韩、魏，入其社稷之臣于秦，即韩、魏从。韩、魏从，而天下可图也。"④ 秦王政给他万金后，他"东游韩、魏，入其将相；北游于燕、赵，而杀李牧"⑤，有效地争取了韩、魏、燕

---

①② 《史记·李斯列传》。

③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④⑤ 《战国策·秦策四》。

等国，孤立和削弱了秦军的重点打击对象——赵国。陈驰主要活动在齐国。他以重金收买齐相后胜和宾客，宾客纷纷劝齐王建朝秦，以致齐国长期“不修攻战之备”①，直至最后，齐王建仍然“听陈驰，遂入秦”②。姚贾主要活动于楚国。在统一战争开始之前，关东曾一度出现“四国为一，将以攻秦”③的动向，姚贾自告奋勇，出使楚国及他国，用纵横捭阖之术，“绝其谋，止其兵，与之为交”④，拆了关东的合纵行动。姚贾一连在外3年，其活动影响很大。后来韩国的使者韩非入秦，对姚贾进行人身攻击，企图破坏其外交活动。姚贾得知后，同李斯合谋，终于说服秦王政，“复使姚贾而诛韩非”⑤，从而使秦国的外交攻势进一步深入发展下去。

以上就是秦国所发动的强大外交攻势，其核心在于破坏关东六国的合纵，确保军事进攻的各个击破。

三、军事准备——制定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

秦国自从商鞅变法、国富兵强以来，对关东六国长期执行的都是蚕食战略。由关中向巴蜀、中原逐步发展扩大，夺取了大片土地，消灭了巴、蜀、义渠、西周、东周等很多弱国，却没有消灭关东六大强国中的任何一个。有几次出现过消灭魏、韩、赵、楚的机会，但都被错过，以割地议和而告终。秦昭王晚年曾企图改变战略，首先吞灭赵国，发兵围困邯郸3年，结果被关东的合纵联军所击败，因而未能实现战略的转变。继而又恢复了蚕食战略，直至秦王政初年。

秦王政十年，在李斯、尉缭、顿弱等人建议下，秦王政下决心要“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⑥。这标志着秦国放弃了传

---

①② 《战国策·齐策六》。

③④⑤ 《战国策·秦策五》。“四国”，马非百《秦集史·人物传》指出：“乃谓四方之国。……高注以燕、赵、吴、楚释之，未免误会。”

⑥ 《史记·李斯列传》。

统的蚕食战略，开始执行兼并六国、统一中原的战略，从而在思想认识上以及外交斗争和战争实践上，都真正实现了战略的转变。

战略转变后，秦国所确定的最基本方针，就是对关东六国要各个击破。这一方针是从无数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的，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也是秦王政、李斯、尉缭以及顿弱、陈驰、姚贾等谋士群的共同认识。上文所述外交攻势，就是围绕这一基本方针展开的。

基本方针确定后，还必须解决重点打击对象、具体战略部署的问题，亦即各个击破首先从何国入手的问题。对此，秦国上层集团的认识颇不一致，经历过长期的争论和犹豫。

争论的焦点是先灭韩或先灭赵以及先灭楚的问题。秦王政十年，李斯提出“先取韩以恐他国”① 的建议，认为韩是秦的“腹心之病”②，历来为诸侯合纵攻秦的先导，必须首先灭韩。为此，秦王政当即派李斯去游说韩王安，企图诱骗韩王安来秦入朝，然后一举攻占韩国。但是，韩王安在其谋士韩非的劝阻下，没有接见李斯，使李斯的计划落空。次年，秦王政发兵攻赵，揭开了统一战争的序幕。但是，在对赵作战的过程中，又往往同灭韩、攻楚问题交织在一起。秦王政十二年（前 235 年），正当秦、赵交兵之际，秦王政下令“发四郡兵助魏伐楚”③，任命秦将辛梧为秦魏联军的统帅。由于秦国上层集团对此认识不一，加之楚国及时开展了外交活动，致使辛梧拖延出兵达 6 个月之久，最后不了了之。秦王政十四年（前 233 年），也是正当秦、赵交兵之际，秦王政读到韩非所著《孤愤》、《五蠹》之书，感慨颇深，欲见其人，李斯遂建议发兵“急攻韩”④。韩王安被迫遣韩非入秦。韩非到秦国后，给

---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韩非子·存韩》。

③ 《资治通鉴》卷六，始皇帝十二年。其事参见《史记·六国年表》、《战国纵横家书·李园谓辛梧章》。

④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秦王献策，系统阐述统一六国方略。分析秦和六国的政治、军事、地理形势，提出“破天下之从（纵），举赵亡韩，臣荆（楚）魏，亲齐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邻诸侯之道”① 的建议。由于他抨击李斯先灭韩的主张，李斯说韩非的建议“终为韩不为秦”②，遂致韩非下狱而死。这些情况表明，统一战争虽然已经开始多年，但秦国上层集团在战略部署的决策上仍然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

从统一战争的实际过程看，先后 16 年（自秦王政十一年至二十六年），前期对赵作战 9 年，后期对楚作战 5 年，在灭赵的过程中灭了韩，在灭楚的过程中灭了魏、燕，最后灭齐。由此可知，其战略部署的基本思想是：重点打击赵、楚，先赵后楚，各个击破。这一决策是正确的，抓住了重点打击对象问题。当时关东六国中韩、魏最弱，几乎对统一战争构不成障碍，但其地扼中原，先灭韩、魏容易促成其余各国的合纵。齐、燕也较弱，对统一战争也构不成严重障碍，且距秦较远，各个击破自然不能从齐、燕开始。唯楚、赵两国较强，各个击破的关键就是要避免对楚、赵同时作战。楚实力雄厚，距秦较远，先打楚势必旷日持久，左翼侧后易受赵军威胁，有陷入两面作战的可能。相反，赵距秦较近，其军战斗力甚强，是秦军东进的首要障碍，先打赵不易引起各国的恐慌，右翼同楚国之间有韩、魏作缓冲，又有嵩山和伏牛山脉作掩护，且楚刚刚迁都于寿春，一再回避秦军，无意西向与秦为敌，因而可稳妥地避开两面作战。所以，各个击破首先从赵国开始最为有利，一旦破赵，便掌握了全局的主动权：韩、魏变成囊中之物，可随时顺手牵羊；楚国失去了赵国的呼应，比较容易解决；齐、燕更加孤危，无法逃脱灭亡的命运。

以上就是秦国战略思想转变和形成的过程。其决策是正确的，但经历了长期的争论和犹豫，直到秦王政十七年（前 230 年）灭韩之后，秦国上层集团才真正统一了认识。

---

①《韩非子·初见秦》。

②《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第三节　统一战争的作战经过

秦灭六国的统一战争，共经历四个阶段。

一、攻赵灭韩

自从李斯诱降韩王安未成，秦王政便决计首先对赵用兵。先后历时 9 年，发动 5 次进攻，才取得灭赵的最后胜利。并在灭赵的过程中灭了韩。

第一次攻赵，在秦王政十一年（赵悼襄王九年，前 236 年）。当时赵军主力正在攻燕，秦军乘机从南、北两路发起进攻。南路在桓齮、杨端和的率领下，顺利地攻占安阳（今河北安阳西南）和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北路在王翦的率领下，顺利地攻占橑阳（今山西左权）和阏与（今山西和顺）。两路秦军共夺取 9 座城邑，取得了初战的胜利。南路准备越漳水（今漳河）而上，北路准备越太行山而下，企图南北夹击邯郸，一举亡赵。这时，赵国的形势很危急，赵悼襄王突然病死，赵王迁即位，立即停止了对燕国的战争，把赵军主力调回。赵军南据漳水沿岸之赵长城，西据太行山之险，顽强固守，同秦军形成僵持局面。接着，秦国连续发生两大内政、外交问题，使对赵作战停止下来。一是进一步处理吕不韦的问题。正当秦军大举攻赵之时，关东各国纷纷同已经免去相位的吕不韦频繁往来，此事引起秦王政的警觉和怀疑，遂于秦王政十一年下令吕不韦全家迁徙至蜀，次年吕不韦自杀，余党被清除。二是发关东四郡兵助魏伐楚的问题。当时秦、魏已经结盟，对秦攻赵甚为有利。但魏企图借助秦的威势割取楚的土地，秦也有人主张借魏的力量伐楚，因而转移了战略打击目标。这两件事严重地影响了第一次攻赵作战，未能及时增兵扩大初战的胜利，以致秦、赵双方休战一年之久。

第二次攻赵，在秦王政十三年（赵王迁二年，前 234 年）。当

时秦国上层集团否定了秦、魏联合攻楚的行动，遂决心再次攻赵。这次继上次初战的胜利，秦军集中兵力加强了南线的攻势。由桓龁任统帅，同赵军主力会战于平阳（今河北临漳西南），杀其主将扈辄，歼敌10万，取得一次重大的胜利。接着，桓龁率兵一部乘胜“东击”①，继而北上，远出邯郸之后，企图阻击赵国北防匈奴的李牧部队南下回救邯郸。赵军主力被歼后，赵王迁果然急调李牧回师。李牧乃赵国的名将，久战于匈奴，其所率部队皆精锐骑兵，很善长于机动野战。他接到命令后，即率部自代郡（郡治代，今河北蔚县东北）驰归，途中与桓龁遭遇。双方先战于肥下（今河北藁城西南），次战于宜安（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南）。李牧连续重创秦军，桓龁大败而归。秦军此次攻赵，显然部署不当、兵力不足，在北线没有事先安排策应和阻援部队，遂以先胜后败而告终。赵国取得防御的胜利，李牧被晋封为武安君。

第三次攻赵，在秦王政十四年（赵王迁三年，前233年）。这次仍由桓龁任统帅，经补充兵力，调整部署，重新发起进攻。当时赵将李牧已经率兵返回代郡，去防御匈奴，因而秦军顺利地攻占了武城（今河北磁县西南）、平阳、宜安，其目的仍然是南攻邯郸、北阻李牧。不久，即发生韩非入秦同李斯争论战略思想的问题，秦国上层集团在攻韩或攻赵问题上意见不一，遂致第三次攻赵被搁置，未能取得进一步的战果。

第四次攻赵，在秦王政十五年(赵王迁四年，前232年)。当时韩非已死，“韩王请为臣”②，秦王政对韩非之死颇为懊悔，遂大举兴师攻赵。这一次兵分两路，南路集中于邺城，北路集中于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准备南、北夹击邯郸。北路军自太原出发后，夺取了狼孟(今山西阳曲)，越过太行山，进占番吾(今河北平山南)。这时，赵王迁一面加强南线的防御，一面调李牧南下。李牧南下后，再次获胜，击退了秦北路军。秦南路军也被阻于漳水和长城之南，

---

① 《史记·六国年表》。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

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后闻北路军被击退，南路亦即罢兵。这次罢兵除军事上的失利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秦国上层集团开始认真考虑灭韩的问题，再次转移战略目标，灭赵问题自此被搁置两年。

上述四次攻赵，秦军虽然没有达到灭亡赵国的目的，但给了赵军以严重的打击，使赵国进一步削弱而濒临于灭亡。对于这四次攻赵，当时就有人评价说："秦赵战于河漳之上，再战而再胜秦；战于番吾之下，再战而再胜秦。四战之后，赵亡卒数十万，邯郸仅存，虽有胜秦之名，而国破矣。"① 由此可知，秦军四次攻赵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秦军东进的主要对手已被削弱，为下步灭韩、灭魏、灭赵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李牧虽然连挫秦军，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局势，其自身的力量已消耗殆尽，赵国的灭亡只是时间而已。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秦王政终于采纳李斯等人的意见，在第四次攻赵之后，决定首先灭韩。

灭韩，在秦王政十七年（韩王安九年，前 230 年）。当时，随着秦军对赵国的攻势不断扩大，韩、魏两国皆为震恐，处境更加孤危，不断地被迫就范。秦王政十四年（前 233 年），韩王安"纳地效玺，请为藩臣"②。秦王政十六年（前 231 年），"韩献南阳地"③，"魏人献地"④。同年九月，即秦军第四次攻赵失利后，秦王政决定乘韩王安献地之机发兵灭韩，遂命内史腾为南阳假守，率兵到韩国去接受其所献南阳地区，实际上是叫内史腾暗暗做灭韩的军事准备。次年，秦王政即命内史腾向韩国发起突然进攻。韩王安长期以来奉行割地求和的投降政策，没有料到秦军会突然袭击，既无准备，又无实力，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这时，赵国在秦军的四次打击下自顾不暇，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发兵救韩；魏、齐、燕等国也同样没有力量救韩；楚国虽有实力，但已来不及救韩，也无意救韩。因此，秦军顺利地攻入韩都阳翟，俘虏了韩王安，占领韩国全部土地。就这样，秦在四次攻赵的基础上顺手牵

---

① 《战国策·齐策一》。

②③④ 《资治通鉴》卷六，始皇帝十四年、十六年。

羊地灭掉了七雄之一的韩国，把统一事业向前推进很大一步。灭韩之后，接着便对赵国发动了最后一次攻击。

第五次攻赵，在秦王政十八年（赵王迁七年，前229年）。当时赵国已连续两年发生地震、干旱和饥荒，人心浮动，形势危急，民间广泛流传着“赵为号，秦为笑。以为不信，视地之生毛”① 的流言。秦军乘机从北、南两路发起进攻，北路以王翦为主将，率领驻守上地（即上郡之地，在今陕西绥德至延安一带）的秦军，由井陉（今河北井陉西）进攻邯郸之北；南路以杨端和为主将，将军羌瘣配合，率领河内（今河南新乡一带）的秦军，由邺城进攻邯郸之南。赵国以李牧为大将、司马尚为将军，率兵分别阻击秦军，依靠太行山和漳水、长城等有利地形条件，同秦军相持一年之久。这期间，秦国利用长期潜伏在赵国的间谍顿弱等人，以重金收买了赵王迁的嬖臣郭开。郭开向赵王迁诋毁李牧和司马尚，说他们企图谋反，要夺取赵国的政权。赵王迁听信谗言，改派将军赵葱和颜聚代替李牧和司马尚。李牧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拒不交出兵权，后被赵王迁派人逮捕杀害；司马尚被罢免。次年（秦王政十九年，赵王迁八年，前228年），秦军展开猛烈进攻，赵军由于易将而造成指挥失误、士气挫伤，遂遭惨败，赵葱战死，颜聚逃亡。秦军乘胜攻占太行山东麓地区，南北夹击，进克邯郸，俘虏了赵王迁，赵国灭亡。赵国灭亡后，赵公子嘉（赵悼襄王嫡子）率领赵氏宗族数百人逃往代郡，自立为代王，并和燕军联合屯驻在上谷（今河北怀来西北），企图阻止秦军的进一步北上。

至此，秦国终于实现了灭赵的战略目标，但经历了一个曲折而持久的过程。其原因并不在于赵国的强大，更不在于秦国的力量不足，早在长平之战时秦国就已经具备了一举亡赵的条件。事实上，除了李牧的部队比较精锐，太行山、漳水、长城有利于赵军防守等客观条件外，残赵是难抗强秦的。战事久拖的最根本原因是秦国上层集团在灭赵、灭韩以及伐楚问题上长期摇摆不定，以

---

①《史记·赵世家》。

致每次攻赵时都显得决心不大、兵力不足，并造成军事部署和指挥上某些不当和失利，从而使灭赵作战前后延续 9 年之久。但从全局上看，基本上坚持了“举赵亡韩”的方针，从而取得统一战争前期的巨大胜利。

二、攻燕灭魏

灭赵之后，秦在统一战争中取得了极大的战略主动权，既可以乘势灭魏，也可以北上灭燕，又可以南下灭楚，或者东进灭齐。因为赵、楚两大对手已消灭一个，剩下的主要是对楚作战问题，魏、燕、齐等国无足轻重，所以秦军已不甚顾忌两面同时作战①。因此，自灭赵之后，形势对秦国特别有利，大大加速了统一战争的进程。

正当秦国考虑和选择下一步战略进攻的方向时，发生了燕太子丹派荆轲刺杀秦王政的事件。秦王政早年曾随其父母生活在赵国，当时燕太子丹质于赵，两人相处得很好。秦王政即位后，燕太子丹又质于秦，没料到秦王政对他的态度很冷漠，太子丹因而十分气愤，于秦王政十五年私自逃跑回燕国。从此，秦、燕两国绝交，嬴政和太子丹之间由朋友变为仇敌。秦军灭赵后，王翦驻军中山（今河北正定东北），兵临燕境，但是否进攻燕国，秦王政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这时，燕国一片恐慌，燕王喜无计可施，听凭太子丹谋划。太子丹的师傅鞠武提出“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媾匈奴以图秦”② 的建议。这个建议显然已不现实，所谓“三晋”，其实只剩一个朝夕难保的魏国，韩、赵已经灭亡；齐国长期以来袖手旁观，同秦国交往密切；楚国正在内乱之中（秦王政十九年楚幽王死，其弟、兄争立）；匈奴更不会为燕国的利益去战斗。

---

① 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一年和《史记·楚世家》楚王负刍二年，秦军在大举增兵、攻拔燕都的同时，派将军王贲攻楚，大败楚军，取十余城。

② 《资治通鉴》卷六，始皇帝十九年。

因此，太子丹否定了鞠武的建议。他认为："赵不能支秦，则祸必至于燕。燕小弱，数困于兵，何足以当秦！诸侯服秦，莫敢合从。……诚得天下之勇士使于秦，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不可，则因而刺杀之。"① 这显然是冒险行动，但太子丹在走投无路的窘境中无可奈何地选择了这一行动，决定派人劫刺秦王政来挽救危局。秦王政二十年（燕王喜二十八年，前 227 年），太子丹派出刺客荆轲和秦舞阳，带上燕国督亢（今河北固安、新城、涿县一带）地区的地图和秦国流亡将军樊於期的人头，伪装割地献图，出使秦国，企图乘机劫刺秦王政。结果图穷匕首现，劫刺未成，荆轲当场被杀。

太子丹的上述冒险行动，极大地激怒了秦王政。秦王政立即决定把下一步的进攻矛头指向燕国，进一步增兵入赵，命王翦、辛胜由中山进击燕国。这时，燕军主力与赵国残余势力代王嘉的部队，联合在易水（今河北雄县西北）以西设防。秦王政二十年，秦军发起攻击，大破燕、代联军于易水之西，继而北上进逼燕都蓟城。次年（秦王政二十一年，燕王喜二十九年，前 226 年）十月，王翦率兵攻克燕都，燕王喜与太子丹率残部逃往辽东郡（郡治在今辽宁辽阳），代王嘉逃回上谷。秦将李信率兵数千追至辽东，在衍水（今辽宁浑河）再败太子丹军。燕王喜出于无奈，在代王嘉致书建议下，忍痛杀了太子丹，向秦求和。秦王政虽未允和，但鉴于燕、代残部已无碍大局，不足为患，便下令调转兵力，乘势灭魏，并准备大举攻楚。

自灭赵之后，秦王政即已把楚国定为主要攻击目标，加紧从各方面谋划准备。在破燕的同时，秦王政即已发兵攻楚。但在赵、楚之间尚有一个残存的魏国，对于调转兵力攻楚颇有不便之处。因此，在破燕之后于大举攻楚的同时，秦王政决定抽出一部分兵力，去消灭孤立无援的魏国。秦王政二十二年（魏王假三年，前 225 年），秦将王贲率兵一部攻魏，魏国无力全面抵抗，放弃了大梁以外的全部地区，退守于大梁孤城之内，以苟延时日。大梁城坚，秦

---

① 《资治通鉴》卷六，始皇帝十九年。

军一时难以强攻，便将大梁紧紧包围，并掘开黄河堤岸，引水灌城。经过3个月围困，大梁城被河水冲坏，秦军乘势攻入城中，魏王假被迫投降，随即被杀，魏国灭亡。

三、南下灭楚

楚为南方大国，是秦统一战争中最重要的对手。秦王政对灭楚作战做过精心的准备和安排，前后历时5年，经历了序战、初战、决战和深入江南作战等四个阶段。

序战　秦王政二十一年（楚王负刍二年，前266年），在王翦大举攻燕的同时，嬴政即派大将王贲率兵一部南下攻楚。王贲击败楚军，夺取10余座城邑，取得了序战的胜利。对于这次攻楚，秦王政的目的非常明确，即属战略侦察和试探的性质，以便分析楚国的反映和实力，确定灭楚所需的兵力。因此，当王翦破燕之后，秦王政即把王贲从攻楚的前线调回，命其率兵去灭魏，而把灭楚的任务赋予了攻燕的部队。

初战　自王贲取得序战的胜利，秦王政便颇有轻楚之心。他决定将攻燕的部队用于灭楚后，便问李信："我欲攻取荆，於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① 李信回答说："不过用二十万人。"②又问王翦，王翦回答说："非六十万人不可！"③李信是个年轻的将军，在破燕作战中表现很勇敢，甚得秦王政的赏识。于是，秦王政认为王翦老朽怯战，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而决定任命李信为灭楚的统帅，让李信和将军蒙武④ 率兵20万伐楚。秦王政二十二年（楚王

---

①②③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④ 蒙武：《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作蒙恬。据《史记·蒙恬列传》，蒙恬是蒙骜之孙，蒙武之子，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因家世得为秦将，攻齐，大破之，拜为内史"。又说蒙骜死于秦始皇七年，蒙武"与王翦攻楚，大破之，杀项燕"、"虏楚王"。由此可知，参加灭楚作战的始终是蒙武，而不是蒙恬。蒙恬至秦始皇二十六年灭齐时才开始任将。

负刍三年，前 225 年)，李信、蒙武兵分两路攻入楚境，李信进攻平舆(今河南平舆北)，蒙武进攻寝(今安徽临泉)，“大破楚军”①，接连获胜。这时，楚国以项燕为统帅，率领全国的兵力来抵抗秦军。项燕是楚国的名将，颇多智略，英勇善战。他见秦军来势很猛而兵力不多，即抽出一部分兵力西向进攻秦国的南郡（郡治江陵，今湖北江陵)，以调动秦军。李信、蒙武攻取了平舆和寝之后，正欲进军楚都寿春，忽闻南郡危急，遂改变原定计划，皆引兵而西，拟会师于城父（今河南襄城西)，去解南郡之围。项燕见战机到来，亲率楚军主力紧紧尾随李信的部队，马不停蹄地跟踪三天三夜，乘秦军宿营休息无备之时，突然发起攻击，攻破秦军两个壁垒，杀死秦军 7 个都尉，取得很大的胜利。李信大败逃回，蒙武亦随即撤军。秦、楚双方的初战，以楚胜秦败而告终。这是灭楚作战中一次重大的挫折。

决战　李信伐楚失败后，秦王政十分生气，当即把李信免职，并发兵解了南郡之围。他认识到，伐楚失败的主要责任是自己决策的错误，没有采纳王翦的正确建议，而轻听了李信的轻敌之言。于是，秦王政亲赴频阳（今陕西富平东北)，来到已经退休的王翦家中，向其赔礼道歉，答应其“非六十万人不可”的条件，令其担任灭楚的统帅。秦王政二十三年（楚王负刍四年，前 224 年)，以王翦为统帅，蒙武为副将，“空国中之甲士”②，发兵 60 万伐楚。楚“悉国中兵以御之”③，以项燕为统帅，景骐为副将，率兵 40 万同秦军相对抗。遂展开统一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决战。王翦老谋深算，工于料敌制胜，他占领陈至平舆一线之后，便停止进攻，不再深入，转攻为守，反客为主，等待楚军来反击。项燕本来善长于机动作战，但秦军采取守势，且兵力雄厚，无隙可乘，不得不多次挑战，企图同秦军一决胜负。王翦则抱定养精蓄锐、以逸待劳的方针，日夜抚循士卒，抓紧练兵和休整部队，坚持等待战

① 《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二十二年。

②③ 《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二十三年。

机，不肯出战。双方相持很久，楚军求战不得，项燕无计可施，深恐师老兵疲，为秦军所乘，遂引兵东归，欲另谋他策。王翦见战机到来，立即下令全线出击。楚军正在撤退移动，队形混乱而斗志不坚，被迫应战后无法抵抗优势秦军的猛烈进攻，因而大败，全军溃逃。秦军乘势发起追击，连战皆捷，一直追到蕲（今安徽宿县南），全歼楚军，杀死项燕，景骐自杀，从而取得决战的胜利。次年（秦王政二十四年，楚王负刍五年，前 223 年），秦军乘胜攻入楚都寿春，俘虏楚王负刍，楚国灭亡。同年，有人“假名项燕立昌平君反秦于淮南。为王翦、蒙武所击破”①。至此，秦军完全占领了楚国的江北地区，获得了灭楚的决定性胜利。

深入江南作战　楚国虽已灭亡，但在江南地区尚有广大的残余势力。王翦、蒙武经过几个月的休整和准备，于秦王政二十五年（前 222 年）率兵渡江，整整经过一年的苦战，陆续消灭了楚国在江南各地的残余势力，并降服了越君（指百越中于越人部分），彻底灭亡了楚国。

灭楚作战，是秦统一战争中继破赵之后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作战。开始时，秦王政颇有轻敌之意，没有看到楚国地广兵多，难以速胜的客观情况，轻信李信之言，一度遭受挫折。但嬴政很快即从失败中吸取了教训，主动承认错误，采纳王翦的正确建议，从而奠定了胜利的基础。王翦在作战中老谋深算，善于知彼知己，调动敌人，反客为主，以逸待劳，表现出很高的指挥艺术，这是取得灭楚决战胜利的关键。总的看，灭楚作战兵力集中，目标明确，决心坚定，在战略和战役指挥上都比灭赵作战提高了很大一步。

四、扫除燕、代残余势力，东进灭齐，完成统一大业

秦灭楚之后，天下大势已定，统一战争接近尾声，进一步平

---

① 《秦集史·国君纪事十九》。

灭燕、代残余势力和消灭齐国，已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秦王政二十五年（燕王喜三十三年，代王嘉六年，前 222 年），正当王翦、蒙武进军江南之时，嬴政以王贲、李信为将，率兵进入辽东，迅速击败燕军，俘虏燕王喜，燕国灭亡。旋即回师击代，代王嘉兵败被俘，代亡。不到半年，全部消灭了燕、代残余势力，只剩下一个孤立无援的齐国。

这时齐国面临着随时被击灭的危险，其统治集团内部仍然混乱不堪，民心涣散，人无斗志。在秦军旦夕且至的情况下，齐王建想亲自到秦国去入朝，被守城门的司马劝阻，不得已还车而返。有人提出建议，把齐国全部动员、武装起来，把逃亡在齐国的楚、赵、燕、魏、韩的贵族都利用起来，主动出击秦国。齐王建感到没有什么希望，没有采纳这一建议。最后，齐王建和齐相后胜决定，把齐军主力集结在齐国的西部地区，准备抵抗秦军的进攻。这种单纯在边界某一个方向集中主要兵力设防的作法，恰恰造成了其他方向的薄弱和国内的空虚，给了秦军在其他方向突袭齐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的可乘之隙。

秦王政二十六年（齐王建四十四年，前 221 年），嬴政命王贲、李信、蒙恬等率兵攻齐。秦军避开齐军的正面防御，从燕国的南部进军，由齐国的北部突入，直插临淄。齐军几乎没有采取什么抵抗行动，“民莫敢格者”①。长期潜伏在齐国的陈驰等人，乘机向齐王建施加压力，“约与五百里之地”②，诱其投降。齐王建投降后，被押送到共（今河南辉县），放到一片松柏林中，活活饿死。

至此，秦统一中原的战争宣告胜利结束，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空前的大统一。

---

① 《史记·田齐世家》。

② 《战国策·齐策六》。

第四节　秦统一战争胜利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

秦之所以能够取得统一战争的胜利，完成统一中原的大业，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三点。

首先，秦的统一事业适应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历史的必然。我国社会自远古时代起，便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逐渐地由原始人群而至氏族公社，由氏族公社而至部落联盟，由部落联盟而至实行奴隶制的诸侯和国家，即不断地由分散、割裂的状态而走向集中和统一，这是历史发展中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在长达近 2000 年的奴隶制时代，由于社会生产的进步和古代文明的培育，渐渐由多民族融会成一个强大的中原华夏族，基本上形成了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文化生活、共同的语言文字和共同的活动空间，并不断地吸收和融合着周边的其他少数民族，从而使统一的规模、深度和广度都不断地发展扩大，这是实现中原地区和部分周边地区进一步空前统一的深厚的历史基础。到了战国时代，封建制逐渐取代了奴隶制，诸如封建土地私有制取代了以往的井田制，封建职官制取代了以往的世卿世禄制，封建郡县制取代了以往的分封制，封建诸侯国的军队取代了以往的各级奴隶主贵族武装，等等。所有这些，都为进一步实现封建统一准备了必要的历史条件。但是，七雄并立的存在，恰恰是统一的最大障碍，是历史发展的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七雄之间的战争，一方面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给社会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以战争为手段实现新的统一的客观历史的需要。秦灭六国的统一战争，在客观上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渴望和平和统一的愿望，这是它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其次，秦国的强大，关东六国的衰败，是统一战争取得胜利的客观条件。在七雄并立的形势下，所谓统一，就是要由一方消灭其他六方。七雄中没有谁不想扩大自己的统治，没有谁不想由

自己来实现统一。但是，到底谁能够统一，谁能够消灭其他六方，这是由七雄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基本条件综合比较决定的。秦国的富强，是从商鞅变法开始的。各国变法相比，以秦的变法最彻底，改革最深刻，因而发展得最快。在政治上，秦国的组织力和动员力都极强，实行高度的集权制，地方普遍实行郡县制，基层有严格的什伍制，法制严明，全国上下集中统一，建立了极为巩固、坚强而有效的统治。其各级官吏也比较廉正能干，很少腐败现象，如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所规定的那样，要求为吏者必须“精洁正直”、“审悉无私”、“安静无苛”、“除害兴利”、“兹（慈）爱万姓”，严禁“居官善取（巧取豪夺)”、“贱士（轻视人才）而贵货贝”等等。尤其用人方面，秦国极其重视人才，没有排斥思想，从李斯、尉缭到顿弱、陈驰等，都是关东六国之士，无不委以重任。在经济方面，秦国的实力也是最雄厚的，其国土“居天下之半”，占有富饶的关中和巴蜀，并拥有中原的一些重要地区，加之长期厉行耕战政策，为进行统一战争创造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军事上，秦军数量众多，兵种齐全，装备精良，战斗力强，能够适应当时条件下各种复杂环境中的作战。所有这些，都是关东六国所望尘莫及的，是秦能够完成统一事业的最基本条件。关东六国到战国末期时，政治上无一不是腐败的，军事上均已衰弱不振，经济实力也远不如秦国强大，这是导致它们一一灭亡的最基本原因。

再次，正确的战略指导，是取得统一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上述历史的和现实的各种客观条件，都给统一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而把可能性变为现实，归根结底要通过正确的主观指导下的战争实践去实现，舍此别无他途。秦国的主观指导当然也出现过一些失误，但在主要方面是正确的，因而保证了战争的胜利，就战略指导而言，比较成功的经验有四：

（一）利用关东六国的矛盾，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秦国的实力虽然很强，但关东六国一旦联合起来，秦要取得胜利将是很难的。因此，各个击破是唯一正确可行的方针。秦在统一战争中自

始至终坚持了这一方针，从而赢得了胜利。这一经验被后来的封建统一战争所借鉴，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针对关东六国的不同战略地位，正确选择战略突破口——攻赵。关东六国的战略地位各不相同，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赵、楚两国，赵为关东之屏障，楚为关东之后盾，其余四国皆不堪重击。只有首先破赵，全局上才能顺利展开；否则，虽能轻而易举地消灭韩、魏，其余四国则难以攻取。秦的各个击破首先从赵国入手，连续对赵作战 9 年，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虽然在作战过程中发生过局部的挫折、失误和反复，但始终保持了全局上的主动地位，避免了根本性的挫折和反复。自灭赵之后，统一战争遂成破竹之势，直至最后胜利。这一切，都是同战略突破口的正确选择——首先攻赵密切相关的。

（三）因情料势，量敌用兵。关东六国的大小强弱各不相同，对于秦国来说，楚是大敌，赵是强敌，韩和魏是小敌，齐和燕是弱敌。对赵作战时，虽投入了数量众多的兵力，但没有倾全力，孤注一掷，这是正确的，因为当时尚有实力雄厚的楚国存在，在兵力使用上不能不留有充分余地。对楚作战时投入了全国最大的兵力，这也是必要的，允许的，因为当时赵国已经灭亡，解除了后顾之忧，有利于加速统一战争的进程。对其余四国的作战，兵力使用更为灵活，根本没有实施大规模的动员、部署和调整，而是分别各以一部兵力相机歼敌和攻取。这样做，既保证了重点，又关照了全局，没有顾此失彼的现象，从而达到了各个击破的目的，取得了全面彻底的胜利。

（四）巧用间谍，密切配合军事进攻。在长达 16 年的统一战争过程中，秦国的间谍外交攻势始终没有间断，既破坏了关东六国的合纵抗秦，又对关东各国的君臣起了离间和分化的作用，并除掉了个别的抗秦名将和大臣，从而给军事进攻以直接而有力的配合。这是秦国战略指导非常出色的一个方面，是构成秦同六国之间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不能说统一战争的胜利，主要是靠外交策略的保证或间谍运用的巧妙。六国所以不能合纵抗秦

而灭亡，主要原因是其内部政治腐败，国君昏庸，大臣受贿。秦国恰恰看准了这种情况，其外交策略和间谍行动才得以成功，从而保证了统一战争的胜利。

从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起，我国历史结束了长期以来分裂割据、混战纷争的局面，建立起一个空前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的国家。斯大林曾经指出："如果不能摆脱封建分散和诸侯混乱的状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指望保持自己的独立和真正发展经济和文化。只有联合为统一集中的国家，才能指望有可能真正发展文化和经济，有可能确立自己的独立。"① 在秦王政领导下所完成的统一事业，对于进一步促进中华民族的融合、团结、发展、壮大，对于进一步促进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进步，对于维护我们民族和国家的独立、尊严、团结、统一，都具有十分重大而长久的历史意义。自从秦王朝完成统一之后，在我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虽然也出现过某些分裂割据的状态，但统一始终是历史的主流。我国封建社会曾以它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屹立在世界文明的前列，在世界上享有盛誉，这同我国很早就实现了封建统一是密切相关的。一句话，秦王朝开创了我国历史上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的国家，奠定了我国封建社会长期统一的基础。

① 斯大林在莫斯科八百周年纪念日的《贺词》，见《斯大林文选》（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精装本，第503页。

第三章　秦代的军制

秦王朝建立了封建统一的政权和封建统一的军队，也相应建立起封建统一的军制，从而奠定了我国二千余年封建军制的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秦代军制的政治、经济基础

一定的军事制度，是构成国家的基本制度之一，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受一定的政治制度支配的。秦代的军制是和秦代的政治、经济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统一六国的战争一结束，秦王政便立即开始着手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封建王朝。他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确立各项基本政策和制度，不断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

在政治上，首先确立的就是至高无上的皇权。战国及其以前，最高统治者一般都自称为"王"，嬴政认为自己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德高三皇，功过五帝，"王"的称号不足以表示其特殊的尊贵，遂把古代传说中最受人崇敬的三皇五帝的称号合而为一，号称"皇帝"。并规定：只有皇帝才能自称"朕"；只有皇帝的印章才能用玉雕刻，称为"玺"；皇帝的"命"和"令"分别称为"制"（意谓法典制度，神圣不可侵犯）和"诏"（意谓最高指令，不得违逆）。还下令废除了过去"子议父，臣议君"的"谥法"，规定自嬴政开始称"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①。从此，"皇帝"成为我国封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建社会中拥有一切最高权力的统治者，也是封建地主阶级国家的代表和象征。皇帝集各种最高权力于一身，这就为军队的统一和兵权的集中确定了首要的原则。

其次，就是确立政权体制，上自中央下至基层，建立起严密的封建统治机构。在皇帝的直接领导和控制下，秦代的中央政府由三公九卿组成。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主管政务，太尉主管军务，御史大夫掌图籍章奏，监察百官。他们都分别向皇帝直接负责，即三公分职，互相制约，以利皇帝独揽大权。凡军国大计，往往先经群臣集议，尔后由皇帝做出决策，不得由三公自行其是。三公可秉旨行事。与三公地位相近的，还有“前后左右将军，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绶”①。他们不是政府的官员，而是皇帝的信臣，朝廷的支柱，随时准备听从皇帝的调遣，去统兵作战；并在皇帝的授意下，可随时同三公九卿共谋军国大计。九卿也称列卿，实际数目不止九个，凡主管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属于九卿之列。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奉常，掌管宗庙礼仪；郎中令，掌管宫廷内的警卫和侍卫；太仆，管理宫廷车马；卫尉，掌管皇宫的警卫；典客，管理少数民族的事务及外交；廷尉，负责司法；治粟内史，掌管国家财政税收；宗正，管理皇室宗族内部的事务；少府，掌管全国山河湖海的税收和手工业制造，专供皇室之需；将作少府，掌管宫廷建筑；中尉，掌管京师警卫；主爵中尉，管理列侯爵秩，等等。所有三公九卿都由皇帝直接任免和调动，按规定领取国家俸禄，概不世袭。三公九卿都各有自己数量不等的僚佐，从而构成中央政府的各个办事机构和工作部门。秦代的地方政府，由郡、县、乡三级构成。秦始皇二十六年（即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由是年起秦王政改称秦始皇），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在李斯的建议下，彻底废除了传统的分封制，将全国划分为36郡。后来随着边境的开发和郡治的调

① 《汉书·百官公卿表》。

整，增至46郡①。每郡置郡守，掌管全郡政务；置郡尉，协助郡守掌管全郡军务；置郡御史，监察全郡官吏及其工作。郡之下为县，万户以上设县令，不足万户设县长，掌管全县政务；并设县尉，协助县令（长）掌管全县军务；设县丞，作为县令（长）的助手并掌管司法。县以下为乡，乡有三老掌管教化；有啬夫掌司法和税收；有游缴掌治安和其他军务。乡以下则为民间的里、什、伍组织：五家为伍，有伍长（亦称伍老）；十家为什，有什长；百家为里，有里正（亦称里魁、里典）。这就是秦王朝的政权体制，同战国以前相比，最大的特点是彻底废除了分封制，全面推行了郡县制，从而大大强化了中央集权，为加强对全国军队的统一管理和建设奠定了基础和保证。

再次，就是确立统一而严酷的封建法律，厉行以法治国，并加强对思想、文化的统治。秦自商鞅变法时开始，以急法严刑而著称。秦始皇本人就非常欣赏《韩非子》一书的作者韩非，曾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② 后来韩非使秦，入狱而死，嬴政甚为后悔。韩非虽死，但其学说却被秦始皇所接受和实行。统一后的《秦律》，就是在商鞅变法以来秦国法律的基础上，参照《韩非子》一书的法治思想，结合统一后的新情况而加以补充、修改、制定出来的，并将其推广到全国范围内执行。《秦律》虽已失传，但从云梦出土的竹简看，它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田律》、《工律》、《厩苑律》、《金布律》、《仓律》、《置吏律》、《军爵律》、《徭戍律》、《游士律》，等等，不下数十种，构成了完整的封建法律体系。它的内容充分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要求各级官吏和民众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否则将受到极为严厉的刑罚。在秦简中出现的刑罚名称有赀（罚款）、髡（去头发）、黥（面上刺字）、笞（杖击）、迁（流放）、耐（去须鬓）、劓（割鼻

① 关于秦代的郡数，历来说法不一，有36郡、40郡、42郡、46郡、48郡等各种说法，学术界多从谭其骧说，兹据之。

②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子)、荃(断足)、斩左趾(砍左脚)、宫或腐(男子阉割,女子幽闭)、戮(陈尸)、磔(分裂肢体)、弃市(刑杀于众,弃尸于市)等等。其他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刑罚名称,还有髌(去膝盖骨)、烹(鼎镬煮杀)、腰斩、车裂、枭首(悬头示众)等等。至于自商鞅变法以来就施行过的什伍连坐以及灭家、灭宗、灭族、夷三族、夷七族、夷九族、夷十族,直至灭里(一里百户皆诛)等等,统一后也都延续和推广开来。这些情况表明,秦代的刑法是空前残酷的,企图把人们的一切言论和行为都束缚于苛法之中,并导致了焚书坑儒的历史悲剧。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为了防止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异端,下令焚毁了除《秦纪》以外的所有历史书籍和非博士官所藏的《诗》、《书》、诸子百家的著作等等;次年,又活埋了四百六十余名所谓"犯禁"的儒生。与这种以法治国的指导思想相一致,以法治军则成为秦代军队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和原则。

在经济上,秦王朝主要进一步推行了封建土地私有制、重农抑商、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以及统一封建租税等制度和政策。自商鞅变法之后,秦国正式承认并保护土地私有制,使封建地主经济在秦国迅速发展起来。统一中原之后,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发布了"使黔首自实田"① 的法令,即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土地私有制,进一步根除原关东六国因社会改革不彻底而保留的某些奴隶制生产关系的残余,促进封建小农经济的发展,使整个秦王朝建立在高度分散的封建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在这个基础上,秦王朝继续执行和推广既往的重农抑商政策,号召劳动人民"勤劳本事,上农除末","百姓当家则力农工"②。对于发展生产致富的人,秦政府给予很大的鼓励和奖赏,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载的乌氏倮和寡妇清,前者让其"比封君","以时与列侯朝请",后者受到秦始皇的亲自接见,"为筑女怀清台",使他们都获得了

① 《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三十一年。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

“礼抗万乘，名显天下”的荣誉。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和加强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管理和保证军国之需，秦始皇下令统一了货币、度量衡和税制。将货币分为两等，以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每镒二十两为一金；以圆形方孔的铜钱为下币，每钱半两。把商鞅变法时制定的度量衡制推行到全国，作为标准器具。并制定了各种统一的租税制度，见于文献记载的即有田租、户赋、口赋、商税、山泽之税和其他杂税等等。但是，各种租税的税率制度，由于历史文献的不足，未能保存下来。《汉书·食货志》说：“始皇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淮南子·兵略训》也说，秦“二世收太半之赋”。所谓“泰半”或“太半”，实际上就是指各种租税的总计约占劳动者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这较战国时代许多诸侯国实行过的“什一之税”，显然大大提高了税率，因而后人往往夸大地说，秦代的租赋“二十倍于古”。这些经济制度和政策、措施，为建设强大的封建国家军队，特别是为实施广泛的郡县征兵制和提供武器装备、后勤保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述情况表明，秦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封建王朝，它开创了许多有利于国家统一的政治、经济制度，促进了我国历史的发展。秦代的军事制度，就是从上述政治、经济制度中产生并建立起来的。上述政治、经济制度，是构成秦王朝高度集中统一的重要方面，也是秦王朝高度集中统一的保证和依靠。

第二节　军事领导体制

秦代的军事领导体制，是在统一前秦国军事制度的基础上，结合统一后的新情况修改制定而形成的。它的基本特点同秦王朝政治上的高度中央集权相一致，将一切军事大权，诸如军队调动、作战指挥、部队管理、国防建设等等，都高度集中在皇帝个人的手中。

一、兵权高度集中

秦代征调军队的大权完全操在皇帝的手中，其他任何一级政府、官员或将领都无权擅自征调军队，凡是征发军队或调动军队，必须执行玺、符、节三位一体的严格制度。征调文书必须盖有御玺作为依据，否则无效。符（即虎符，铜制的虎形兵符）是专门用于发兵的凭证，征调文书上虽然盖有御玺，但使者若无虎符作验证，命令仍然无效。节为通行凭证，被征调的部队必须持节才能通过各处关隘要道，否则不得放行。这一制度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虎符。虎符开始流行于战国，用铜制做，呈卧虎形，背有铭文，分为两半，右半由国君保存，左半发给地方军政长官或统兵之将，征调某处军队时必须有国君的右半符来合验。现在存世的秦虎符有阳陵虎符（见《秦金石刻辞》）、新郪虎符（见《历代牌符录》）、秦杜虎符（见《文物》1979年第9期）、秦甲兵虎符及秦王命虎符（见《历代牌符录》）等。其中既有统一前之虎符，也有统一后之虎符。例如，新郪虎符载，“甲兵之符，右才（在）王，左才新郪”，即明显为秦王政二十六年以前之物，系战国末期秦攻取魏地新郪（今安徽太和北）后所造；而阳陵虎符载，“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则明显为秦始皇二十六年以后之物。新郪虎符的铭文规定：“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燔燧事，虽毋（毋）会符，行殹（也）。”秦杜虎符的规定与此相同，唯个别文字稍异。这一规定表明，不论统一前或统一后，秦的大军唯有国王或皇帝才能调动，其他任何人都无权支配。这是确保中央集权——皇帝个人专权的关键，对于维护秦朝的统一具有重大的意义。例如，《史记·秦始皇本纪》关于长信侯嫪毐作乱的记载，就很能说明问题。领导这一叛乱的是嫪毐，并有太后作后盾。他们长期以来就掌握秦国的大权，“事无大小皆决于毐”。参加这一叛乱的还有“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高级军政官员。他们事先伪造了秦王政的御玺，并握有太后玺，准

备以此“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为乱”。而当时年仅22岁的秦王政正在雍的蕲年宫举行加冕典礼，尚未正式亲政；他听说嫪毐作乱后，即派人发兵攻毐，战于咸阳城中，仅“斩首数百”人即顺利平灭了叛乱。这一过程说明，尽管太后和嫪毐的权力极大，又假造了御玺，但手中没有虎符，结果还是发兵未成，仅有少数亲信随其参战；而秦王政既有御玺又有虎符，虽身在外地，却能顺利地发兵平叛。从秦二世时赵高发动政变的经过，也可看出大致类似的情形。赵高专权，指鹿为马，说一不二，但他却难以调动军队。政变前他首先策反了其弟郎中令赵成，这是极为重要的，因为郎中令负责指挥宫内皇帝身边的警卫——郎卫，有赵成作内应，即使不能使郎卫人人叛变，但也可使郎卫失去统一指挥和战斗能力。然后赵高又策反了其女婿咸阳令闫乐，令闫乐以“诈为有大贼”作借口，“召吏发卒”①，率千余人至望夷宫（在今陕西泾阳县东南），缴了守卫宫门的卫士、卫令、仆射的械，并杀了卫令，遂在赵成的配合下，得以进入宫中，逼迫秦二世自杀。为什么要“诈为有大贼”？因为无论赵高或闫乐，皆无皇帝的虎符，没有发兵之权；但虎符铭文中有规定，有“燔燧事”等紧急情况例外，只有诈称有“大贼”，作为咸阳令的闫乐，才能临时召集起千余人的队伍。所以，我们从虎符铭文、嫪毐作乱和赵高政变等事实中，可以判定，秦代除皇帝之外，任何权臣都无征调军队之权，这个权力仅仅属于皇帝。

二、临 战 任 将

有关战争问题，战略决策权属于皇帝，战场指挥权属于将军。这一制度在史料中几乎没有什么明文规定，但秦代的战争史证明无不如此。例如，在秦灭六国的统一战争中，不仅对六国作战的总体战略由秦王政做出决定，对其中每一国的战略决策也是由秦

---

① 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王政做出决定。政府中的高级官员，如李斯、尉缭、王翦等等，他们可以提出各自不同的意见和建议，但绝无干预军事行动之权，战争和战略的决策只能由国君做出决定。对统兵将领的任命也是这样，由国君临时做出选择和任命，如灭韩的指挥者是内史腾，灭赵的指挥者是王翦，灭魏的指挥者是王贲，等等，都是秦王政临时指派的。王翦在完成对燕作战的基本任务后，已经退休在家，也没有在政府中担任官职，但灭楚时秦王政又委以重任，让他统率60万大军去作战。再如秦末镇压农民起义军的秦将章邯，他本是政府中九卿之一的少府，与军队无关，但被秦二世任命为统兵将领后，担任秦军统帅达3年之久，直至最后战败投降，秦朝灭亡。将军一旦接受统军作战的任务，便拥有战场指挥的全权。怎样部署，采取什么样的作战方法，包括具有战略性的战役行动，如大规模的攻、守、进、退等等，一切都由主将独立自主地做出决定。将军只向皇帝负责保证作战的胜利，否则受军法的惩处；怎样取得胜利则由将领独断指挥，临敌制宜。例如王翦灭楚，率军达60万之众，几乎“空秦国甲士”① 而委于一人，事关战争的全局和国家的命运，而王翦采取的先进攻、后防御、再追击等一系列重大行动，既非事先与秦王政协商议定，亦非临时向秦王政报告请示，征得同意或批准，秦王政也不从中掣肘，遥控干涉，而是听凭王翦临机制敌，从而保证了灭楚作战的胜利。再比如章邯，长期任将在外，打了一些胜仗，也打了不少败仗，秦二世和赵高对他并不满意，但也没有发生干预章邯军事行动的事件。当然，这并不是说皇帝无权干预将军，皇帝一旦发现任将不当，随时可以撤换将军，如灭楚作战时，就曾撤换李信，改任王翦，但皇帝不任意干预将军的指挥行动，这几乎是定制。将军独立自主的作战指挥权，仅仅限于作战期间，作战任务一结束，便立即交出兵权，脱离部队。至于将军以下的各级指挥官，他们也当然都有各自相应的指挥权，但他们的独立性较小，必须在行动上绝对接受主将的

①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指挥和节制。如果客观上需要有几个不同方向的独立作战时，则由皇帝分别任命不同的将军来指挥，在灭赵作战过程中就曾多次如此。除作战指挥外，其他如执行屯卫、戍边任务的部队，其指挥体系也是如此。这一制度是战国时代逐步形成的。春秋以前，战争规模较小，作战时间较短，战争、战役、战斗往往不甚区分；朝廷高官也往往是出将入相，文武不分，没有常设的专职将军，打仗时多由国君亲自统帅军队。战国以后则不同，战争规模扩大，时间较长，战场指挥越来越复杂，战争、战役、战斗已有所区分，战略指导和战场指挥已有明显的分工，专职将军已经出现，国君很少再亲自率兵打仗，但又深恐兵权旁落，因而逐渐形成了临战命将制。这样做是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在冷兵器时代，大部队集团作战，指挥、交通、通信手段都简单落后，皇帝委任将军负责战场指挥，既有利于维护皇帝对战争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权，也有利于将军在战场上临机决策，灵活指挥，因敌制胜。

三、军务管理与政权体制相结合

秦王朝平时对军事工作的管理体制，同政权组织相适应，从中央到地方，层层设置军事机构，领导和管理日常军事工作。这一管理体制，分为四级：

(一)在中央政府中，主管全国日常军事工作的是太尉，其地位次于丞相，后来和丞相、御史大夫并称为三公。《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载，秦昭王十四年(前 293 年)，白起大败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 24 万，“起迁为国尉”，《正义》曰：“言太尉”。《史记·秦始皇本纪》十年(前 237 年)载，以尉缭“为秦国尉”，《正义》曰：“若汉太尉、大将军之比也”。郑玄注《礼记·月令篇》说：“太尉，秦官”。《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太尉，秦官，金印紫绶，掌武事”。《通考·职官考一》说：太尉“主五兵”。《通典》和《汉官序》也指出：“太尉，秦官，汉因之”；“汉承秦曰太尉”。这些资料表明，秦代有太尉一官，统一前叫国尉，统一后更名为太尉。太尉的职责是“掌武事”、“主五兵”，即

日常各项军事工作，诸如兵役、训练、供应、武器装备、国防施工等等，都在太尉的管辖范围之内。但是，太尉只要没有被皇帝赋予领兵作战的任务，就没有军事指挥权，不是一个兵权在握的人物，而是皇帝在领导全国军事工作方面设置的高级武官。由于秦王朝的寿命很短，统一后只存在15年，各项新制度都处于草创建设之中，还很不完善，因此，统一后有关太尉的活动以及太尉的属官等等，均未见于史书记载，以致使后人觉得秦代是否存在太尉还是个疑问。其实，空前庞大、统一并拥有百万大军的秦王朝，对全国日常军事工作的管理和领导任务是大量而复杂的，在它的地方各级政府中都设有相应的军事机构，在它的中央政府中当然也必须设有相应的职官和机构，这个职官和机构只能是太尉和逐步发展形成起来的太尉府。应邵注《汉书·百官公卿表》说："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为称。"既然武官悉称为尉，那么国尉或太尉，应是一国之中或中央政府中最高的武职官员。

（二）在郡政府中管理日常军事工作的是郡尉。《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明确记载说："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汉书·百官公卿表》说："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后汉书·桓帝纪》注引《汉官仪》说："秦郡有尉一人，典兵禁，捕盗贼。"郡尉的地位是很高的，仅次于郡守，不论平时或战时，都负责全郡的军事工作。平时管理日常军务，诸如兵役、供应、武器和一郡的治安等等；战时则率领应征的郡兵，随军参战。《资治通鉴》卷七秦始皇二十二年载，项燕大败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胡三省注曰："此郡都尉将兵从伐楚者也。"这说明郡尉也叫郡都尉，是战时郡兵从征作战的主要统率者和指挥者。但是，郡尉和郡守的关系是副将和主将的关系，不论在统一战争中或后来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中，都有郡守直接率兵作战的大量事实，而且在边郡的郡守佐吏中还专门设有"长史，掌兵马"①，可见郡守是全面握有

① 见《汉书·百官公卿表》。

一郡军政大权的，郡尉是在郡守的领导和节制之下主管一郡军事工作的。平时，郡守主政，郡尉主兵，二者又有一定的相互制约的作用。和中央政府中的丞相、太尉等一样，郡守和郡尉都没有自行征兵或调动部队的权力，只有接到皇帝的命令和以虎符为凭，才能征调军队，统兵作战。

（三）在县政府中主管日常军事工作的是县尉。《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对于这段史料中"皆有丞、尉"一语是否属于秦制，学术界颇多疑问①，有些人认为秦代不存在县尉。其实，在《商君书·境内》篇中就曾多次提到县尉，如"爵吏而为县尉"、"其县四尉"、"訾由丞尉"等等，这说明早在战国中期秦国的各县都普遍设置了县尉，而且不止一个。再从《史记·陈涉世家》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将尉醉，广故数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众。尉果笞广。尉剑挺，广起，夺而杀尉。陈胜佐之，并杀两尉。"这里的两尉只带戍卒 900 人，其地位比郡尉显然要小得多，和《后汉书·百官志》所说"尉，大县二人"等情况是颇为符合的。《汉书·樊哙传》也讲到"攻圉都尉"（事在秦二世三年十月）的作战，颜师古注曰："圉即陈留圉县。"那么圉都尉，则显然即是圉县的县尉。此外，还有睡虎地秦简更是多次提到有关县尉的事。如《效律》中规定："尉计（县尉的会计）及尉官吏节（即）有劾（意谓有罪），其令（指县令）、丞坐之，如它官然。"《秦律杂抄》中载有："县啬夫、尉及士吏行戍不以律，赀二甲。"又说在戍者筑城或补城的时候，"县尉时循视其攻（功）及所为，敢令为它事，使者赀二甲"。以上这些史料都表明，在秦代设有县尉一官，不仅有县尉，而且有相当的工作人员，从而构成县政府的一个军事部门。其职责大体与郡尉相似，平时管理兵役、治安、国防建设等方面的日常军务，战时则率领县

① 参见《秦汉官制史稿》第三章第一节之二。

的地方部队应征参战。

（四）在乡政府中管理日常军事工作的是游缴。其主要任务是“缴循禁贼盗”①，维持地方治安，当然也必须接受和完成郡、县所赋予的其他方面的军事工作。乡以下则为基层社会组织的里、什、伍等等，皆军政合一，有关军事工作分别由里长、什长、伍长兼管，不再设专职军事人员。

这样，上自中央下至基层，与政权机构和居民组织相适应，层层设立管理日常军务工作的职官或负责人，既能保证重大问题的决策权掌握在皇帝手中，又能保证大量日常工作的顺利开展和进行。这就是秦代的军务管理与政权体制相结合的制度。

四、部队统率分权制

秦代的百万大军，除战时因作战需要分别统率于由皇帝临时任命的将军外，平时则根据部队性质、任务、情况的不同，分别统率于各个不同的部门和不同的官员，这些部门和官员之间互相制约，不发生横向隶属关系，以防军权旁落或集中于皇帝之外的他人之手中。京师禁卫部队的统率办法是一分为四：负责宫殿宿卫的郎官卫队，由郎中令统率；负责皇宫警卫的卫士部队，由卫尉统率；负责京师治安的卫戍部队，由中尉统率；屯驻京师的机动部队，由皇帝派出监军使监护，其日常训练和管理由各部校尉负责。郎中令、卫尉、中尉以及护军、监军使等，都分别直接向皇帝负责，而不是统于太尉或丞相。地方部队的统率办法是多重配合与制约：各郡各县的部队由郡尉、县尉直接统领，但分别受郡守、县令（长）的节制，以利互相制约；郡以上不分区设立军事指挥机构，以防地方部队的军权集中；对于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险关要隘之处，则派有专门的守备部队，由关都尉统率和指挥，与郡、县部队相互配合、制约。边防部队的统率办法是集中与分散

① 《汉书·百官公卿表》。

相结合：属于边郡、边县和边境关都尉的部队，即分别由郡、县、关都尉统率；属于执行作战任务的边防部队，则由皇帝所任命的将军统率。这些统率办法表明，秦代深刻总结和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彻底废除分封制的基础上，为了防止军权旁落、将帅拥兵、地方割据、尾大不掉等问题的发生，广泛实施了部队统率分权制的各种措施，从而确保皇帝对军权的高度集中和统一。这些制度和措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对于维护和加强中央集权，有其进步的意义和作用。

五、军事行动监护制

秦代设有监察部队行动的官员，以确保军队在政治上忠于皇帝。《汉书·百官公卿表》载："护军都尉，秦官"。这表明秦代设有专门监护部队行动的军官，即护军都尉，以便随时派往部队，掌握部队的行动情况。汉承秦制，西汉时驻守京师和关中的北军始终设有"监军御史"或"监北军使者"①，秦代亦当如此，对京师机动部队平时即派有监军官员，负责其调动，监护其行动。秦始皇三十五年派其长子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②，当时蒙恬正率领数十万大军同匈奴作战兼筑长城，由扶苏监军，这是对大规模边防作战部队派出的最高级的监军使者，其地位远在蒙恬之上。后来秦始皇病死，二世胡亥篡立，在矫诏赐扶苏和蒙恬死的同时，既派王离接替蒙恬的职位，又"以李斯舍人为护军"③，以确保这支部队的稳定。对地方部队也同样，秦代在各郡均派有监御史，其任务是"掌监郡"④，对一郡之事无所不监，当然也包括地方军事工作在内。如刘邦刚刚起义据守丰县（今属江苏）时，就立即有

① 参见《汉书·胡建传》和《汉书·刘屈氂传》。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 《史记·蒙恬列传》。

④ 《汉书·百官公卿表》。

"秦泗川监平（即泗水郡监御史名平）将兵围丰"①，可见监御史不仅有监察地方军事行动之权，而且必要时有直接率兵作战之权。这样，不论京师部队、边防部队或地方部队，根据其不同情况，分别派有护军都尉、监军使者、监御史等不同名号的监察官员，对部队行动实施监视。这就是秦代的军事行动监护制，是构成秦代军事领导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秦代军事领导体制的根本特点，就是皇帝对兵权的高度集中，上述各项制度的建立，其实质都是为这一特点服务的。这些制度的确立，表明我国自秦代开始，真正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军队，从而发挥着维护全国统一的作用。

第三节　武装力量的编成

统一后的秦代军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支全国统一的封建军队。它在原来秦国军队的基础上，适应全国统一后新的形势、任务、环境、条件和各种复杂情况的需要，在诸多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尤其是武装力量的区分、布局、建设、编制等方面，创立出不少新的制度和措施，从而形成全国统一的武装力量体系。

一、武装力量的区分和布局

秦王朝统一中原和部分周边地区后，国土空前辽阔，其武装部队所肩负的任务较统一之前复杂而艰巨得多。统一前，秦军的根本任务只有一个，即据守关中，东争天下。这是全部秦军的共同责任，因而武装力量的区分和布局，既不明显，也不严格。统一后则不同，秦军的根本任务有三：一是确保关中的安全。关中地区是秦王朝的京师所在，是秦王朝夺取天下和控制天下的战略根据地。关中的安危，实系全国的安危，正如贾谊在《过秦论》中指出的那样："天下已

① 《史记·高祖本纪》。

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因此，秦王朝不能不用强大的武装力量来保卫关中，以利居重驭轻，威慑天下。二是有效地控制中原。中原地区历来为群雄所割据，秦灭六国后虽然采取了各种严厉的措施，铲除了割据势力，但各种反秦思想仍普遍存在，危机四伏。秦始皇曾四次东巡郡县，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弹压人们的反抗思想。中原的安危，关系着国家的统一与分裂，因此，秦王朝不能不用足够的武装力量来控制中原以及其他各地郡县，以保证国家安宁与统一。三是强化边防守备。随着统一的中央政权的建立，同周边各个少数民族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北击匈奴、南平百越之后，边防守备任务空前繁重起来，北方的匈奴骑兵威胁到关中和中原的安全，岭南的广大地区需要巩固地加以占领，秦王朝不能不用众多的武装力量来守卫边疆，以维护和巩固其对全国的统治。因此，秦王朝的现役武装力量区分为京师禁卫部队、郡县地方部队和边防守备部队等三大部分，并按照这一构成实施总体布局。

京师禁卫部队，是皇帝直接掌握的一支劲旅，总兵力约十万人。其使命是确保皇帝、皇宫、京师和关中地区的安全，并具有居重驭轻、战略机动的性质。其中郎卫负责皇帝警卫，由郎中令指挥，约千人左右，全部由武装郎官组成。所谓郎，春秋战国时统称郎中，是国君身边的心腹侍从，逐渐发展为郎官卫队。秦代郎官数量巨增，分为中郎、郎中、外郎（亦称骑郎）三种，在郎中令的指挥下，分别由中郎将、郎中将和外郎将（即骑郎将）统领①。《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二世以罪过连逮少近官三郎”，就是指的上述三种郎官。三种郎官的分工有所不同，中郎侍卫于禁中，郎中侍卫于宫中，外郎侍卫于宫外，但总的职责都是“执戟侍宫殿”②，“出充车骑”③。郎官一般由高级官僚子弟充任，多

---

① 参见《秦汉官制史稿·论秦汉郎官、博士制度》。

② 《初学记》十一。

③ 《汉书·百官公卿表》。

以军功拜除，深得皇帝的信任。各种郎“皆无员，多至千人”①。这支庞大的武装郎官集团，既是皇帝的警卫，也是皇帝的参谋，并可随时升任部队指挥官或政府官吏，因此，是构成秦代武装力量的重要骨干。卫士部队，负责皇宫警卫，由卫尉指挥。秦代的宫室规模极为宏大，史载“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②，以备皇帝行幸。因此，需要大量的卫士部队保卫皇宫的安全。根据汉初尚有卫士两万的规模，秦代卫士当在三万左右，分别守卫各处宫室及陵园。卫尉的属官有丞，是其助手；有公车司马令，“掌殿司马门”③；还有卫令（亦称卫士令），直接统领卫士警卫各处宫门。卫士不同于郎官，他们是皇帝的亲兵，属于服正卒兵役的士兵，由各郡县挑选而来，训练有素，是一支很精锐的武装部队。卫戍部队，负责京师治安，由中尉指挥。《汉书·百官公卿表》说：“中尉，秦官，掌缴循京师，有两丞、候、司马、千人。”其中两丞是中尉处理日常事务的助手，候、司马、千人都是中级军官，直接率兵执行警卫京师的各种任务。这支部队的性质、地位、来源、兵力等情况，大体与卫士部队相同，只是任务的分工有所不同而已。屯驻京师的机动部队，系精锐之师。史载秦二世元年“尽征其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藁，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④，就是指的屯驻京师的机动部队。这支部队的素质很高，全部由郡县精选来的材官蹶张之士组成，兵力为5万人，驻屯于咸阳附近各地，是保卫京师和关中地区的主力，也是全国的重要战略机动部队。它既不属于卫尉，也不属于中尉，而是由皇帝直接掌握，平时派中领军、领军使等监护，分屯按各部由校尉负责训练；战时或遇有非常情况，则由皇帝委任将军实施统一指挥。

---

① 《汉书·百官公卿表》。

②④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 《通典·职官七》。

郡县地方部队，分别由各郡县服正卒兵役的士兵构成。其主要任务有三：一是进行军事训练；二是确保地方治安；三是随时听命于国家的统一调遣。由于秦代在废除分封制的基础上，实行居重驭轻、强干弱枝、强边固防的政策，因而各地郡县的常备武装力量不多。例如，陈胜、吴广起义时，仅以戍卒 900 人就迅速攻占了秦的许多县城，攻陈（今河南淮阳）时不过“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①，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激烈战斗就夺取了陈郡。陈胜派武臣、张耳、陈余去河北，仅率兵 3000 人很快即夺取 10 余座县城。刘邦起义时只有“数十百人”②，沛县（今江苏沛县）的县令竟吓得不敢出战，被迫“闭城城守”③。项梁、项羽起义时仅叔侄二人，在公堂上公然杀了太守殷通，又击杀太守府的人，便轻易夺取了会稽郡（郡治吴，今江苏苏州）。这些情况表明，秦代地方郡县武装力量确实是比较弱小的。但是，从宏观上看，全国 46 郡（加内史为 47），见于史料记载的县有 300 多个，其中除部分边境郡县外，内地郡有 34 个，约 290 余县，其动员武装力量的能力可达 200 万以上，日常地方武装至少在四五十万以上。因此，地方武装实为秦代武装力量的基础，京师部队和边防部队从地方武装征调而来。

边防守备部队，一般由三部分构成。其一是边境郡县的地方部队，负责各郡县的边境守备，并负责本郡县的治安。其二是关都尉的部队，负责各险关要塞的守备，兵员由内地征调而来。其三是集中屯戍部队，负责大规模边境机动作战，确保各守备方向的安全。集中屯戍部队规模巨大，数量众多，分为北、南两部，由北击匈奴、南平百越的作战部队转化而来。北部约 30 万人，由蒙恬统率，遂逐渐转化为守备部队，长期屯边，防御匈奴。南部约 50 万人，是为南平百越派出的，初期由尉屠睢及各路将军统率，后由任嚣、赵佗等人指挥，平定百越之后，部队分守岭南各地，遂

① 《史记・陈涉世家》。

②③ 《史记・高祖本纪》。

转化为边防守备部队。这两支边防部队约 80 万人，占秦代现役武装力量的半数以上，是秦军的主体。

上述情况表明，秦代武装力量的总体布局，重兵在边防，精锐在关中，关东诸地为郡县武装。这一布局，是同秦王朝大力推行统一、开拓的方针和坚决实行强边固防的政策紧密相关的。

二、兵种与装备

统一后的秦代军队，仍然分为车、步、骑、水四个基本兵种。

车兵虽已不是军队的主体，但仍然是战斗编组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兵种。从秦始皇陵兵马俑出土的情况看，车兵既有单独的编队，也有与步兵相结合的编队，还有与骑兵相结合的编队，并有与步、骑同时相结合的编队。这说明车兵既可以独立使用，又可以同其他兵种配合使用，是车、步、骑联合作战中的重要力量。车兵主要用于平原地区的作战，进攻时用以冲陷敌阵，打乱敌军的战斗队形；防御时用战车布为阵垒，阻止或迟滞敌军的冲击；行军时置于前锋和两翼，有利于保障部队的安全。战车皆为木制、单辕，驾四马——两骖两服。车上有甲士 3 人，御手居中，车左居左，车右居右，一律着金属铠甲。御手因以双手驾御车马，目标明显而无还击之力，故防护十分严密，其铠甲的披膊长及手腕，把臂全部罩住，手上有护手甲，颈部有颈甲，腿部缚有胫缴。战车上装备两套柄长为 3 米的矛、钺和两套弓箭，有的还配有盾和带发射架的弩。战斗时远则以弩箭射击，近则以矛钺格斗。车属徒兵一般为 8 人，其装备与一般步兵相同，其任务是密切与战车协同，既掩护战车的安全，又利于在战车的掩护下扩大战果。

步兵是秦代军队构成中的主体。秦始皇陵出土的绝大部分武士俑都是步兵俑。步兵灵活性大，能适应各种地形、天候和战斗形式，尤其利于在险阻复杂环境下行动，因而其区分和装备都较其他兵种复杂，使用也较其他兵种广泛。其主要区分有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两种。重装步兵多数身穿金属铠甲，手持戈、矛、钺、

殳、铍等长柄兵器，担负着同敌军重兵集团格斗的任务。轻装步兵一般不穿铠甲，持弓、弩等远射武器，配合重装步兵杀伤格斗距离之外的敌军。步兵中百将以上的各级军官，其主要职责是指挥部队作战，安全和自卫甚为重要，所以只穿甲带剑，不持长柄兵器。屯长以下的小吏，既指挥战士作战，又亲自率领战士冲锋格斗，所以既佩剑又持长柄兵器，并和其所率的战士一样，有的穿甲，有的不穿甲。不论进攻、防御或攻城、守险、迂回、包围、伏击、奇袭等各种作战形式中，步兵往往承担主要的作战任务，并最终解决战斗，在值勤、警戒、巡逻等各种勤务中，也往往以步兵为主。因此，步兵是秦代军队中最主要的兵种，在车、步、骑协同作战中，步兵一般居于主导地位。步兵的弱点是快速性不如骑兵，稳固性不如车兵，与车、骑结合才能如虎添翼。所以秦代军队特别强调以步兵为主的车、步、骑协同作战。

骑兵也是秦代的重要兵种之一。统一前秦军有骑万匹，统一后有较大的发展，在北击匈奴和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中都有较多的骑兵参加。从秦始皇陵兵马俑出土的情况看，秦代的骑兵已经配备有齐全的鞍鞯。战马都经过严格的训练和精选，高皆 1.33 米以上。骑士个个精强勇悍，一律穿短甲，手持弓箭。当时尚无马镫的出现。由于没有马镫，骑士两脚悬空，没有着力点，很不利于马上格斗。加之用于斩劈的厚背长刀在当时也没有出现，不论使用长柄击刺性兵器矛、戈、戟或短柄的剑，从马上对敌步兵冲杀都很不便。因此，骑兵的技术、战术发挥受一定影响，主要是发挥其快速机动、突然猛烈、远距离射杀敌步兵集团的优势。这些情况表明，秦代的骑兵和战国时的骑兵一样，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但其地位和作用日趋重要。在秦始皇陵兵马俑中，骑兵既有独立的编队，也有与其他兵种的混合编队，是构成秦代军队的重要兵种之一，在车、步、骑协同作战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尤其在平原旷野和一般丘陵山地中作战，骑兵更是一支强大的机动力量。

水军也称楼船士，是秦代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其数量仅次

于步兵，远远超过车兵和骑兵。统一前秦的水军主要建于巴蜀地区，统一后广建于江南各地，因而规模十分宏大。水军的战船主要区分为大型的楼船和轻捷的艨艟、斗舰等两类，以利水上作战时大、小部队及轻、重战舰之间互相配合。水军的武器装备齐全，除水战特用的钩拒等武器外，凡陆地上作战使用的弓弩、长短兵器、火攻用具等无不皆备。水上战斗时远则以矢弩交射；近则以钩拒、五兵进行攻守格斗，实施猛烈的冲角战和船舷战；一旦有机可乘，便施以火攻。水军不仅仅担负水上作战的任务，它实际上是江南水泽地域的综合性兵种，除水上战斗外，登岸野战、攻城守险等无所不能，战于水上则相当于车、骑，战于陆上则相当于步兵。例如，南平百越时动员楼船士 50 万，既完成了水上作战任务，也完成了陆上作战任务，对开拓和统一岭南广大地区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秦始皇第五次出巡天下时，曾一度在水军的护卫下，长途航行于海上，并亲手以连弩射杀巨鱼。这说明秦代的水军已经具有海上作战的能力，有效地控制着东部沿海的海防。

统一后秦代军队的武器装备，最主要的变化是由原来的以铜兵器为主的时代，加速向以铁兵器为主的时代的过渡。早在战国后期，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铁兵器即已登上历史舞台，中原各主要诸侯国的部队已较多地使用铁戟、铁矛、铁刀、铁剑、铁杖、铁甲、铁匕首等新式武器装备，开始逐渐取代青铜武器。当时相比之下，秦军的铁兵器则远不如关东各国发达。统一之后，既缴获了关东大量铁兵器，又接收了中原冶铁技术，因而加快了向铁兵器的过渡。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就在完成统一六国的当年，秦始皇下了一道销毁兵器的命令，“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这是我国历史上大规模销毁武器的空前记录。这次销毁的都是铜兵器。为什么要把这么多的青铜兵器销毁呢？其直接目的就是禁止民间私藏武器，防止人民和六国残余势力起来造反，同时也表明，已有较多的铁制武器装备部队，所以才有可能把多余的铜制兵器销毁。但是，从青铜武器向铁兵器过渡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在秦代仅

仅是加速，而不是完成。因此，秦军武器装备显示了新旧结合、新旧交替的历史特点，并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1、装备有大量先进的远射武器。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出土情况表明，不论步兵、骑兵或车兵，都装备有大量的弓、弩、箭。规模宏大的一号俑坑，每个步兵都“背负矢箙，手持弓弩”①；二号俑坑还专门有一个弩兵队列。骑兵的武器不是刀、剑、矛，而是“一手牵马辔，一手作提弓状”②，“配备的都是弓箭”③。战车上的甲士，既持矛、戈，同时“亦备有弓箭”④。这些情况说明，弓、弩、箭是秦军最主要的武器之一。秦始皇陵兵马俑出土的弓弩分大小两种，小者射程为150米，大者可达900米，比战国时著名的韩弩六百步抑或过之。大弩的弓干长176.1厘米，径4.5厘米，弦长140厘米，比《考工记》中的有关规定（上、中、下三种弓的弓干长分别合今152.5、145.5、138.6厘米）有很大突破和发展，比战国末楚弓的弓干长（160厘米）也有提高。出土的秦弩机与战国中期的楚弩机相比，弩臂由51.8厘米增至60厘米，悬刀有所增长，望山与弦牙距也有所加宽。出土的数以万计的铜镞，除有一支双翼镞外，其余都是三棱镞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演化的三出刃镞。这是战国末最盛行的类型，其特点是飞行中稳定，方向性和瞄准性较好。还有一种特大的镞，长达41厘米，重约100克，是专门用于强弩的。经过化验分析，秦镞的含铅量高达7.71%，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有毒“弹头”。由此可知，秦军所装备的弓、弩、箭都是当时最先进的远射武器，是构成秦军强大战斗力的重要因素。

2、装备有大量铜制的近战武器。从秦俑坑的出土情况看，秦军的近战武器有长柄的戈、矛、戟、铍，短柄的弯刀和剑，还有某些过了时的镖、殳、钺等等。其中戈、矛、戟、剑是当时流行的武器，铍和弯刀是历史上新近发现。铍的首和剑相似，长约30厘米，装有长约3米的柄，是一种锐利的刺杀兵器。弯刀形如弯

---

①②③④　参见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

月，齐头无锋，两面有刃，是一种砍、钩两用的兵器。上述兵器虽然都是铜制的，但在形制上有很大创新，表现了青铜武器的高度发展。例如，殷周以来的矛头多为柳叶形或长三角形，有较长的筒形骹附以环纽，而出土的秦矛则刃体趋向宽而直，变短并附孔以固骹，通体长度稳定在 15 厘米左右。据《考工记》所载，最长的夷矛不过三寻，约合今 5.54 米，而出土的步兵秦矛有的长达 6.3 米，这是因为步兵用矛远比车兵便利，所以出现了特殊的长矛。春秋时代的剑，一般长 30 厘米左右，战国时发展到六七十厘米，而出土的三把秦剑，分别为 81、89、91.3 厘米，可见剑已由卫体武器和表示身份的象征物发展为近战格斗的重要武器之一。经化验，秦剑由铜锡合金铸成，铜占 76.39%，锡占 21.38%，并有其他 13 种微量元素，相当于中碳钢调质后的硬度。剑身表面经过铬盐氧化处理，埋在地下 2000 多年出土后仍然光耀夺目，锋利如新。这些先进的工艺水平表明，秦军的青铜武器在总体上是精良而适用的。

3、装备有坚实精密的金属铠甲。在春秋以前战士的护体设备主要是皮甲，战国时虽然出现了铁甲，但皮甲仍是重要的装备。《荀子·议兵》中就有“楚人鲛革，犀兕以为甲”的说法，表明战国末期楚军仍以皮甲为主。相比之下，秦军的装备则有进一步的发展，从秦俑坑出土的陶质模拟品看，全部都是金属札叶制成的合甲，品类完备，制作精密。甲衣由前甲（护胸腹）、后甲（护背腰）、披膊（肩甲）、盆领（护颈项）、臂甲（护臂）和手甲（护手）等部分组成，并因兵种、身份、战斗需要的不同而各有不同。步兵的前胸、后背和肩部易受伤害，其甲衣多由前甲、后甲和披膊等三部分合成。骑兵必须便于骑射，其甲衣比较短小，长仅及腹，没有披膊。车御的臂、手、颈易受攻击，其甲衣不仅有前甲、后甲，还有臂甲、手甲甚至盆领。将、佐的甲衣则十分讲究，是革、札结合的花甲，其胸、背、肩部分为皮革；腹及后腰的中心部分是金属小札叶；前甲呈倒三角形，长垂膝间；后甲平直齐腰。秦俑坑没有出土盔、盾，但据古文献的记载，秦军早就有盔、盾

的装备。例如，《诗经·小戎》中“龙盾之合”、“蒙伐有苑”二句，即指秦军大、中两种不同的盾牌，睡虎地云梦秦简中也有大量“罚一盾”的记载；《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前627年）所载，秦军袭郑路过周天子北门时“左右免胄而下”，就是秦军普遍装备头盔的明证。因此，统一后的秦军不可能没有盔、盾的装备。只是由于秦军的尚武精神强，在战斗中往往“跿跔科头贯颐”、“捐甲徒裼以趋敌”①，所以作为艺术品的秦俑才没有盔、盾的出现。

总之，秦代军队的兵种构成是较齐全的，武器装备是精良的，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环境、条件下的作战，因而才能在统一战争中和开拓边疆的战争中取得胜利。

三、平时编制和战时编组

平时编制，是指各个兵种基层分队和小部队的固定编制，它是战时大部队作战编组的基础。秦代军队的平时编制，大体和统一前的秦军相同。由于历史资料的不足，具体编制情况很难做出准确无误的判断。一般说来，步兵的编制分为六级，即：五人为伍，设伍长一人；二伍为什，设什长一人，五什为屯，设屯长一人；二屯为百，设百将一人；五百人，设五百主一人；一千人，设二五百主一人。其中，“二五百主”也称“千人”，已属中级军官。骑兵的编制，从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马俑情况看，很可能是四骑一组，三组一列，九列一百零八骑为一队，并配属战车六乘。这和《六韬·均兵》篇所说“五骑一长，十骑一吏，百骑一率，二百骑一将”的编制，大致相近，但有所不同。车兵的编制，从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马俑情况看，没有步兵配合时，每八乘为一偏（即一行），二偏十六乘为一组，四组六十四乘为一队。这和《六韬·均兵》篇所说“五车一长，十车一吏，五十车一率，百车一将”的编制，也是颇为接近的，但有所不同。当有步兵配属时，则以兵

① 《史记·张仪列传》。

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八人为一个基层单位，六乘为一组，十八乘加指挥车一乘为一队。这和春秋时每乘兵车步卒多至七十二人的编制大不相同，其原因就在于兵种的发展和车、步的分离。春秋是车战的鼎盛时代，以车为主，车、步合编，随着战争的需要和兵员的扩充，车属步卒由十人、三十人……一直增加到七十二人。进入战国以后，步兵成为独立的兵种，并取代车兵而居于主导地位，车、步、骑逐渐按兵种分别编制，因而车属步兵愈来愈少。到了秦代，车、步、骑分编已成定制，作战时的配合是兵种的协同而不是编制的混合。所以，车、步合编的现象已不多见，合编时每乘步卒减少到八人。关于秦代水军的编制，史料阙如，无文献可证。从有关情况分析，很可能和步兵相仿，例如，《史记·张仪列传》所载，秦的巴、蜀水军，用“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每舫即相当于步兵的一个屯。所谓“舫船”，即两船相并。因为一只船载二十五人，不是一个编制单位，所以才合并起来载五十人。再如，《华阳国志·蜀志》所载，“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每艘即相当于步兵的一个什。所谓“大舶船”，实乃“太白船”① 的音误，是一种较小的船，所以每船仅载十人。这两条史料表明，当时的许多水军，实际上即经过一定水上训练的步兵，所以其编制与步兵相类，以适于水、陆两用作战。当然，水军的编制，也有自己的特点。如《太平御览》卷三一五引《越绝书》所载越国的水军，“大翼一艘广丈六尺，长十二丈，容战士二十六人，棹五十人，舳舻三人，操长钩矛、斧者（各）四，吏、仆、射、长各一人，凡九十一人”。这里仅操舟水手即达五十三人，占总编制的一半以上。这种编制方法和特点，统一后的秦代水军也予以继承和发展。不过，一旦登陆作战，大量的水手也同样要转化为步兵参加战斗。因此，古人强调“舡军

---

① 参见《初学记》卷二五所引《蜀王本纪》：“秦为太白船万艘，欲以攻楚。”又，《说文》无“舶”字，汉末以后始有“大舶船”，每船载士达三千人之多。

（即水军）之教，比陵军（即陆军）之法，乃可用之”①，这说明水军的编制以及训练等等，都是和步兵颇为相类的。

秦代军队的战时编组，是在平时编制的基础上，组建为大规模的作战部队，一般称为部曲制。其具体编组的方法是：首先根据作战对象等各方面情况，确定总兵力，任命三军统帅（即大将、上将军，也泛称为将）；在统帅之下，根据作战的需要和总兵力的多少，分设若干个将军（即副将、裨将军，也泛称为将军）；每个将军统率若干个部，部的长官称校尉，即一部一校；每个部下设若干个曲，曲的长官称军候，即一曲一候；曲以下即平时军队的编制，如步兵的千人（设二五百主）、五百人（设五百主）、百人（设百将）、五十人（设屯长）、十人（设什长）、五人（设伍长），以及数量不等的车兵和骑兵。自五百主以上，各级指挥官都设有自己的亲兵卫队，大约占其所率总兵力的十分之一，如五百主的卫队为五十人，二五百主的卫队为一百人，校尉的卫队为一千人，大将的卫队为四千人，等等。凡将军以上皆设有作战指挥机构，称为幕府。幕府中设有各种指挥机关和参谋人员，达数十人之多。作战行动结束后，曲以上指挥机构即行撤销，将军交出兵权，部队恢复平时建制，士兵分别归建或复员。

如果说平时编制最重要的是什伍制，它是组织、训练、管理士兵的基础。那么，战时编组最重要的则是部曲制，是在平时编制基础上组建大规模作战部队的重要手段，是联结统帅和广大士兵的纽带。

第四节　兵役制度

统一后的秦代兵役制度，主要是把原来秦国的郡县征兵制进一步推广到了全国。这一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耕战结合，寓兵于农，以及兵役与徭役的密切结合。其实质就是根据国家和战争

① 《太平御览》卷七七〇，引《越绝书》。

的需要，按郡县行政组织统一征发居民入伍、参战。

例如，《睡虎地秦墓竹简·编年纪》中的主人公喜，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前262年），于秦王政元年（前246年）傅籍，即向政府登记年龄、籍贯、身体等情况，开始向国家服劳役和兵役，接受军事训练，随时准备应征作战。喜后来于秦王政三年、四年、十三年、十五年共四次从军作战；除从军作战外，这期间又先后任过史、御史、令史、狱掾等县令所属的地方小吏。这些情况表明，当时服兵役的主要对象是一般成年男子，一般男子到17岁（即16周岁，我国历史习惯，皆不称周岁，下同）开始傅籍，傅籍者，既是民，又是兵，既在乡从事生产或其他工作，又要随时应征入伍，什么时间入伍服役以及服役的期限和次数，都根据战争的情况和国家的需要而定。同时还表明，征兵对象不仅仅限于普通居民，政府的小吏也是服役的对象。《史记·秦始皇本纪》也有过类似的记载，即秦王政十一年（前236年），大将王翦攻赵，命令“军归斗食以下，什推二人从军”。“斗食”即俸禄在百石以下的小吏，可见小吏是要服役的。上述秦简的材料虽然表明17岁是法定的傅籍年龄，但《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说，长平之战时，秦军把赵军分割包围后，秦昭王亲临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这一史料表明，当时服兵役的最小年龄并不是严格限于17岁，至少在战争需要时可以提前到15岁。此外，《商君书·兵守》篇还记载说，守城作战时要把男、女、老弱分别各编一军，即“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此之谓三军也”。这条史料虽然反映的是守城作战的特殊情况，在时间上属于战国中期，但它说明了秦国兵役制度的重要特点，在紧急情况下一切人都必须服从战争的需要，没有什么年龄、性别的区分，凡是能够在战争中做事的人，都要编组到军队中来，近乎一种全民皆兵的作法。这一作法是秦国长期厉行耕战政策的体现，其基本原则就是兵农结合，寓兵于民，根据需要随时调发，从而在最大程度上保障充足的兵源。

古代兵役和徭役无明确区分，只有“小役”和“大役”的不

同。小役即一般力役，大役即战伐，因此，兵役和徭役紧密联系在一起，“兵役就是广义的力役”①。凡是服役的人皆称为卒，卒就是身穿赤衣而供役使的人。服役者既参加各种徭役劳作，又参加军事训练和捕盗、宿卫、守边、作战等行动，因不同时期参加服役的种类不同，卒的名称和种类也不同，其军事化的程度和性质也不同。按照秦代的法律规定，凡成年男子除残疾者和国家特许“复除”者外，到17岁便要“傅籍”开始服役，一般到60岁止役，有爵的人到56岁止役。这期间每个人的服役种类有三，即更卒、正卒和戍卒。这三种卒，恰恰是徭役和兵役的紧密结合，同时又是兵役制度中预备役和现役的紧密结合。

所谓更卒，即轮番服役的士卒。凡成年男子“傅籍”之后，首先服的就是更卒之役，每年一次，一次一个月。因为服役者每月一更，所以叫做更卒。更卒服役的内容十分广泛，据云梦秦简和其他史料所载，有修筑和维修城垣、道路、河渠、宫苑、帝王陵寝、官府第舍以及漕运委输、马匹保养等等。对服役的质量要求极严，不合要求时不仅更卒本身要受惩罚，主管更卒的官吏也要受到处分。如云梦秦简的《徭律》中规定，更卒所筑的城垣必须保用一年，不足一年而损坏的，主管工程的官吏要治罪，原来筑城的更卒要重新补修，补修时间不计入服役时间之内。这些情况表明，更卒还远不是武装部队，几乎没有什么军事训练和作战任务。但是，更卒并非一般民众，他们已经“傅籍”在册，有了一定的组织形式、纪律约束和指挥体系。他们不仅每年服更卒之役一月，还必须随时听从国家的征调，什么时候战争需要，就什么时候应征参战，参战时间无法定期限，决定于作战时间的长短，一般不中途更换。他们的成员不仅仅有刚刚“傅籍”的青年，也包括已经服过兵役、打过仗但退出了现役的士兵，这些人有相当的军事素养和丰富的作战经验，直到止役年龄之前，仍然属于服更卒之役的更卒。因此，更卒就是秦代的预备役士兵，更卒制度就

---

① 钱剑夫：《秦汉赋役制度考略》第五章第一节。

是秦代的预备役制度。

正卒，即正役士兵。“傅籍”后的青年，服过一年更卒之役以后，便转为正卒①。正卒的服役期为一年，主要任务是参加军事训练和维持地方治安，服役地点在郡县。由于地区特点、个人情况和国家需要的不同，正卒训练分为材官、轻车、骑士、楼船等四种。材官指的是步兵，以勇武强健、力能张强弩为主要要求，因而称为“材官”、“材士”或“材官蹶张”。《汉书·刑法志》说：“汉兴，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国。”可见秦代正卒中的材官训练极为普遍，其制完全为西汉所继承。轻车和骑士，指的是车兵和骑兵，两者都和马密切相关，所以有时也统称为“骑士”或“车骑”，主要是在秦代北部和西北部边郡产马地区的正卒中进行训练。楚汉战争时，刘邦手下的骑士多自称“故秦民”、“故秦骑士”②或秦“里中子也”③，可见秦代对轻车、骑士的训练卓有成效，很多人成为刘邦组建骑兵的骨干。楼船指的是水军，即楼船士，主要训练于江淮地区。南平百越时尉屠睢率楼船士达 50 万之多，皆从东南郡县征集而来，可见对东南地区的正卒，实施的几乎全部是楼船训练。正卒平时驻守于郡县，是名副其实的武装部队，属于郡县常备兵；遇有战事发生则立即行动，听命于国家的调遣，由郡尉和县尉率领出征。这些情况表明，秦代的正卒制度，实质上就是培训战士的制度，使其成为标准、合格的材官、轻车、骑士、楼船士，从而给国家提供训练有素的士兵，以满足在战争中对兵员的需要。由于它所训练的是秦代正规化士兵，所以才称其为正卒。

戍卒，即守边的战士。戍卒与正卒又有所不同，是在已服正卒之役，经过一年军事训练达到了材官、轻车、骑士、楼船士的标准之后，进而转服戍卒之役的。戍卒的服役期限也是一年。但

---

① 更卒转正卒的年龄，秦代史料无明文记载，汉代为 23 岁（但汉代更卒起役的年龄为 20 岁），秦代可能在 20 岁左右。

② 《史记·灌婴列传》。

③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服役种类有二：一是到边防戍守，构成秦代边防守备部队的主体。这部分人是原来正卒中的绝大部分，他们执行着守边、筑城、作战等任务，保卫着秦王朝的辽阔国土。二是到京师屯戍，构成秦代京师禁卫部队的主体。这部分人也称为卫士或卫卒，是原来正卒中的优秀人物，由精选的材官、轻车、骑士组成。他们的职责是警卫皇宫、京师和保卫关中地区，并担负战略机动的任务，除值勤和训练之外，一般不参加军事筑城等徭役性劳作。戍卒服役期满一年之后，即退出现役，转为预备役，继续服每年一月的更卒之役，并随时准备应征参战。这些情况表明，秦代的戍卒制度，实质上就是国家常备军制度。它和正卒的区别正在于此，正卒是郡县常备军，重在训练战士；戍卒是国家常备军，重在守边作战，保卫国家。

更卒、正卒和戍卒制度，体现了民与兵的结合，劳役与兵役的结合，预备役与现役的结合，地方武装与国家武装的结合。每一个成年男子，既是社会的生产者，又是国家的保卫者，兼生产、劳役和兵役于一身。这就是秦代郡县征兵制的实质。这一制度建立在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基础之上，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是相适应的，不仅对秦初的国防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汉代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

但是，更卒、正卒和戍卒制度，在秦王朝并没有获得始终如一的贯彻执行。据刘昭注《后汉书·郡国志》引《帝王世记》所载，战国后期秦及东方六国总人口约一千余万。秦统一后由于大规模开边用兵，加之修建阿房宫等用去大量劳动力，因而深感兵员不足。因此，除更卒、正卒、戍卒的正式兵役制度外，秦政府以严酷的刑罚为手段，于秦末广泛地施行谪戍、谪发和赦发等方法，即巧立各种名目，强迫各种所谓有罪或犯禁的人戍边、充军、服劳役，以补充兵员不足。例如，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①；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同年又往西北边境“徙谪，实之初县”①；次年，“適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②；三十五年，作于阿房宫、郦山墓的“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③；同年“益发谪徙边”④；秦二世元年，“发闾左適戍渔阳”⑤；同年赦郦山刑徒数十万，“授兵以击”⑥起义军，等等。这些情况表明，到秦末已几乎没有什么更卒、正卒、戍卒的正常制度可言，各种征发都由最高统治者任意决定。从而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引起了民怨沸腾的严重后果。

第五节　军事法规

统一后的秦代军事法规，基本上承袭了商鞅变法时所制定的各项制度，即以军功爵制为核心，实施严格的赏罚。按《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记载，秦代军功爵共分20个等级，其名称是：一、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

在一般作战中，普通士兵能斩得敌人一个首级，即赐爵一级，田地一顷，住宅地九亩，并可役使一人为自己的农奴（即“除庶子一人”），愿意做官的可做五十石俸禄之官。战斗中退缩不前的人，当场处以刺面、割鼻等刑罚。军官阵亡，就加刑于他的卫兵，卫兵中只有斩得敌人首级的才能免罪。作战中完成任务好的评为“最启”，不好的评为“最殿”，两次评为“最殿”的就开除军籍。一伍之中有一人临阵脱逃，其余四人都要连坐，只有斩得敌首才能免罪。一支百人的队伍，一次作战中如能斩敌首33个，百将和屯长皆赐爵一级；如果未能斩得敌首，百将和屯长都要处死。大

---

①②③④⑥《史记·秦始皇本纪》。

⑤《史记·陈涉世家》。

将率领大部队作战，在攻城围邑中斩敌8000以上，或在野战中斩敌2000以上，各级军官都在原爵位的基础上晋升一级，其中大将、车御、参乘晋升三级；原来是地方小吏的晋升为县尉，并赏赐六个俘虏做奴隶，外加赏5600个钱；原来是客卿而做军佐的，晋升为正卿。落实爵赏也极为严肃认真，首先陈列敌军的首级三天，检查三天，然后由将军提出准确无误的战功和应得的爵赏；如果县衙门在落实爵赏时超过三天或发生差错，那就撤去该县的四个尉官。应得爵赏的人如已战死，就由其家里的人来继承爵位。爵位越高，特权和待遇就越多：爵至七级公大夫可与县令伉礼；九级五大夫可税邑300家；十级左庶长以上可税邑600家；二十级彻侯则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并得臣其所食吏民。有爵位的人犯罪，可以以爵抵罪，还可以用爵为亲属中有奴隶身分的人求得赎免。

这就是秦军以军功爵制为核心的赏罚制度。其基本精神就是以法从严治军，把厚赏与严刑紧密结合起来，认真贯彻执行，从而高度发扬了秦人固有的尚武传统，是构成秦军强大战斗力的重要精神要素。正如《荀子·议兵》说："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土地狭隘贫瘠），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阸，忸之以庆赏，鰌（凌逼）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阸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

但是，军功爵制的贯彻执行，在全国统一之后，较统一之前逐渐发生两点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官与爵的关系发生了分离的趋势。原来"尚武功"的精神主导一切，军功、赐爵和授官三者一致，只有斩敌首、赐爵"乃得人（入）兵官之吏"①。"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②。也就是说，当官为吏，首

---

① 《商君书·境内》。

② 《韩非子·定法》。

先必须有爵。这一制度曾受到《韩非子》的指责。《韩非子·定法》篇说:“今有法曰:‘斩首者令为医、匠,’则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齐药也,而以斩首之功为之,则不当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秦始皇十分崇拜《韩非子》一书,很可能受到上述思想的影响,加之统一前后对各方面人才的需要,遂致官、爵逐渐分离。例如,秦始皇时李斯先为廷尉后为丞相,尉缭由“布衣”当上国尉,隗状、王绾也都做过丞相,秦二世时冯去疾为右丞相,等等。这些人在历史上既未曾见其带兵打仗,有斩首之功,也未曾见其有任何爵位的记载。云梦秦简《置吏律》中有一条规定说:“官啬夫节(即)不存(在),令君子(指有爵位的人)毋(无)害者若令史守官,毋令官佐、史守。”为什么官啬夫不在时要叫有爵的君子代理?而不让官府中的佐、史等小吏来代理呢?因为有秦一代始终把爵看得重于官,而佐、史小吏中很多人没有爵,所以要找个有爵的、办事谨慎的(“毋害者”)君子来代理。由此可知,在统一前后,官爵分离的变化已十分明显而普遍,远非从前那样:为官者必先取爵,取爵者必先斩敌首而立军功。

军功爵制的另一个变化,就是赐爵的范围和标准都不断扩大,已经不仅仅限于“斩首”之功。据《秦会要》的统计,在秦王朝统一前后,非因军功而赐民爵共有五次。即:“昭襄王二十一年,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昭襄王四十七年,王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始皇二十七年,是岁,赐爵一级。始皇二十八年,赐户三十,爵一级。始皇三十六年,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这就是说,原先专门用于奖励作战的军功爵,已经逐渐开始向民爵转化。尽管发生这两点变化,但总的来说,秦代军队还是严格贯彻执行二十等军功爵制的,军功爵制仍然是秦代军队中最重要的制度。

除军功爵制外,其他军事法规在统一前后也进一步完备起来。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律,有很多关于军律方面的内容。其中,

仅仅在《秦律杂抄》中就有以下一些比较重要的规定：

“战死事不出，论其后。有（又）后察不死，夺后爵，除伍人；不死者归，以为隶臣。”这是关于战场纪律方面的法规。意谓在战争中的不屈而死，要把爵位授予其子。如果后来察明该人没有战死，就要夺去其子的爵位，并惩治其同伍的人；那个没有战死的人回来后，要罚作官奴隶。

“军新论攻城，城陷，尚有栖未到战所，告曰战围以折亡，（假）者，耐；敦（屯）长、什伍智（知）弗告，赀一甲；伍二甲。”这也是关于战场纪律方面的法规。意谓军中就最近攻城的功绩论赏，如果有人在城池陷落时还迟到没有进入战场，却报告说在围城战斗中死亡而弄虚作假，应处以耐刑；屯长及同什的人知情不举，罚一甲；同伍的人罚二甲。

“徒卒不上宿，署君子、敦（屯）长、仆射不告，赀各一盾。宿者已上守除，擅下，人赀二甲。”这是关于宿卫方面的军事法规。意谓士卒不到岗位值宿警卫，署君子、屯长、仆射不报告，各罚一盾。宿卫者已上殿阶警卫，擅自下岗，每人罚二甲。

“不当禀军中而禀者，皆赀二甲，法（废）；非吏殹（也），戍二岁；徒食、敦（屯）长、仆射弗告，赀戍一岁；令、尉、士吏弗得，赀一甲。军人买（卖）禀（于）禀所及过县，赀戍二岁；同车食、敦（屯）长、仆射弗告，戍一岁；县司空、司空佐史、士吏将者弗得，赀一甲；邦司空一盾。军人禀所、所过县百姓买其禀，赀二甲，入粟公；吏部弗得，及令、丞赀各一甲。禀卒兵，不完善（缮），丞、库啬夫、吏各赀二甲，法（废）。”这是关于军粮和武器方面的军事法规。意谓不应自军中领粮而领取的，是官吏者皆罚二甲，撤职永不叙用；不是官吏者罚戍边二年。一起吃军粮的军人、屯长和仆射不报告，罚戍边一年；县令、县尉、士吏没有察觉，罚一甲。军人在领粮地方和路经的县出卖军粮，罚戍边二年；同属一车一起吃军粮的军人、屯长和仆射不报告，罚戍边一年；县司空、司空佐史、士吏监率者没有察觉，罚一甲；邦司空罚一盾。军人领粮地及其所过县的百姓买了军粮，罚二甲，粮

食没收；该管的官吏没有察觉，和县令、丞各罚一甲。发给军卒兵器，质量不好，丞及库的啬夫和吏均罚二甲，撤职永不叙用。

“蓦马五尺八寸以上，不胜任，奔挚（絷）不如令，县司马赀二甲，令、丞各一甲。先赋蓦马，马备，乃遴从军者，到军课之，马殿，令、丞二甲；司马赀二甲，法（废）。”这是关于训练军马方面的军事法规。所谓“蓦马”，就是供骑乘的军马。全文意谓，蓦马体高要在五尺八寸以上，如不堪使用，在奔驰和羁系时不听指挥，县司马罚二甲，县令、丞各罚一甲。首先征取蓦马，马数已足，即在从军人员中选取骑士。到达军队后进行考核，马被评为下等，县令、丞罚二甲；司马罚二甲，革职永不叙用。

“除士吏、发弩啬夫不如律，及发弩射不中，尉赀二甲。发弩啬夫射不中，赀二甲，免，啬夫任之。驾驺除四岁，不能驾御，赀教者一盾；免，赏（偿）四岁繇（徭）戍。”这是用人和训练方面的军事法规。意谓任用低级士吏和发弩啬夫等，如不合军律的要求，以及发弩射不中目标，县尉应罚二甲。发弩啬夫射不中目标，应罚二甲，免职，由县啬夫另行保举。驾驺已任用四年，仍不能驾车，罚负责教练的人一盾；驾驺本人应免职，并补服四年内应服的徭戍。

类似的条文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这些条文表明，秦代的军事法规是相当严密而完备的，它对作战、训练、后勤保障等各个方面，几乎都有具体而详尽的规定。但可惜出土的秦律非秦法的全貌，不能充分反映秦代军事法规的有关内容，只能从中窥见一斑。

第四章　秦代的国防

秦始皇东灭六国、北击匈奴、南平百越，为了维护和巩固其空前统一的封建帝国，陆续采取了一系列国防建设和边防守备的重大战略措施。诸如大规模修建万里长城，在内地和边防开筑驰道、直道、新道、五尺道，建立全国性的粮食战略储备体系，以及派重兵屯戍边疆和徙民实边等等，都是秦代国防事业中的荦荦大端。从此，在我国历史上建立起空前统一而强大的国防。

第一节　万里长城——伟大的军事工程

一、长城的出现和万里长城的修建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争的频繁、激烈和规模的不断扩大，军事筑城技术广泛发展起来。各诸侯国为了防御邻国的突然袭击，常常在自己的边境上修筑一些关、塞、亭、障等守备设施，后来又进一步把关、塞、亭、障用城墙连接起来，或把大河堤防加以扩建，便出现了所谓长城。我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长城是楚国的方城，约建于公元前7世纪，位于今湖北竹山至今河南泌阳一带。到战国初期和中期，随着兼并战争的加剧，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各主要诸侯国都纷纷筑起互防长城。今山东境内，有齐国修筑的西起平阴（今平阴东北）东连琅邪（今胶南南）海滨的长城。今陕西东部，有秦国沿洛水西岸修筑的“堑洛”长城；有魏国沿洛水东岸修筑的河西长城。今河南中部，有魏国修筑的河外长城；有郑、韩两国相继修筑的郑韩长城。今河北境内，有燕国沿易水北岸修筑的易水长城；有赵国在今临漳、磁县一带修筑的漳滏长城；还

有中山国在今河北、山西交界一带修筑的中山长城。除这些内地诸侯互防长城外，在战国中后期，由于匈奴、东胡、林胡、楼烦等游牧部族的日益强大和南下，秦、赵、燕三国都修筑了规模颇为巨大的边地长城。其中，秦国的边地长城建于昭王灭义渠之后，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沿洮水东岸北上至狄道（今甘肃临洮），转向东南至今甘肃渭源，向东北越六盘山，经今宁夏固原、甘肃环县、陕西吴旗，至今陕西安塞境内分为两支：一支向东，经今绥德北上，止于秦的上郡治所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一支向东北，经今陕西横山、榆林、神木，达于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十二连城附近黄河岸边。赵国的边地长城建于武灵王破林胡之后，筑有阴山南北两道长城：阴山南长城，西起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经今包头市北沿乌拉山下及大青山南坂而东，经今呼和浩特市北，东至今卓资；阴山北长城，西起高阙（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东北），由今乌加河以北向东，直达呼和浩特市西北。燕国的边地长城建于秦开破东胡之后，西起今河北怀安西北，向东北至今内蒙古正蓝旗西南，再向东经今河北围场、内蒙古赤峰市南、辽宁阜新市北、开原县东南，转而南下，达于浿水（今朝鲜清川江）入海处。这就是秦统一前内地长城及边地长城的分布概况①。

秦始皇统一中原后，一方面下令“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②，以利国家的统一，从而全部拆毁了内地的诸侯互防长城。另一方面，出于抵抗匈奴、加强国防的需要，不仅没有拆毁边地长城，而且在上述秦、赵、燕三国边地长城的基础上，进一步大规模地加以修葺、连接和增筑，遂出现了我国历史上闻名古今中外的秦代万里长城。

秦代万里长城的修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共12年之久。第

---

① 其中关于秦、赵、燕三国边地长城的走向和起止点，本书皆据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2年10月第1版）第一册。史书记载和诸家考证各有不同，兹不备述。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二年碣石门刻辞。

一阶段，由秦始皇二十六年至三十二年（前221～前215年）。这时刚刚平灭六国，国内正紧张地进行一系列改革和推行巩固统一的各项措施，对匈奴采取的是战略防御方针。在这一阶段中，为了确保边境的安全和为下一步对匈奴实施战略反击做准备，重点维修了原秦、赵、燕三国的边地长城，并新筑若干部分，以使其互相连接。《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载："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这段史料既指出了秦初的边界，也指出了秦初长城的走向、维修与新筑的段落和开始修建长城的时间。自战国中后期起，中原各诸侯国与北方游牧族相邻，无不筑长城以为界，边界所至之处，亦即长城所建之处。秦代更是如此。所谓"并阴山至辽东"，正如唐人张守节《正义》所云："从河傍阴山，东至辽东，筑长城为北界。"也就是说，秦灭六国的当年即开始了维修和新筑长城的工程，这里维修的是原赵国的阴山南长城（阴山北长城此时尚为匈奴所控制）和燕国的边地长城，并新筑二者之间的段落，使其互相连接。所谓"北据河北塞"，指的是原秦国边地长城的东端和赵国阴山南长城西端之间的一段黄河，这一段从前无人筑城，现在通过筑城立塞，从而把秦、赵长城连接起来。所谓"西至临洮、羌中"，就是指在维修原秦国边地长城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延伸到羌中。羌中指的是羌人聚居地，遍于今青海湖以东各处，这里所指为今甘肃永靖、兰州一带，亦即新筑自狄道沿洮水向西北与黄河相连的长城。所谓"东至海暨朝鲜"，就是指秦界东临大海，其东北边境把原燕国的边地长城加以延伸，直到秦代辽东郡的东南端①。这就是秦初第一阶段维修和新筑长城的全部工程。过去，人们往往认

---

① 参见《水经·河水注》："始皇令太子扶苏与蒙恬筑长城，起临洮，至于碣石。"《晋书·地理志》："秦长城起乐浪遂城县。"《地理韵编今释》："遂城在今朝鲜平壤南。"《通典》："碣石山在汉乐浪郡遂成县。长城起于此山，东截辽水而入高丽，遗址犹存。"

为秦代修建万里长城开始的时间是秦始皇三十三年①，即蒙恬击败匈奴、收复河南地以后，或认为开始于秦始皇三十年②。上述史料表明开始的时间是秦始皇二十六年，而且《史记·蒙恬列传》说："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攻齐，大破之，拜为内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这段记载表明，修建万里长城的工作是在蒙恬的主持领导下进行的，蒙恬为了击匈奴、筑长城，前后共"暴师于外十余年"。而蒙恬开始击匈奴的时间是秦始皇三十二年，到秦始皇三十七年蒙恬被秦二世赐死，首尾不过6年，是远不足"十余年"的。事实是，蒙恬自秦始皇二十六年破齐之后，遂即开始率兵屯边，防御匈奴，兼筑长城，经过长期准备，而后才出兵反击匈奴，击败匈奴后又进一步修筑长城，所以才"暴师于外十余年"。但是，由于第一阶段的重点任务是维修旧长城，新筑部分不多，工程量不大，主要是由蒙恬所率部队和沿边郡县军民完成的，没有大规模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而史书上对这段情况的反映比较少。

第二阶段，自秦始皇三十三年至三十七年（前214～前210年）。这时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秦始皇巩固内部的工作已经完成，边地长城的修缮已基本结束，边防已经巩固，对匈奴作战的各项准备皆已就绪，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并取得重大胜利。秦始皇三十二年，蒙恬大败匈奴军，一举收复河南；次年又渡过黄河，攻占高阙，控制了阳山、北假一带，从而使秦代的边境向北推进很远。为了巩固新占领的地区，于是开始第二阶段修建长城的工作。第二阶段的任务共有两项。一是"自榆中（今甘肃榆

① 参见马非百：《秦集史·国防志》第692页，中华书局1982年8月第1版。

② 参见罗哲文：《长城》第27页，北京出版社1982年2月第1版。

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①。也就是从今天的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一带开始，同第一阶段由狄道沿洮水向西北延伸的长城相连，沿黄河而东，直到与阴山相连，即与原赵国阴山南长城的西端相连，并在沿河岸边修建 44 座城塞，建立 44 县，从而加强沿河的防御。二是在高阙、阳山、北假一带“筑亭障以逐戎人”②。也就是重新修复赵武灵王时所建的阴山北长城，并自高阙向西南延伸很长一段，直至与当时的流沙（今巴丹吉林沙漠、滕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的总称）连接；向东与原赵国阴山南长城会合后，于今内蒙卓资一带转向东北，透迤于今内蒙商都县北、化德县南、河北康保县南，在今内蒙太仆寺旗一带与原燕国的长城相连。这两项任务都是以新筑为主，包括修复赵武灵王的阴山北长城，由于匈奴的长期破坏，亦和新筑相仿。加之地形复杂，多行于崇山峻岭之中，因而任务十分艰巨，仅靠蒙恬所率部队和沿边郡县的军民是难以完成的，遂大规模地动用了内地的人力和物力。《淮南子·人间训》说：“秦皇挟录图，见其传曰：‘亡秦者胡也。’因发卒五十万，使蒙公、杨翁子将，筑修城，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中国内郡挽车而饷之。”司马迁曾亲身游历秦代长城，他在《史记·蒙恬列传》的结语中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水经·河水注》中引杨泉《物理论》说：“始皇使蒙恬筑长城，死者相属，民歌曰：‘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铺，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掌柱’”。据估算，当时投入筑长城的部队约 50 万，民夫约 50 万，总人力不下 100 万。由此可知，秦代劳动人民为了修建万里长城，不知付出多少牺牲和巨大的代价！

二、万里长城的结构和布局

长城不是一道单纯孤立的城墙，而是以城墙为主体，同大量

---

①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纪事。

的城、障、亭、燧相结合的防御体系。城墙是一道高大、坚固而连绵不断的长垣，用以限隔敌骑的行动。一般修建在险峻的山梁岭脊之上或大河深谷之侧，以便“因地形，用制险塞”；只有草原、荒漠、川旷无险之处，才平地起城。筑城的基本方法是夯筑，如今甘肃临洮长城坡的秦长城遗址，即为夯筑而成。长城坡在临洮东约50里，两山夹峙，形势险隘，秦长城即跨于两面高山之上，可谓险上立险。半坡上有一个巨大的豁口，俗称长城口。长城口实为古代关隘，从其南侧倒塌的断面看，最下一层为生土，高约1.5米；生土之上为压实的黄土，厚约3米，进深残存约10米；黄土之上筑有夯土层的城墙，墙高残存约2米，宽约3.5米，夯土层厚6、7、10厘米不等；其结构与南北两侧的长城城墙相同，并彼此相连。在长城口南北两侧的长城，各保存约200米，其延伸部分已难以辨识。与长城口相连的长城断面，呈一梯形，高约2.5米，上宽约2米，基宽约3.6米，夯土为黄色粘土并夹有碎石。从断面看到的长城城墙，上部已裂塌成尖堆状，现存高约2.8米，下宽约2.9米，夯土层厚6至9厘米，夯窝不甚规则，直径一般3～4厘米，属于早期的夯筑办法。从侧面远望，长城立于山梁之上，若断若续，有如长龙起伏。由此可以想见当年秦代长城的雄姿。

与长城城墙相结合的是沿边的大量城、障。所谓“城”，本指都邑四周用作防御的城垣，里面的称城，外面的称郭，即《管子·度地》中所说的“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而这里与长城紧密相连的城，是指在长城沿线所修筑的军事要塞，主要用以驻军，也用于住民，以利军民结合，共同守卫边防，开发边疆。如秦始皇三十三年命蒙恬“城河上为塞”，并设置44县，就是在沿黄河筑长城的同时，在各要害处筑了许多城塞，以加强对重点地段的控制和防御。又如在今河北围场境内的秦汉长城遗址旁边，发现许多与长城紧密相连的小城，城的面积不大，城与城之间相距数十里不等，也有的小城建在长城内外的纵深方向，这些城都是用来加强重点地段防御的。所谓“障”，即边塞险要处用作防御的城堡。颜师古在《汉书·武帝纪》中解释说：“汉制，每塞要处，别筑为

城，置人镇守，谓之候城，此即障也。”秦制亦当如此，秦始皇三十三年命蒙恬在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就是在修建长城的同时修建大量障塞的明证。障与城的区别在于大小不一和作用不同：城比障大，既驻军又住民，用来加强重点地段的防御；障比城小，只住官兵，不住居民，用来加强险要之处的扼守。城和障都是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这两项设施，长城的防御作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加强。

与长城相配套的辅助设施还有大量的亭、燧。亭，本指古代边境上监视敌情的岗亭，有守望、战斗、通信等作用，往往与障、燧相结合，所以常常亭障、亭燧并称。燧，本指古代报警的烽烟，实际设施为一高台，上面有卒瞭望，下面有人守卫，发现敌情则白日燃烟，夜间点火，因而也称作烽火台或狼烟台。长城出现后，亭与燧相结合，成为长城的重要配套设施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秦始皇命蒙恬“筑长城亭障”，即包括大量的亭、燧在内。亭、燧一般都设在高处，根据地形条件，相距十里左右一个。有些亭、燧分设在长城两侧，以利各段之间互相联络；有些在长城之外向远处延伸，以利提早报警；有些通往首都方向，以利军情尽快上达；还有些通往附近驻军和郡县，以利协调各有关方面的应敌行动。

秦代万里长城在上述结构体系的基础上，其总体布局具有鲜明的战略特点，即根据敌情和地形的不同，在西北段、北段和东北段分别建立不同纵深和不同层次的防御体系。秦代建都咸阳，关中地区为其根本，自立国以来就曾长期同戎人在关中苦战；匈奴占领河南地区时，对关中的威胁尤为直接而严重。因此，秦代特别重视西北边防的安全，蒙恬出击匈奴的主要方向在这里，修建万里长城的主要工程也在这里，而万里长城在西北段的布局，则由三道边防线构成多层次的纵深体系。第一道边防线即秦昭王时所建的长城，西起临洮东至今内蒙托克托附近的黄河之滨，这是秦初的西北外边，蒙恬曾着重加以维修，后因边境的开拓，遂转为内边。第二道边防线即西起狄道、榆中东至秦昭王长城东端的长城，此为蒙恬所新筑，以河为守，以堤为城，沿河修筑大量要

塞并建44县，从而屏蔽北地、陇西、九原三郡，这是秦代西北最重要的一道防线。第三道边防线，即蒙恬在高阙、阳山、北假一带所筑亭障、修复赵武灵王阴山北长城并与燕长城相连，这是秦代最北、最长的一道长城，该长城的西段即构成秦代西北的外边，成为西北第三道防线，用以掩护河南地区和沿河所置列塞。由此可知，秦代万里长城西北段的布局，共有三道防线，纵深达七八百里，从而有效地解除了匈奴对关中的威胁，巩固了关中的安全。除西北段外，万里长城在北段和东北段的布局，则随着匈奴势力的逐渐减弱，分别由二道边防线和一道边防线所构成。北段的二道边防线，即由蒙恬所缮修的赵武灵王阴山南长城和阴山北长城。前者为秦初北境的外边，曾有效地制止了匈奴的南下，后转为内边；后者是秦代北境的外边，将匈奴阻隔在阴山以北，进一步巩固了中原地区的安全。东北段的一道边防线，即由蒙恬所维修的燕长城，主要防御对象是东胡，而东胡不像匈奴那样强大，因此没有建筑多道防御体系。这就是秦代万里长城在战略上的总体布局。

三、万里长城的作用和意义

秦代之所以大修万里长城，并不是因为国力虚弱、秦军怯战、敌不过匈奴的强大，而是由于古代中原农业经济民族同北方游牧经济民族的矛盾特殊性所致。农业生产需要和平、统一、安定的环境，以利耕耘收获，发展经济和文化。而游牧民族则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处于向奴隶制转化阶段的匈奴，其统治集团富有侵扰性和掠夺性。中原以大军出击，匈奴则远走他遁；大军一撤，扰掠如故。正如汉人晁错所云：“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

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去矣。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① 这就是自战国中期以来秦、赵、燕大修边地长城的根本原因。

秦始皇深知自己军事力量强大，能够东灭六国，南平百越，"鞭笞天下，威振四海"②，可一举击败匈奴。但是，击败匈奴却不能征服匈奴和占有匈奴，无法改变其生活条件、环境和习性，也无法根除其飘忽无定、出没无常的侵扰之患。正是从一劳永逸的百年大计出发，秦始皇才决定对匈奴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一方面从军事上给匈奴以严厉的打击，一方面大修万里长城，确保边防的巩固和国家的安全。从秦代的历史看，万里长城的作用和意义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化短为长，巩固边防。秦军同匈奴军相比，组织严密，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车、步、骑配合协同，长于大规模集团作战，但灵活性和机动性差，受地形条件的限制较多，短于翻山越岭、长途奔袭、分散作战，后勤保障亦十分困难。匈奴军同秦军相比则恰恰相反，没有严格的组织、训练，武器装备比较简单而落后，也没有多兵种的配合，但人人习于骑射，勇于战斗，长于奔驰突袭，"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③，因而能灵活机动，出没无常，分散作战，无须后勤保障。而短于攻城克坚，则是其一大弱点。正因为秦代边防有万里长城作屏障，使匈奴骑兵的活动受到限制，化长为短，难以轻易地出入边塞；而秦军则化短为长，守御有余。故终秦之世，未闻有匈奴犯境之大害，这和万里长城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二是保障进攻，巩固胜利。蒙恬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击败匈奴，这固然要归因于秦军的强大和作战指导的正确，但和他第一阶段

---

① 《汉书·晁错传》。

② 贾谊：《过秦论》上。

③ 《史记·匈奴列传》。

认真维修长城是密切相关的。秦匈边界长至万里，倘无长城屏蔽，秦军处处分兵守卫，就难以集中兵力发动战略进攻；即使能发动进攻，匈奴也可以退此进彼，到处周旋和扰乱。正因为长城有效地巩固了边防，保障了秦军侧翼的安全，蒙恬才得以集中数十万大军，在主要战略方向上发动猛烈进攻，迅速取得胜利，一举收复河南，夺得阴山，给了匈奴以很大的打击。匈奴一则由于军事上吃了败仗，二则由于秦边处处有长城掩护，无隙可乘，遂被迫退往阴山以北。蒙恬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进而又第二阶段大修长城，因而巩固了自己的胜利。由此可见，万里长城不仅是防御的重要手段，也是保障进攻、巩固胜利的重要手段。

三是促进边境地区的开发和建设。万里长城不仅保护了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免遭匈奴之破坏，而且对边境地区的开发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秦代在长城沿线设置陇西、北地、上郡、九原、云中、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12郡，有些郡的辖境远出长城之外。这些地区在长城的庇护之下，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土地得到开发，农业生产得到发展。特别是河南地区和黄河沿岸，经秦始皇大批移民和设置44县之后，很快成为新的经济繁荣地区。

自秦代以后，万里长城为许多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所继承，经过2000多年的不断修缮和扩筑，规模越来越宏伟壮观，是我国军事筑城史上的奇迹之一，至今仍引为中华民族的骄傲。

第二节　军事交通

秦代国防建设的另一重大措施，就是大规模兴建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交通，有驰道、直道、新道、五尺道，以及著名的水陆交通工程灵渠和遍布全国的驿传等等。从而把首都咸阳同全国各地，直至新开拓的边境地区，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大大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国防的加强。

一、驰 道

驰道是从首都咸阳通往全国各地的最主要交通干线。自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已开始修建①，至迟到秦始皇第五次出巡（前210年）全国各地前已全部竣工。据《汉书·贾山传》所载贾山《至言》说，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邪径而托足焉”。由此可知，驰道的规模、规格、质量，都是前无古人的。它和万里长城一样，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又一个重大奇迹。

关于驰道的具体路线、走向和布局等等，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即当时修驰道的直接目的，是供秦始皇巡视边防和出巡全国各地之用。因此，可以从后来秦始皇五次出巡的路线，推知驰道的基本布局。

第一次出巡在秦始皇二十七年，从咸阳出发，先到北地郡治义渠（今甘肃宁县西北），西出鸡头山（今六盘山），南下回中（今陕西陇县西北），西至陇西郡治狄道，然后沿渭水河谷返回咸阳。

第二次出巡在秦始皇二十八年，从咸阳出发，东过函谷关、洛阳、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陈留城）、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邹峄山（今山东邹县峄山）、泰山、临淄、黄（今山东黄县东）、腄（今山东福山县）、成山（今山东成山角）、芝罘（今山东烟台市北

---

① 关于修驰道开始的时间，《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为二十七年，《史记·六国年表》载为二十八年。当时修驰道的直接目的是为秦始皇巡视边境和全国各地做准备，始皇于二十七年出巡陇西、北地，可见当年关中地区已有驰道。其他地区的驰道，则大部分可能修于二十八年，但因五次出巡的路线和到达的地点不同，有些段落则为二十八年以后所陆续修建和维缮。

芝罘岛上芝罘山）、琅邪（今山东胶南琅邪台西北）、郯县（今山东郯城北）、彭城（今江苏徐州）、寿春（今安徽寿县）、安陆（今湖北云梦）、邾县（今湖北黄冈北）、湘山（今湖南岳阳西洞庭湖中）、江陵（今湖北江陵）、宛县（今河南南阳），然后经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返回咸阳。

第三次出巡在秦始皇二十九年，从咸阳出发，东出函谷关，过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临淄、芝罘、琅邪，又返回临淄，过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南）、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恒山（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北）、邯郸、壶关（今山西长治市北）、上党（今山西长子西南）、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然后由蒲州津（今山西永济西）渡河回到咸阳。

第四次出巡在秦始皇三十三年，从咸阳出发，东出函谷关，在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渡河到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过邯郸、恒山、涿县（今河北涿县）、蓟县（今北京市西南角）、碣石（今河北昌黎北）、右北平（今天津市蓟县）、渔阳（今北京市密云西南）、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代郡（今河北蔚县东北）、雁门（今山西右玉西南）、云中（今内蒙托克托东北）、上郡，返抵咸阳。

第五次出巡在秦始皇三十七年，从咸阳出发，向东南出武关，经宛至江陵，乘船沿长江而下至丹阳（今安徽当涂东北小丹阳镇），登陆至钱塘（今浙江杭州），过浙江上会稽山（在今浙江绍兴东南），还过吴（今江苏苏州），从江乘（今江苏句容县北）渡江北至琅邪，乘船由海上到芝罘，西行至平原津秦始皇得病，至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大平台）病死，继而按原定计划路线载尸而行，过恒山、井陉（今河北井陉北）至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北上雁门，西行云中、九原（今内蒙包头市西北），南下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回到咸阳。

五次出巡，历经今陕西、甘肃、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内蒙、山西、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江西等15个省、市、自治区。其中，除所走部分水路、海路以及由九原至云

阳的直道外，其他“所经皆治驰道”①。由此可以窥知，秦代驰道的主干线大致可分以下五条：

（一）从咸阳向西北直达北地，并经回中转抵陇西。

（二）从咸阳沿渭水河谷直达陇西。

以上两条为控制西北边防的重要战略干线。秦初主要威胁来自匈奴，北部边防有蒙恬率重兵屯于上郡，西北相对薄弱，故始皇十分关心，首次出巡即去北地和陇西。

（三）从咸阳向北经上郡到云中，由云中向西通九原，向东经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至碣石（属辽西郡）。这是通往整个北部边防和东北部边防的重要战略干线。从秦初起始皇即命蒙恬积极做反击匈奴的准备，修治这条干线是重要的准备工作之一。始皇第四次出巡沿这条干线视察了全部边防情况，遂即做出了反击匈奴的决策。

（四）从咸阳向东出函谷关，经洛阳、濮阳、临淄，直达山东半岛最东端的成山。这是控制整个中原地区最重要最基本的一条战略干线，并通过这条干线与众多的支线相连，从而控制中原地区各个战略要点。其中，洛阳是控制关东地区的战略中心，早在西周初年周公就曾以此经营东方；春秋战国时则成为周天子的首都；秦灭六国也是先吞二周，占领洛阳，而后才统一天下。因此，从咸阳直达成山的驰道主干线，在关东地区则以洛阳为中心，分出许多支线。由洛阳向东北有一条重要支线，经孟津、怀县、邯郸、巨鹿、恒山到蓟。这条重要支线联系着黄河以北各地：自邯郸向西南有一条支线，与上党、安邑、蒲州相通；自巨鹿向东有一条支线，与临淄相通；自恒山有一条支线，向西与太原、雁门相通；自蓟则可通往东北边防各地。由洛阳向东有一条重要支线，经陈留、定陶、邹峄山、泰山而达临淄。这条重要支线把洛阳、陈留、定陶联系在一起，对控制中原具有重要的意义：原魏都大梁已在统一战争中被基本摧毁，其地位渐由陈留所代替；定陶则是

---

① 梁启超：《战国载记》。

战国末期秦国在东方的军事重镇。由洛阳向东沿主干线直达临淄，临淄是控制山东半岛和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个战略中心。自临淄向东南有一条支线通琅邪，琅邪向北有一条支线通腄，向南有两条支线深入原楚国的腹地：一条经江乘、吴、钱塘至会稽，并由钱塘通丹阳；另一条经彭城、寿春、安陆至�。这样，通过从咸阳至成山的主干线和南北各条支线，把中原和江淮地区都联成了一片，其根本意义就在于有效地控制中原地区。就秦初的矛盾而言，外部主要来自匈奴的威胁，内部主要来自关东的反秦势力。秦始皇在中原大修驰道，并多次沿驰道主干线和支线巡视中原各地，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监视和弹压关东的反秦势力，以巩固其统治。

（五）从咸阳向东南出武关，经宛而抵江陵。这条主干线是用来控制原楚国江南各地的。秦灭六国，楚国的反秦情绪最大，尤其是江南地区更为激烈。仅靠中原驰道而控制江南是不够的，因此，由咸阳出武关至江陵最为捷便，既可顺流而下深入江南各地，又可与中原驰道的各条支线相通，彼此呼应。

以上就是秦代驰道的总体布局。它是针对中原的反秦势力和北方匈奴的威胁而修，对于巩固边防和维护国家的统一，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并为我国古代的交通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直道

直道建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 212 年）。当时已经取得北击匈奴的胜利，把匈奴驱逐到阴山山脉以北，收复了河南地，并在这里重新设置了九原郡。为了防止匈奴的再度进犯，秦始皇命蒙恬大筑长城的同时，修一条从咸阳直达九原郡的“直道”，以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御。这条路未修之前，从咸阳去九原，一般要经过上郡至云中，再从云中西行到九原，路线比较迂远，在军事上颇为不便，因而要开辟一条能直达九原的“直道”。直道从咸阳西北不远的云阳开始，经今陕西淳化县北梁武帝村秦林光宫遗址北行，至子午岭上，循主脉北行，直到定边县南，再由此东北行，进入鄂

尔多斯草原，过乌审旗北，经东胜县西南，在今昭君坟附近渡黄河，到达包头市西南的秦九原郡治所，当时全长1800里（约合今1400里）①。这条道路有一半修筑在山岭上，有一半修筑在平原草地上，系“堑山堙谷，直通之”②，是从秦都咸阳至北方九原郡最捷近的一条道路，所以叫做“直道”。其规格、质量大体上与驰道相仿。和驰道的主要区别在于作用有所不同，驰道专门供秦始皇出巡所用，具有广泛的军事、政治、经济价值；而直道则是专门用于军事目的，是为了随时出兵同匈奴作战而修。秦始皇对这条道路非常重视，因而确定最后一次出巡要专门从直道返回咸阳，以致病死沙丘之后，臣下们还是按照他生前的计划，载着他的尸体“视察”了直道的全程。这条道路建成后，大大便利了秦军的行动，对于巩固北部边防特别是九原郡的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直到后来汉武帝时反击匈奴，这条道路仍在充分发挥其作用。

三、新道

新道即所谓“通越道”③，它是在秦军南平百越的过程中，沿着进军路线所开辟的军用道路。南平百越之后，新道便成为秦代控制和开发整个岭南地区的战略交通要道。关于新道修筑的具体时间、规格、质量、分布等等，史书上均无明确记载，只能从有关史料中推知其大体情况。《史记·南越列传》载，秦末南海尉任嚣临终前对龙川令赵佗说：“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邦、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叛）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于是，由赵佗行南海尉事，下令横浦关（今广东南雄西北、江西大余西南大庾

① 参见林剑明：《秦史稿》第十章第三部分。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纪事。

③ 《史记·南越列传》唐司马贞《索隐》引苏林语。

岭上)、阳山关(今广东阳山县西北，当骑田岭路)、湟溪关(今广东英德西南连江注入北江处)“急绝道聚兵自守”。这里提到的横浦关、阳山关、湟溪关都是秦代新道中的重要关口，是有关新道所经之处。再从《淮南子·人间训》所载关于秦军进军岭南前的集结地点和部署：“一军塞镡城之领，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便可察知秦代新道在岭北的基本起点。这里所谓“镡城之领”，即指今之越城岭；“九疑之塞”，即指今之萌渚岭；“番禺之都”，即指今之骑田岭；“南野之界”，即指今之大庾岭①。将上述史料结合起来分析，便可考知秦代新道的以下四条线路。

(一)从南野(今江西南康南)穿过大庾岭，出横浦关，沿溱水(今北江)南下而达番禺(今广州市)。这是从岭北进入岭南最捷近之路，主要是通过横浦关而穿越大庾岭，而后便可畅行无阻。《南康记》上记载说：“大庾横浦有秦时关，后为怀化驿，盖横浦关秦所置也。”②横浦关也称秦关，是交通大庾岭南北的重要关隘。因此，赵佗欲断新道，便首先下令聚兵扼守横浦关。

(二)越骑田岭出阳山关，沿湟水(今连江)东南行，过湟溪关，而后沿溱水南下而达番禺。这也是由岭北进入岭南的一条比较捷近之路，且可直接逼临番禺。这条路的主要险阻为阳山、湟溪二关，所以赵佗才严令派兵封锁，以阻断这条新道。

(三)越萌渚岭、桂岭，沿今贺江南下，至今广西梧州一带。这是由岭北深入岭南中部的一条重要新道，沿今西江可东达番禺，溯今浔江可深入桂林、象郡。这条路的主要险阻在桂岭一带。桂岭在今广西贺县东北百余里，紧临贺岭与萌渚岭，同今湖南江华、广东连县接界。据苏凤文《广西全省地舆图说·富川县》的记载，秦末赵佗也曾在桂岭一带设防，其“拒防遗迹”，清代犹存。

(四)从今湖南零陵西南过今广西全州，经湘桂走廊而至桂林，

---

① 参见岑仲勉：《评〈秦代初平南越考〉》。

② 《史记·南越列传》司马贞《索隐》。

而后深入秦代桂林、象郡各地。这是秦代控制桂林、象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略干线。这条干线的中心环节是通过灵渠把南北水陆交通连接在一起。灵渠在今广西兴安境内，初名“秦凿渠”，唐以后改为今名，亦称湘桂运河或兴安运河。其主要作用是沟通湘水（今湘江）和漓水（今漓江），从而把我国的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连接起来。其主要工程有南渠和北渠，全长 34 公里。其主要工程设施有铧嘴、大小天平堤和陡门。铧嘴是用巨石砌成的分水工程，把今海洋河水分成两支：一支经南渠入漓水；另一支经北渠入湘水。大小天平石堤在铧嘴的尾端，成“人”字形，既是拦河坝，又是滚水坝，在枯水期可拦住全部海洋河水使之入渠，使南渠和北渠都保持船只航行所需的足够水量；在洪水期可使过多的水量越过天平堤顶，注入湘水故道。陡门为船闸的先导，是世界上最早的通航措施。因此，灵渠开成以后，可保一年四季航行无阻，大大便利了南北交通。

自古以来，岭南岭北有五岭阻隔，交通不便，给南北统一带来很大障碍。秦代新道的建设，不仅保障了当时秦军南平百越的胜利，而且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岭南的开发和祖国统一，具有深远而重大的历史意义。

四、五尺道

五尺道北起今四川宜宾市，南抵今云南曲靖。因地形复杂，山路崎岖，多为山间阁道，道宽仅有五尺，故名为“五尺道”。它是由今四川盆地通往云贵高原的一条重要战略交通线。虽然由于秦王朝的寿命很短，加之以主要精力用兵于匈奴和岭南，对西南地区尚未来得及大力开发，但五尺道的开凿仍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指夜郎、邛都、昆明等部族政权）颇置吏焉。”可见五尺道的修建，使秦代边境向西南扩展很大，进一步促进了西南地区的开发和统一。这条路后来成为汉代通西南夷道和隋、唐石门道的前身，

从而进一步说明了它的历史意义。

五、驿传亭邮

驿传和亭邮制度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是供使臣出巡、官吏往来和传递诏令、文书的交通组织，也是军事通信的重要保障，因而具有广泛的国防意义。秦灭六国后，随着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加强，驿传和亭邮设施渐趋完备。据《晋书·刑法志》所载《魏律序》，秦代已经有厩置、承传、副车、食厨等有关驿传的法律，云梦睡虎地秦简中也有这方面的许多具体记载。所谓驿传，指的是马和车运送，即以马运送叫作“驿”，以车运送叫做“传”。所谓亭邮，指的是步递，即以人力步行，按邮亭递送公文。从边境到首都，秦代各主要交通干线上都设有驿站，一般每三十里左右一个，驿站中备有马匹、车辆和食舍，以供过往官吏的使用和歇息。当传送紧急的诏令和军事文书时，每逢驿站换马不换人，昼夜不停，可日行千里，从而保证以最快的速度送达目的地。在驿站与驿站之间或不设驿站的一般道路上，则普遍设有邮亭、邮舍，每十里一亭，五里一邮，以保障一般公文的传递。亭，本指古代边境上用以监视敌情的设施，自秦代统一之后，发展为全国性的治安和邮政的设施。它不隶属于地方的基层政权组织——乡，而是隶属于郡、县的军事机构——尉。每亭设亭长一人，亭父一人，亭卒一人。备有五兵，佩带刀剑，手执盾牌，身披铠甲，主管治安和捕盗，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和畅通，并具体负责公文的传递和过往官吏的接待。

以上就是秦代军事交通建设情况。它对于秦代国防建设和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也是我国交通史上光辉的一页。

第三节 战略储备

在古代农业经济和冷兵器作战的条件下，战略储备最重要最根本的就是粮食。正如汉人贾谊所说："夫积储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秦自商鞅变法，以富国强兵而统一天下，因此对粮食的管理和储备十分重视。在中央政府设有治粟内史，掌管全国的粮食和财政，其下设有太仓令和丞，专门负责储备工作。睡虎地秦简有《仓律》26条，对粮食的收藏、保管、发放、各类不同人员的口粮标准等等，都做了极为明确、严格而具体的规定。如"城旦为安事而益其食，以犯令律论吏主者"，就是说城旦作轻的劳作而增加了口粮，应按犯令的法律对主管的吏进行论处。可见秦政府是把粮食作为一项极重要的战略物资对待的。秦统一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战略储备体系，设置了一批粮仓，现择要分区概述如下。

一、咸阳仓、栎阳仓、霸上仓

关中地区有咸阳仓、栎阳（今陕西临潼北渭水北岸）仓、霸上（今陕西西安市东）仓。《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仓律》中载有："入禾仓，万石一积而比黎之为户。……栎阳二万石一积，咸阳十万石一积……"就是说，一般的粮仓，以一万石为一"积"（储藏谷物的单位），每"积"分别用荆巴隔起来，设置仓门；而栎阳和咸阳的粮仓则分别以二万石和十万石为一"积"，可见栎阳仓比一般仓大得多，而咸阳仓比栎阳仓更大得多。霸上仓的情况见于《史记·高祖本纪》，汉元年（前206年）十月，刘邦率兵到霸上，宣布约法三章，"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而刘邦则不肯接受，说"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这说明霸上仓的粮食非常多，刘邦的十万大军用而不乏。咸阳、栎阳、

霸上三仓的粮食虽多，但在一般情况下却不准动用。《史记·秦始皇本纪》二世元年（前209年）载，“尽征其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稿，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可见咸阳、栎阳、霸上三仓，确实是国家的战略储备，非军国急需则不得动用。

二、敖仓、陈留仓、宛仓

中原地区有敖仓（在今河南郑州市西北邙山上）、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陈留城）仓和宛（今河南南阳市）仓。其中敖仓在历史上最为著名，《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郦食其对刘邦的建议说：“臣闻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臣闻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荥阳，不坚守敖仓，乃引而东，令適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资汉也。……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这一建议被刘邦所采纳，以致敖仓之粟在整个楚汉战争中起了重大作用，成为汉胜楚败的一个直接因素。楚汉战争前后五年，其中成皋相持二年零四个月之久，可见秦在敖仓的积粟数量多么惊人。陈留仓和宛仓在史书中也多次提到，如《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说：“夫陈留，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积粟。”《史记·高祖本纪》说：“宛，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人民众，积蓄多……”秦在敖仓、陈留仓和宛仓之所以大量积粟，最主要的战略企图是加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秦末农民起义战争时，全国大多数地方都被起义军和其他反秦势力轻易地占领，而荥阳、南阳等地的秦军却能较长期地固守，除这里驻军较多的条件外，与有雄厚的战略储备也是分不开的。

三、琅邪仓、黄仓、腄仓

东部沿海地区有琅邪仓、黄仓（在黄县）和腄仓（在腄县）。这三个仓是为保障北部边防需要设置的，并在蒙恬北击匈奴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汉书·主父偃传》说，秦始皇“使蒙恬将兵而攻胡，却地千里，以河为境。地固泽卤，不生五谷，然后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又使天下飞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由此可知，北击匈奴，发卒守边，修筑长城，给养的主要来源即琅邪、黄、腄三仓。当然，关中和中原地区的粮仓也可能是其来源之一，但关中为秦根本，中原是重点控制地区，其战略储备不轻易动用，因此，北方边防保障主要依靠沿海三仓。

四、成都仓

西南巴蜀地区有成都仓。此仓建立很早，在秦昭王伐楚时，司马错曾率巴蜀众10万，大舶船万艘，备米600万斛，浮江而下，攻取商於之地；接着张若也率兵沿长江东下，配合一起，攻取楚的黔中郡。这些军食的来源，“必皆出自成都仓，殆无可疑也”①。至统一之后，成都仓对开发西南地区，无疑又起了重要作用。《后汉书·公孙述传》说：“成都郭外有秦时旧仓，述改名白帝仓，自王莽以来常空。”这说明自战国后期至西汉末，成都仓始终是西南巴蜀地区的战略储备基地。

从上述各仓的分布看，大体上由西而东，横贯秦帝国全境，构成战略储备线，既保障漕运京师之需，又保障北、南边防之需。这就是秦代战略储备的基本体系。但秦代的战略储备粮仓，绝不是仅限以上10个，实际上各郡各县，全国皆有，只是大小规模不同

① 《秦集史·积贮表》。

而已。如《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说："宣曲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据《索引》、《集解》引韦昭语，宣曲"当在京辅"，督道为"秦时边县"，今址已不可考。这一情况表明，秦代的粮仓，遍及内地和边区，确实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完整的战略储备体系。

第四节　重兵戍边和徙民实边

为了巩固统一的边防，与修长城、筑驰道、建粮仓的同时，秦政府还采取了重兵屯边和徙民实边两大战略措施，把保卫边疆与建设边疆紧密结合起来。关于重兵屯边的情况，前面论述秦代兵制时已经提及，一是北防匈奴，二是南守五岭。北防匈奴的兵力，史书上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史记·秦始皇本纪》及《六国年表》、《蒙恬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皆载为三十万；《史记·匈奴列传》和《水经·河水注》载为十万；《淮南子·人间训》则载为五十万。大体上以三十万说较为可信。其统帅蒙恬、监军扶苏居上郡，其军主力主要驻守在北部九原郡一带，并分布于长城沿线各要害之处。南守五岭的兵力，各书皆载为五十万，由南海尉统率，主力驻在番禺（今广东广州市），并分布于五岭各通道关口及南部边防各要害之处。所谓重兵屯边，主要即此南北二边，而其战略重点，则在北边；北边为精兵，南边多戍卒。

与重兵屯边相配合，在北击匈奴、南平百越之后，秦代向北、南两边实施了大规模移民。秦始皇三十三年，在蒙恬斥逐匈奴、修筑长城和沿河设立44县同时，即下令"徙谪，实之初县"①；秦始皇三十六年，又"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②。经过这两次迁徙，北部边防的人力、物力得到了很大的加强，经济和文化也发展起来，正如《汉书·食货志》应邵注云："秦遣蒙恬攘却戎

---

①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

狄，得其河南造阳之北千里，地甚好。於是为筑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四方杂错，奢俭不同。今俗名新富贵者为'新秦'，由是名也。”这就是说，在被徙劳动人民的努力下，北部边防地区得到了很好的开发和建设。对岭南的徙民，是和南平百越同时进行的，主要有“以適遣戍”和“以谪徙民”两种形式。《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壻、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这里的“以適遣戍”，其实质就是一种移民行动。因为被“遣戍”的戍卒不是正常服役，往往没有定期，不久又逢秦末中原战乱，岭南道绝，久而久之，戍卒便转化成了移民。据《史记·淮南王传》载伍被之言，秦始皇曾批准一万五千名“女无夫家者”随军南下，缝补军衣，可见“以適遣戍”一开始就具有有计划地移民的性质。除“以適遣戍”外，还有大量的“以谪徙民”。《史记·南越列传》说：“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汉书·高帝纪》说：“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越绝书》也记载说，秦始皇三十七年“徙天下有罪谪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这些情况表明，秦代曾多次大量向岭南徙民，从而对岭南地区的开发、建设及其与中原地区的统一，起了巨大作用，有效地巩固了南部边境，以致当秦末中原长期战乱的情况下，岭南地区仍保持了稳定的发展。

以上是秦代国防建设的几项主要措施。这些措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于巩固空前统一的秦帝国起了巨大而积极的作用，并基本上为秦以后的历代统治者所采纳和借鉴，对我国历代国防建设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五章　秦代开拓边疆的战争

正当秦始皇完成中原统一事业，我国历史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之时，我国边疆各地的兄弟民族也逐渐分别发展强大起来。他们大力开发和建设祖国的边疆，为我国古代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中原地区的统一和发展，各民族之间，特别是各兄弟民族和华夏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同时某些民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有了新的发展。

第一节　秦代周边各族的概况

在秦王朝周边地区活动的兄弟民族，当时发展较快，主要的有以下一些。

一、匈奴

匈奴是我国北方很古老的一个游牧民族。据《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匈奴的祖先是“夏后氏之苗裔”，这说明远在上古时代匈奴就是构成中原华夏族的一支，只是由于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的不同，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才逐步形成中原农业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某些区别。黄河流域是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发祥地，成为中原华夏族的摇篮；而大漠南北的草原地带，则成为我国古代北方各游牧民族活动的舞台。活动在这个舞台上的游牧民族，在战国以前有“荤粥”、“鬼方”、“玁狁”、“獯”、“戎”、“狄”等各种名称。他们自古以来就和中原华夏族交往密切，并不断融合到华夏族中来。根据《史记》、《诗经》、《左

传》等许多历史文献的记载，黄帝时曾北逐荤粥；夏代时荤粥与夏族为邻；殷商时武丁曾和鬼方进行过三年战争；西周时曾长期同猃狁作战；春秋时有大量戎、狄部落在黄河流域与华夏族杂居，参与一系列中原重大活动（如参与著名的秦晋崤之战等等），有的还建立了政权（如中山国），后来基本上都融合到了华夏族之中。到战国时代，中原地区实现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北方游牧民族也随着社会的发展，开始由原始的氏族、部落向部落联盟过渡。其中，形成一个最强大的部落联盟，这就是匈奴。

《史记·秦本纪》说，秦惠文王后元七年（前318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这是匈奴这一名称在我国史书上的第一次出现。此时的匈奴主要活动于蒙古高原，尚处于部落联盟的历史阶段，过着“逐水草迁徙”①、“随畜牧而转移”②的生活。他们“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③，没有完备的政治、法律制度。其军事组织和生产组织合而为一，一切能弯弓射箭骑马的人“尽为甲骑”④，平时以游牧和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⑤。最主要的武器是弓矢，也有刀、铤等短兵。与游牧生活方式相适应，作战方式的流动性很大，“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⑥。由于狩猎和骑射是匈奴人的特长，他们的战斗力甚强。自战国中期开始，不断南下，时而越过阴山山脉，掠扰燕、赵、秦等国的边境地区。例如，周赧王三年（前312年）匈奴的骑兵就曾“驱驰于楼烦（今山西宁武一带）之下”⑦。为了抗御匈奴的袭击，燕、赵、秦三国除经常以重兵屯守边境之外，还分别在自己的北部边区筑起长城，借以限隔匈奴以及其他游牧部落骑兵的行动。

到战国后期，由于中原地区的兼并战争日益激烈，燕、赵、秦等国的北部边防实力都相对地受到削弱。匈奴人乘机进一步大举南下，控制了赵武灵王时代所筑的北长城，稳固地占领了当时的

---

①②③④⑤⑥《史记·匈奴列传》。

⑦《说苑·君道》。

阴山（今内蒙古大青山）、北假（今内蒙古黄河河套以北、阴山山脉以南的夹山带河地区）、阳山（今内蒙古狼山）以及河南地（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一带）。这里依山带水，沃野千里，气候温润，草木茂盛，给匈奴人的畜牧和狩猎提供了极为良好的自然条件。在新的环境中，匈奴人的游牧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与中原人民的交往增多，开始有了一定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时匈奴的势力进一步增强，以阴山、河套为基地，对四周邻族展开强大的攻势。攻击的主要目标是中原农业地区，因而常常同燕、赵、秦等国发生较大规模的冲突。例如，赵孝成王时李牧破匈奴之战，赵国投入的兵力有精选的战车1300乘，精选的骑兵1.3万人，步兵勇士5万人，弓弩手10万人，总兵力约20余万，共歼灭匈奴军10余万骑。这是一次规模巨大的战役，其他小战则不可胜数。李牧虽曾重创匈奴，但赵国的力量有限，并未能恢复赵武灵王所开辟的边界，匈奴仍然为患于中原北部各国，而且一天比一天强大。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秦王朝的统一。

在秦始皇统一中原的过程中，匈奴人的社会制度正处于由部落联盟向奴隶制转化的阶段，出现了自己的政治领袖人物——头曼单于。在头曼单于以前，匈奴的部落联盟“时大时小，别散分离”①，很不稳定。自头曼单于开始，匈奴在政治上趋于团结、统一和稳定，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也比以前大为增强。这时，秦王朝北部边防的大多数地区都处于匈奴的直接威胁之下。尤其是关中地区，乃秦立国之根本，秦都咸阳之所在，但自匈奴人占领河南地以后，关中和咸阳所受的威胁最为严重而直接。业已完成中原统一大业的秦始皇，决不能允许上述威胁的存在。于是，骎骎日上、不断南下的匈奴，同空前统一而强大的秦帝国之间的战争，便难以避免。

① 《史记·匈奴列传》。

二、东 胡

东胡也是我国北方很古老的一个少数民族，因居匈奴之东而得名。根据《伊尹朝献商书》的记载，殷商时期东胡居于商王朝的正北方。根据《逸周书·王会篇》的记载，西周初年东胡居于周王朝的北方正东。春秋战国期间，东胡主要活动在燕国的北方和东北方，即今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

东胡的经济生活与匈奴相仿，主要以畜牧业为主，也兼营狩猎，与中原华夏族接近的地方也逐渐有了农业和手工业。从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锦西乌金塘和内蒙宁城南山根等地发现的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东胡墓葬看①，主要出土物有大量的猪、狗、牛、羊、马、鹿、兔、狐等动物骨骼以及青铜兵器、石锄石铲、陶纺轮、铜鱼钩等等，说明他们的畜牧业已相当发达，农业和手工业也有了某些发展，进入了青铜时代。考古工作者在老哈河流域发现过不少东胡遗址，仅内蒙昭乌达盟南部的赤峰市、喀喇沁旗、翁牛特旗、敖汉旗及宁城县境内即达300余处②。其中仅1958年春在宁城南山根一座石椁墓葬中就发现71件铜器，有铜盔、铜戈、铜矛、铜剑、铜刀、铜斧、铜镞等等。这说明东胡人已经拥有强大的军事手段。

自战国中、后期开始，东胡发展成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并逐步向奴隶制转化。随着私有制和奴隶制的发展，东胡经常同燕、赵等国及匈奴发生战争，掠夺对方的人口和财物。燕昭王时东胡曾打败燕国，燕国被迫把将军秦开送到东胡做人质。后来秦开从东胡逃回，在深悉敌情的基础上率领大军同东胡作战，取得重大

---

① 参见《考古学报》1975年第一期载《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1960年第一期载《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青铜短剑墓》，1960年第五期载《辽宁锦县乌金塘东周墓调查记》。

② 《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第一编，第3页。

的胜利，迫使东胡沿燕国的边界后退千余里。接着，燕国在北部边境地区设置了上谷郡（郡治在今北京怀柔）、渔阳郡（郡治在今北京密云）、右北平郡（郡治在今河北平泉）、辽西郡（郡治在今河北卢龙）、辽东郡（郡治在今辽宁辽阳）等五郡，加强了对边境地区的开发和设防，并沿边修筑了长城以防东胡和匈奴。除燕国之外，赵国在赵惠文王二十六年（前273年）曾出兵打败过东胡，夺取了被东胡占领的一些地方。赵孝成王时期，李牧破匈奴之后，又进一步打败东胡。从此，东胡人南下的趋势被完全遏止。

秦始皇统一中原之后，边防建设空前加强，加之强大的匈奴不久被秦军击败，向东北方向撤退，使东胡受到一定的压力，因此，在整个秦代，秦王朝同东胡的矛盾很少，双方维持着稳定的和平局面。

三、百　越

百越是我国古代南方很古老的一个族群，因其分布极广，支系繁多，互不统属，但皆为“越”人，所以泛称“百越”或“百粤”；又因其地古属扬州①，所以又泛称这些越人为“扬越”。其中，分布在今浙江绍兴一带的越人，史称“于越”；分布在今浙江南部瓯江流域即温州一带的越人，史称“东越”，又称“东瓯”；分布在今福建福州一带的越人史称“闽越”；分布在今广东境内及其以南的越人，史称“南越”；分布在今广西境内及其以南的越人，史称“西瓯”，亦称“骆越”。

在百越之中，最著名的是于越。于越人与中原的关系十分密切，相传其著名的领袖人物越王句（勾）践，就是夏禹的后裔。于越人的经济、文化、政治发展水平都远比其他越人高得多。到春秋后期即已进入奴隶制时代，并在句践的领导下建立起一个强大

---

① 古扬州据《汉书·地理志》载：“淮、海惟扬州。”颜师古注：“北据淮，南距海”。

的越国。句践不仅控制了于越、东越和闽越，还灭掉了当时的吴国，进军江淮，会盟诸侯，一度称霸于中原。后来到战国中期，越国被楚国打败。约于公元前306年楚灭越，越王无疆被杀，“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①。也就是说，自战国中期，于越、东越和闽越，都已成为楚国的势力范围。

处于五岭（即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以南的南越和西瓯，虽然其经济、文化、政治发展水平很低，直到秦初尚处于原始部落的阶段，过着半渔猎、半农耕的生活，但与中原的联系也是比较密切的。早在传说时代，就有虞舜南巡，“崩于苍梧之野（今广西梧州市一带）”② 以及禹定九州，“南抚交趾（泛指岭南地区）”③等记载。周成王之时，“交趾之南有越裳国，以三象重九译而献白雉”④。周宣王中兴之时，曾开疆拓土“至于南海”⑤。进入春秋以后，楚国在江淮流域发展强大起来，一方面不断北上争霸，问鼎中原；同时又积极南下，分别向岭南、东南和西南地区开拓。到战国初期，楚悼王以吴起为令尹，变法革新，富国强兵，遂“南平百越”⑥，占领了“洞庭、苍梧”⑦ 等地。从此，岭南地区便成为楚国的势力范围。

上述情况表明，不论于越、东越、闽越、南越和西瓯，自古以来同中原的交往就是源远流长的，有着内在不可分割的联系。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对于沟通岭南、东南和西南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秦灭六国、统一中原之后，进一步开发岭南等地，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岭南诸地气候湿热，土

---

① 《史记·越王句践世家》。

②③ 《史记·五帝本纪》。

④ 《尚书大传》。

⑤ 《诗经·大雅》。

⑥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⑦ 《战国策·楚策一》。

地肥沃，物产丰富，地域辽阔，易于接受中原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又无统一的政权同中原相对抗。因此，秦始皇在完成统一中原的事业后，即毅然决然地做出了进军岭南，南平百越，进一步开发和统一祖国边疆的决策。

四、“西南夷”

“西南夷”是秦汉时期对分布在今甘肃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以及云南、贵州一带的少数民族的总称。他们由氐羌、百濮、百越等三大族群的众多部落交错杂居而组成。以滇池为中心，在滇中和滇东北一带，主要有滇、劳浸、靡莫、僰、叟等部落；在滇西一带，有嶲、昆明、斯榆（叶榆）、桐师、嶲唐、哀牢等部落；在滇东南以及黔西一带，有夜郎、句町、漏卧、且兰等部落；在滇北和川西南一带，有邛都、徙、筰都、摩沙夷以及川西北和甘肃南部的冉駹、白马等部落。它们有的是族名，有的是地名或“国”名。大体说来，滇池的西北和东北多为氐羌聚居；在滇南、滇东南和滇西南的“南域”，多为百濮和百越杂居的“闽濮之乡”①。他们绝大部分处于原始部落制的阶段，有的“耕田”“土著”而有“邑聚”，也有的“随畜迁徙，毋常处，无君长”②，过着半农耕、半渔猎、半游牧的生活。但滇西和滇中的个别地区已出现青铜文化，开始了向奴隶制的过渡。

西南地区各族人民，自古以来就和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传说夏禹即出自西羌，周族中的姜姓也是羌人中的一支。据《逸周书》等文献记载，商汤之时四方诸侯来朝献，其中就有西南地区的产里、百濮等少数族部落，献上宝石、象牙、美丽的羽毛和“短狗”等珍奇之物。西周初年，在成周（今河南洛阳）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朝献，又有“仆人”（即濮人）来献丹沙。

---

① 《华阳国志·南中志》。

② 《史记·西南夷列传》。

进入战国以后，这种联系就更加密切广泛。相传最早的四川地区的统治者——蜀王，名字叫杜宇，生于朱提（今云南昭通）①，他曾“教民务农”,“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囿苑”②,控制着今滇、川、黔相接连的边境地区，后来蜀为秦所灭，秦国的势力便很快地深入到西南夷地区。除秦国外，楚国也积极地向西南发展，约于公元前 286 年由庄跻率兵到达滇池地区,“以兵威定属楚”③;后因其归路被秦军隔断,庄跻遂“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④。从而开创了夷汉杂居的先例。

秦对西南夷地区的开发和统治，则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首先是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前 316 年）派司马错伐蜀，灭掉了巴和蜀两国。先后设置了巴（郡治江州，今四川重庆市北)、蜀（郡治成都，今四川成都市)、汉中（郡治南郑，今陕西汉中市）三郡。并在这里大兴水利，修筑城池，发展生产，扩充军队，使秦的声望和影响越来越大,给进一步开发西南夷地区奠定了基础。到秦武王元年（前 310 年)，又派兵征服了分布在今云南境内的两个部落——丹、犂。到秦昭王二十二年（前 285 年）蜀郡太守张若又夺取了笮及其江南地区,把秦的直接统治推进到今四川盐源、盐边以及今云南宁蒗、丽江一带。

秦始皇即位后，对西南夷地区的经营更为积极。在进行统一中原的战争的同时，即派常頞自僰道（今四川宜宾地区）至今云南曲靖修建了一条五尺道。这条道路深入到西南夷地区的腹心——滇池附近，把西南夷同中原进一步联系起来。接着，秦王朝在完成统一中原的事业之后，国力和威势都空前增强，便在西南夷地区“诸此国颇置吏焉”⑤，使西南夷地区成为秦王朝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这样，秦王朝几乎没有使用什么武力，便轻易地在西南夷地

---

① 参见《太平御览》第八百八十八卷。

② 《华阳国志·蜀志》。

③④⑤ 《史记·西南夷列传》。

区建立起直接的统治。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的成功，是当时祖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长期以来西南地区民族融合与团结的一个硕果。

秦王朝周边的兄弟民族，除上述匈奴、东胡、百越、西南夷之外，在敦煌、祁连一带有月氏；新疆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有楼兰、龟兹、于阗等国；准噶尔沙漠以北有乌孙、呼揭等国；在匈奴之北有丁灵、鬲昆；在东胡之东有夫余、肃慎、高句丽；在青藏高原有众多的氐、羌部落，等等。这些兄弟民族自古以来就和中原华夏族有过各种交往，秦王朝同他们之间的联系也较密切，斗争也较复杂。

第二节　北击匈奴

秦王朝北击匈奴（参见附图 2），大体上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采取了相应的战略。第一阶段，自秦始皇二十六年至秦始皇三十一年（前 221～前 216 年），为战略防御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秦王朝的根本任务是忙于内部的改革和整顿，巩固统一中原的胜利成果，同时为反击匈奴积极地做好各项战略准备。第二阶段，自秦始皇三十二年至秦始皇三十三年（前 215～前 214 年），为战略进攻阶段。这一阶段在前一阶段长期而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对匈奴发动了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收复了河南地，并把匈奴赶至阴山山脉以北。第三阶段，自秦始皇三十四年至秦始皇三十七年（前 213～前 210 年），为积极设防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大规模地修筑了长城、直道，并大量移民、戍边，以巩固第二阶段所取得的胜利，以待匈奴来犯时再战。此后，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马”①，终秦之世取得了巩固北部边防的巨大成功。北击匈奴三个阶段的经过如下。

---

① 贾谊：《过秦论》。

一、战前准备

在第一阶段的战略防御中秦王朝主要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

（一）派驻重兵，保卫关中。匈奴自被赵将李牧击败后，曾一度不敢抵近赵边。后来李牧被杀，赵国灭亡，秦始皇倾全力忙于统一中原的战争，匈奴遂乘虚南下，重新占领北部边郡的许多地方，并以河南地为据点，直接威胁着秦的关中地区。面对这一严峻形势，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六国的战争的当年，即选定青年将领蒙恬，命他统率重兵，驻守上郡（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长期经营北部边防，确保关中地区和首都咸阳的安全。同时也是为了使蒙恬熟悉北部边防的山川形势，了解和掌握匈奴的活动规律及特点，一俟时机成熟，便可由防御转入进攻。这一作法，同赵孝成王委任李牧长期守边、相机破敌的策略甚为相似，而蒙恬“暴师于外十余年”①，后来取得了远比李牧更为巨大的胜利。

（二）修缮长城，加强边防。秦王朝同匈奴、东胡等北方游牧民族的边界长达万余里，不可能处处派驻重兵，即使转入战略进攻，也不可能全边出击。为了在战略防御阶段有利于限隔匈奴骑兵的南下行动，即以墙制骑，同时也是为了将来在重点方向转入战略进攻时有利于其他方向的防御，包括对东胡的防御在内，以免得此失彼，秦始皇命蒙恬率重兵守边的同时，又下令全面修缮原燕、赵、秦所筑的北长城。由于赵武灵王时所筑的阴山北长城被匈奴控制和破坏，因而在北段着重维修了赵武灵王所筑的阴山南长城，并使其与燕长城相连接。将燕长城向东南延伸到碣石（今朝鲜平壤西南）。在西北段则进一步修缮了秦昭王时所筑的长城，秦、赵长城之间的空隙，则用“据河为塞”②的办法连接起来。这样，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建立起一条巩固统一的边

---

① 《史记·蒙恬列传》。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

防线。这条边防线，以长城和临河堤防为依据，并以重兵屯戍主要方向，从而造成严不可犯的态势，既保障了战略防御阶段的边境安全，又给下一阶段的战略进攻提供了非主要方向的侧翼安全保证。

（三）修驰道、筹粮饷，以备开边之需。秦始皇深知，一旦同匈奴开战及战后进一步经营边防，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必须有良好的军事交通和充分的粮饷作保障。为此，他在灭六国、统一中原的当年即下令在全国修筑驰道。第一条驰道即通往北地（郡治义渠，今甘肃宁县西北）和陇西（郡治狄道，今甘肃临洮）。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第一次出巡便去了北地和陇西，视察了这两郡的边境地区和长城的情况。因为关中地区北有蒙恬重兵驻防，北地和陇西相对比较薄弱，所以秦始皇对这两郡非常重视和关注。接着，修筑了通往中原、东部沿海以及北部边防的各条驰道，同时还充实、扩建、新建了关中地区、中原地区、西南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战略储备粮仓，特别在东部沿海地区，新建了黄（今山东黄县东）、腄（今山东福山）、琅邪（今山东胶南琅邪台西北）三大粮仓。因为经营北部边防不能仅靠关中和中原的人力、物力，还必须动员东部沿海的力量。所以，后来对匈奴作战和修筑万里长城时，最重要的后勤供应来源就是："使天下飞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①。为了推进战备工作，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二十九年（前218年）、三十二年（前215年）连续三次东巡，视察了关东各地的驰道、粮仓及北部边防的情况。当然，秦始皇东巡有其更大的政治目的，即歌功颂德，宣扬威势，加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但是，视察战备和边防，是东巡的重要目的之一。尤其是第三次东巡，专程巡视了北部边防的绝大部分地段，更是直接为了准备对匈奴的开战。

（四）确定打击方向和战略目标。秦始皇三十二年东巡时，特地"巡北边，从上郡入"②，视察了右北平、渔阳、上谷、代郡

---

① 《汉书·主父偃传》。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

（郡治代，今河北蔚县东北）、雁门（郡治善无，今山西右玉南）、云中（郡治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上郡等北部边防的主要防线以及蒙恬部队，然后做出了“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的战略决策。这一决策表明，秦始皇意识到了匈奴势力的强大及其游牧民族的特点，既不可能把他们全部消灭或降服，也不可能实施全线出击；而必须集中兵力，把夺取河南地作为最根本的战略目标，以利确保关中的安全；然后再把匈奴驱逐到阴山以北，恢复赵武灵王所开辟的边界，进一步加以经营，从而基本上解除秦王朝的北部边患。这是一个有限的战略目标，其立足点就在于积极防御。当时，匈奴的主力位于阴山地区西部与贺兰山地区北部，仅有一部在河南地区。秦始皇的上述决策，恰恰击中了匈奴的薄弱环节，因而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二、作战经过

秦王朝在长期准备的基础上，于秦始皇三十二年发起了对匈奴的猛烈进攻。作战的全部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夺取河南地，第二阶段驱逐匈奴到阴山以北和贺兰山以西地区。

第一阶段的作战，进行得十分顺利。双方的力量对比，优势在秦军一方：秦军预有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计划部署，匈奴方面则几乎没有任何准备与部署；秦军集中了主力和精锐部队，匈奴方面的主力部队则远在黄河以北的阴山等处；秦军发挥步、骑、车等多兵种大兵团协同作战的优势，而匈奴在河南地区多为分散游牧部落，缺少大规模集中统一的骑兵集团。因此，秦军的攻势甚为凌厉，蒙恬率主力由上郡经今榆林北上，迅速攻占河套北部地区，几乎没有遭到什么重大抵抗；同时驻守北地、陇西两郡的秦军，也向河套的南部地区发起进攻。秦军这一东西并进、南北夹击的攻势，很快即将河套以内的匈奴军队击溃，一举收复了河南地，一直推进到北河（今乌加河，当时为黄河的主流道）南岸，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实现了既定的主要战略目标。

秦军夺取河南地后，稍事巩固和休整，接着于第二年发起新的攻势，展开第二阶段作战任务。第二阶段的战略目标是把匈奴全部驱逐到阴山山脉以北，其计划和部署是：由蒙恬率主力渡河，首先攻占高阙（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东北。因阴山山脉至此中断，成一缺口，望若门阙，故名高阙），然后北上攻占阳山，东下攻占北假，将匈奴主力击败；同时以一部兵力渡河西进，攻占贺兰山高地，策应主力部队的进攻。

匈奴首领头曼单于，开始时没有料到秦军会大举进攻，其部落和军队都处于比较分散的状态，因而陷于被动。丢掉河南地之后，头曼集中了部分兵力，本想寻机夺回，不料秦军很快即发起第二阶段攻势，头曼被迫应战，双方遂于高阙、阳山、北假一带展开激战。由于秦军具有数量、质量、多兵种协同作战和统一组织指挥的优势，连战皆捷，夺取了整个阴山地区和贺兰山高地。头曼连连失败，加之秦王朝的北部边防各个地段皆防守严密，无隙可乘，遂在秦军的强大压力下，被迫撤离了阴山地区。《史记·匈奴列传》说："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也就是说，南有秦军的巨大压力，东西两翼又受到东胡和月氏的制约，匈奴不得已撤退到阴山以北的漠南一带去游牧。至此，秦对匈奴的作战告一段落，完全实现了预定的战略目标。

秦对匈奴的作战，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从秦朝方面看，在完成统一中原的事业后，建立了强大、集中、统一而先进的封建政权，拥有一支数量众多、兵种齐全、组织严密、指挥统一、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经验丰富、适应各种地形条件下作战的强大军队，并有巩固的边防作屏障，雄厚的人力物力作保障，以及准备充分、战略决策正确等等。从匈奴方面看，当时正处于由部落联盟向奴隶制过渡的阶段，还没有真正建立起统一的政权，也没有真正建立起集中、统一、强大的军队，其作战方式还没有摆脱原始部落式的"利则进，不利则退，

不羞遁走”① 的流动习惯。这种原始性的游牧武装力量，尚不具备打一场大规模堂堂之阵的条件，只能是出没无常，乘虚而入，进行抢掠和袭扰。因此，一旦同有组织的强大堂堂之师相遇，无不败北。

三、战后设防措施

匈奴虽然被打败，北撤七百余里，但其实力并未遭受根本损失，只是人、畜、部落北徙而已，一旦有机可乘，随时可卷土重来。鉴于匈奴民族这一迁徙转移和出没无常的特点，为了巩固北部边防，秦始皇在战后又采取了以下一系列设防措施：

（一）继续派驻重兵屯戍边防。击退匈奴之后，蒙恬所率 30 万大军并没有撤归或减少，而是仍然屯戍北边，一方面准备匈奴来犯时再战，同时继续执行修筑长城和开筑直道的任务。这支部队与秦王朝相始终，为巩固秦代边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直到秦末农民大起义暴发，迫于形势的危急，秦二世才把这支部队的主力调走。

（二）设置郡县，徙民实边。河南地区不仅气候温润，富于水草，利于游牧和农耕，而且北据黄河，是屏蔽关中的要地，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秦始皇决心把这片土地开发起来，以增强北部边防的实力基础。遂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 年）在这里设置了九原郡（郡治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并在西起榆中（今甘肃榆中西北）东接阴山的黄河沿岸附近设立 44 县，同时下令“徙谪，实之初县”②，后来又在秦始皇三十六年（前 211 年）再次下令“迁北河、榆中（指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准格尔旗一带）三万家”③。从而很快就把河南地开发成富庶的“新秦”④，成为抗御

---

① 《史记·匈奴列传》。

②③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④ 《汉书·食货志》应注。

匈奴的战略基地。

（三）大修城、塞、亭、障，进一步强化边防。击退匈奴以后，秦始皇下令增设两条边防线：一条是“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①，即沿河因险修筑城塞，据河依城塞为守，以利更好地屏蔽河南和关中。另一条是在高阙、阳山、北假一带“筑亭障以逐戎人”②，也就是沿整个阴山山脉重新扩筑赵武灵王所建的北长城，用以掩护沿黄河所建的各城塞。这样，使秦代的北部边防向北推移七百余里，关中地区的安全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保障。

（四）开筑直道，进一步便利北部边防的军事交通。九原郡设立后，河南地区成为抗击匈奴的前进基地，加强九原同秦都咸阳之间的军事、政治、经济联系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原来的驰道西通北地、陇西，北通上郡、云中，对于控制河南地区颇有迂远不便之处。因此，秦始皇三十五年（前 212 年）下令开筑一条从首都咸阳附近的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直达九原的直道。这条道路全长当时为 1800 里，系“堑山堙谷，直通之”③，是从咸阳通往九原的捷径。有了这条道路，一旦边防报警，秦军的战略机动部队即可从咸阳直赴九原。

综观秦始皇北击匈奴的战争，主要是一场为了巩固北部边防、建设北部边防的作战。真正用于作战的时间很短，前后不到两年。作战经过也比较简单，几乎没有发生大规模激烈的恶战。战略目标十分明确而有限，即收复河南，驱逐匈奴到阴山以北，解除北方边患，保卫关中和中原的安全。但是，在作战前后，为了建设北部边防所用的时间、人力、物力、财力等等，都远远超过了作战本身的消耗，几乎是不惜一切代价！秦始皇之所以苦心经营北部边防，其根本战略指导思想不是在于进攻，而是在于防御；不是要征服或消灭匈奴，而是要确保秦王朝的安全、统一和发展。这些情况表明，北击匈奴具有鲜明的积极防御的性质和特点，它确

①②③《史记·秦始皇本纪》。

实在秦代起到了巩固边防的作用，同时也部分地起到了开拓边疆的作用。

第三节　南平百越

秦王朝南平百越的战争（参见附图 3），经历了一个较为长期渐进而曲折的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不同阶段。

一、平定于越，进军岭南

自秦始皇二十五年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前 222～前 221 年），在王翦灭楚的基础上，秦军进而攻占了百越的部分地区。这是南平百越初期阶段，主要取得两项胜利。

一是平定于越，设置会稽郡。早在战国中期楚灭越时，于越以及东越、闽越等就已经“服朝于楚”，成为楚国的势力范围。当时楚国“尽取吴故地至浙江”①，并在原吴国的土地上设置江东郡（郡治吴，今江苏苏州市），进行直接的统治和管理；对于于越、东越和闽越，楚国则没有设置郡县进行直接的统治和管理，只是让其各个分散的君长“服朝”而已。但到秦灭楚时，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于越、东越和闽越，在楚国灭亡之后，不是继而“服朝”于秦，而是对秦王朝转取敌视的态度和叛乱的行动，即“秦始皇并楚，百越叛去”②。古来“自江以南皆称越”③，楚国的江东、九江、长沙等郡辖有江南广大地区，长期以来就是楚越杂居，互相融合。因此，随着秦灭楚的作战深入到江南，遭到楚人和越人的抵抗，秦越之间的战争遂即发生。《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五

① 《史记·越王句践世家》。

② 《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

③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

年载："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这里的"越君"，是指于越人的头领。因其抵抗秦军的灭楚行动，王翦在攻取楚国的江东郡后，立即向东南推进，粉碎了于越人的抵抗，占领其各地，降服其首领，并在这里建立了会稽郡。由此可知，虽然楚国的江东郡和秦代的会稽郡郡治皆在吴，但郡的辖境却有很大不同，前者仅仅"至浙江"，不包括于越；后者则包括了于越聚居的全部地区，从而建立起对于越人的直接统治和管理。这就是秦代南平百越所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至于东越和闽越，因当时秦军受灭楚作战任务的制约，暂时没有去作大规模的进攻和占领。

二是越过五岭，攻占岭南部分地区。王翦在灭楚作战中，不仅已经同于越人开战，同其他越人也已经开战。据《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的记载，王翦在秦始皇二十五年"竟平荆地为郡县。因南征百越之君"。这里的"南征百越之君"，主要不是指于越，而是指岭南的越人。因为秦军在江南、岭北的作战过程中，已同越人广开战端，所以在岭北建立起巩固的统治之后，紧接着即向岭南的百越发起进攻。但是，王翦的任务是奉命灭楚，对越作战是因"百越叛去"所引起，加上当时统一中原的战争尚未完全结束，燕、赵残余势力和齐国正在被消灭之中，所以秦军没有大规模深入岭南腹地，只是攻占了岭南部分地区，并没有在岭南设置郡县，建立起巩固的统治。正因为秦军已经攻占岭南的部分地区，所以《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记述秦王朝的疆域时说："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所谓"北向户"，"秦时泛指五岭以南地区"①。秦界南至北向户，是秦军业已攻入岭南的一个重要标志。此外，在《史记·南越列传》中也有相应的记载，其记任嚣、赵佗在秦二世元年（前209年）欲谋割据岭南时说："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从秦并六国到

① 参见何清谷：《试论秦对岭南的统一与开发》，载《人文杂志》1986年第一期。

秦二世元年恰恰“十三岁”。所以说在秦始皇二十六年以前秦军就已经攻占了岭南的部分地区。这是南平百越所取得的又一个胜利。这一胜利虽然是初步的，但给尔后的大规模进攻奠定了基础。

二、兵分五路，“南尽北户”

自秦始皇二十七年至秦始皇三十二年（前 220～前 215 年），秦军对百越发起了大规模的战略进攻，经历一场旷日持久的作战过程，攻占了岭南的绝大部分地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秦始皇二十六年完成统一中原事业后，虽然忙于整顿内部和控制中原，并对匈奴先采取防御战略，但对百越却采取了进攻的战略。百越不同于匈奴，处于高度分离的状态，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长期以来“服朝于楚”，南平百越既是灭楚的继续，也是统一中原的继续。因此，秦始皇平灭六国后稍事休整，很快即对百越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所载的琅邪刻辞说：“西涉流沙，南尽北户。”这表明，秦王朝的疆域已经大大南移，不是两年前的“南至北向户”，而是已经“南尽北户”。也就是说，在两年时间内秦军的进展很大，已经基本上占领岭南各地，所以才说是“南尽北户”。但是，对于这个阶段秦军作战的具体情况，秦代本身的历史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载，我们只能从后人的一些追述中加以探讨。

《淮南子·人间训》载，秦始皇“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今湖南靖县西南）之领，一军守九疑（今湖南宁远南九嶷山）之塞，一军处番禺（今广东广州市）之都，一军守南野（今江西南康南）之界，一军结余干（今江西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適戍以备之”。《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说，秦始皇“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

越人遁逃。旷日持久，粮食绝乏，越人击之，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汉书·严助传》，载淮南王刘安给汉武帝的上书说："臣闻长老言，秦之时尝使尉屠睢击越，又使监禄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丛，不可得攻。留军屯守空地，旷日引久，士卒劳倦，越出击之。秦兵大破，乃发適戍以备之"。还有《汉书·严安传》，也有关于此事的记载，大体与《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相同。

从上述后人的大量追述看来，秦代南平百越的战争第二阶段，确实经历了一个由胜而败、由败而守的长期艰苦的过程。

开始时秦军的战略企图是：以优势兵力南下，分途进军，略取各地，一举平定百越。其具体部署是：由尉屠睢统率楼船之士50万，分为五路南下，分别向西瓯（以及骆越）、南越、闽越等三个战略方向进攻。上述所谓"镡城（成）之领（岭）"，即指今之越城岭；所谓"九疑（嶷）之塞"，即指今之萌渚岭；所谓"番禺之都"，即指今之骑田岭；所谓"南野之界"，即指今之大庾岭①；所谓"余干之水"，即指今江西余干南信江。秦军在此五处集结，其中第一、二路是用来进攻西瓯（及骆越）的：第一路由今广西兴安县的越城岭突进，直下桂林，从正面进击西瓯各部落；第二路由今湖南江华县的萌渚岭推进，至广西贺县，从侧面进击西瓯各部落。秦军第三、四路是用来进攻南越的：第三路由骑田岭进入广东西北，沿连江南下，直取番禺；第四路由大庾岭进入粤北，经今韶关沿北江南下，与第三路合攻番禺。秦军第五路是用来进攻东越和闽越的，由今江西余干沿信江东下，经今鹰潭越武夷山进入闽中腹地，直取东冶（今福建福州市）。

五路大军进展，初期都是比较顺利的。各自按预定方向推进，迅速击溃百越各个部落的分散抵抗，杀死了西呕（瓯）君译吁宋等一些首领。这样，到秦始皇二十八年琅邪刻辞之前，既已"南尽北户"，基本上攻占了百越的绝大部分地区。其中，在东越和闽

---

① 参见岑仲勉评《秦代初平南越考》。

越方向取得了巩固的胜利，并设置了闽中郡①，实现了对东越和闽越的直接统治和管理，战事没有再发生反复。南越和西瓯两个方向则不同，秦军虽以凌厉之势攻占了广大地区，但没有全部降服越人，很多越人退入深山丛林之中，以原始游击战的形式，继续对秦军进行顽强的抵抗。一些头领牺牲了，又一些新的人物起而代之，常常利用夜间给秦军以意外的偷袭，逼得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弩”。在长期相持之中，秦军因交通不便，供应困难，“粮食绝乏”，“士卒劳倦”，逐渐陷入被动，以致统帅尉屠睢战殁，“伏尸流血数十万”，从而遭受到严重的挫折。

这一严重挫折并不表明秦军在岭南的完全失败，秦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取得两项巨大的成就。

第一，秦军始终顽强地控制着岭南各险要之处和重要地区，因而掌握着战争全局上的主动权。例如，在今广西省兴安县西南 40 里的大、小溶江之间，至今仍保留着庞大的秦城遗址，其周长约 40 里，有大营和小营之分，古战壕和古城垣的痕迹依然可见，显然是当年 10 万秦军驻守之地②。该遗址位于越城、都庞二岭之间的孔道，背靠天险严关，是控制西瓯的咽喉，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此外，如著名的横浦关（在今广东南雄西北江西大余西南大庾岭上，相当于今之小梅关）、阳山关（在今广东阳山县西北，当骑田岭路）、湟谿（溪）关（今广东英德县西南古湟水注入溱水处）以及番禺等地，皆为秦军所控制。

第二，秦军开筑了通往岭南的“新道”和灵渠，解决了军事

---

① 闽中郡设置的时间，史无明文记载，《汉书·地理志》缺，《晋书·地理志》始补出，并与南海、桂林、象郡同列为并天下后所置。唐宋以降，诸家因之。王国维《秦郡考》据秦始皇二十五年王翦“降越君，置会稽郡”，推断闽中郡亦置于是年。但据《史记·集解》，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中没有闽中郡。尉屠睢所率五路大军，之所以有一路“结余干之水”，正是用来进军闽中的，所以闽中郡应在秦军进入闽中后所置；而其他各路秦军，因战事发生反复，直至秦始皇三十三年才设置南海、桂林、象郡。

② 参见周宗贤：《论秦瓯战争》，载《学习论坛》1982 年第四期。

交通和后勤供应问题。新道的修建，有两条是通往南越的：一条从南野过大庾岭，出横浦关，沿溱水（今北江）而抵番禺；另一条越骑田岭出阳山关，沿湟水（今连江）过湟谿关，入溱水而抵番禺。新道还有两条是通往西瓯的：一条越萌渚岭、桂岭，沿贺江南下，可西达西瓯各地；另一条从今湖南零陵西南过今广西全州，经湘桂走廊而至今桂林，然后可向西南深入西瓯各地。灵渠是秦始皇命监禄率兵开凿的，在今广西兴安境内。它的主要作用是沟通湘水（今湘江）和漓水（今漓江），可以保持一年四季通行无阻，从而把我国的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连接起来，大大便利了南北交通和秦军作战的后勤供应。

由于秦军取得了上述两项成就，从而为战争后期的全面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三、增兵移民，设置郡县

自秦始皇三十三年至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4～前212年），秦王朝进一步增兵岭南，大批徙民，并设置郡县，从而全面控制了岭南地区，取得了对百越战争的最后胜利。自尉屠睢战亡之后，秦军便以任嚣接替其统帅的职务，通过陆续增兵，逐渐改变了军事上的守势和被动的局面。大约在秦始皇三十二年，灵渠通航了，各条新道也已先后修成并不断延伸。次年，秦始皇做出了新的战略决策，下令“发诸尝逋亡人、赘壻、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①。这是继尉屠睢率50万大军南下之后，又一次空前规模的大举南下。这一次南下的显著特点是把发兵略地、设置郡县、徙民遣戍等三个方面紧密结合在一起。发兵略地的重点就是夺取越人尚占据的各个“陆梁地”。所谓“陆梁地”，《史记·正义》说：“岭南之人，多处山陆，其性强梁，故曰陆梁。”其实，岭南各要害之处和平川之地早已被秦军占领，但有许多顽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强“莫肯为秦虏”的越人，却仍然长期据守一些山林高地，他们在高山丛林中“与禽兽处”，并常常“夜攻秦人”，所以才称其据点为“陆梁地”。因此，这次秦军的战略目标，是要全面夺取“陆梁地”，彻底战胜越人。秦军利用兵力上的优势，逐渐攻取了越人的据点，镇压了越人的反抗。随着军事上的胜利，同时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等三郡，对岭南地区实现了直接的统治和管理。南海郡的治所在番禺，其辖境大体相当于今广东省的大部。桂林郡的治所在布山（今广西贵县境内）①，其辖境相当于今广西都阳山以东，越城岭以南，包括今广西桂林、柳州、梧州和广东肇庆、茂名一带。象郡的治所在临尘（今广西崇左）②，其辖境包括今广西百色、南宁、凭祥和广东湛江一带，南至今越南海防、高平一带。为了加强对岭南地区的军事控制，南海、桂林、象郡等三郡一律不设郡守，只设监御史主管郡务③，并特置“东南一尉，西北一候”④，由东南一尉的南海尉任嚣专断一方⑤，以利加强军事指挥上的应变能力。西北一候，就是在今广西兴安县西南40里的秦城遗址派驻重兵，戍守西北方向的交通孔道。此外，在横浦关、阳山关、湟豀关等处，也分别以重兵戍守，严防越人再起而反抗，破坏岭南与岭北的交通。在军事胜利和郡县设置的同时，又不断地大批徙民岭南地区，使其与越人“杂处”，以便于对岭南的统治和管理，充实岭南的戍守力量，加强对岭南的开发和建设。秦始皇三十三年，“以適遣戍”达“五十万”⑥人之众，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行动。接着，秦始皇三十四年“適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

① 参见《文物》1979年第9期《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发掘简报》。

② 关于象郡的治所，一说在象林（今越南广南维川南茶轿地方），可备一说。

③ 参见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十七：“南海郡惟设尉以掌兵，监以察事而无守”。

④ 引自《水经·泿水注》。

⑤ 参见《晋书·地理志》：“置南海尉以典之”。

⑥ 《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集解》。

及南越地"①，向岭南流放了一部分犯有罪过的官吏。秦始皇三十五年，再一次"益发谪徙边"②，也包括岭南在内，又补充了一部分移民。这样，自秦始皇三十三年开始，经过大规模的增兵、徙民、设置郡县等三大措施，使"丁男被甲，丁女转输"③，将大批的人力、物力、财力源源不断地投入岭南，终于取得了南平百越的最后胜利，全面控制了岭南地区，对百越的战争历时11年，宣告结束。

综观秦王朝南平百越的战争，实质上是秦代统一中原和灭楚作战的继续。它和北击匈奴在性质上不同：北击匈奴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巩固边防，解除边患，以匈奴的被逐、河南地的收复和万里长城的建成而告终；南平百越的目的，是为了统一祖国的岭南地区，以越人的降服、郡县的设置和边疆的开发而告终。

秦军在岭南作战，之所以一度遭受挫折，陷入被动的局面，关键就在于单纯以武力解决问题。秦国早有开发巴蜀的经验，但百越与巴蜀不同，百越之中的西瓯（以及骆越）、南越又与于越、东越有所不同。巴蜀差不多有与秦国接近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条件，也有相对统一的政权，秦军只要以优势兵力击灭巴蜀统治者，然后设立适当的政治机构和施行适当的政策措施，巴蜀即可很快地变为秦国的一部分。于越是百越中最进步的一支，因而于越的问题解决得最早。东越和闽越十分接近于越，所以东越和闽越的问题也解决得比较顺利，没有发生反复。西瓯和南越等则不然，生产方式和生活条件与中原差别较大，处于比较原始落后的状态，没有统一的政权，而且地域辽阔，地形复杂，部落分散，交通不便。在这种情况下，以优势兵力攻占某些地方是轻而易举的，但要改变其生产方式和生活条件，使其像中原一样接受秦王朝的统治，那是长期而艰难的。正因为如此，秦军在西瓯和南越遇到了顽强的抵抗，一度遭受挫折而陷入"旷日持久"的被动局面。战争后期，

①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 《汉书·严安传》。

秦王朝接受了中期的教训，以军事为后盾，把统一边疆、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紧密结合起来，特别是通过大批移民与越人“杂处”，用中原人民先进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条件吸引和改变越人，从而才真正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秦王朝对百越的战争，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其历史功绩是深远而长久的。岭南地区自古以来就和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曾为楚国的势力范围，但是，把岭南地区真正统一起来，开发起来，建设起来，使其成为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这个历史伟业是由秦军南平百越完成的。自秦军南平百越之后，新道的修建，灵渠的开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出现，中原农业生产技术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输入，整个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变等等，使岭南的历史真正翻开了新的一页。虽然平定岭南之后不久秦王朝就灭亡了，但岭南的历史发展并未因此而中断，在秦人“筚路蓝缕”之功的基础上，又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第六章　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和秦王朝的灭亡

第一节　秦末阶级矛盾的激化

秦始皇虽然建立了一个空前统一而强大的封建帝国，但在这个帝国内部，充满了错综复杂而激烈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这些矛盾和危机，在秦始皇死后进一步激化起来，终于导致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爆发，造成秦帝国的灭亡。

一、赵高专权和秦二世的昏庸暴虐

秦末的矛盾和危机进一步激化，与发生在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篡权夺位，有直接关系。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七月，秦始皇在第五次出巡郡县的途中，病死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西北大平台）。当时，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和将军蒙恬仍在上郡，率30万大军驻防北边。随秦始皇出巡的有其少子胡亥、丞相李斯和中车府令赵高等人。秦始皇死前本已令赵高给扶苏写好诏书，令其“与丧会咸阳而葬”①，意即由扶苏继承皇位。但诏书未发而秦始皇已死，于是给赵高等人搞阴谋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公子扶苏“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②，曾多次对秦始皇的暴政进行直谏，在朝野上下有一定影响和威望。蒙恬长期在外，手握重兵，“威振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史记·李斯列传》。

匈奴。始皇甚尊宠蒙氏，信任贤之”①，其弟蒙毅也“位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为内谋，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②。这一派的实力是极强的。而赵高则出身于卑贱的宦者，因“通于狱法”③，才当了中车府令，并长期“私事公子胡亥”④。他曾犯有大罪，被蒙毅判处死刑，但被秦始皇赦免。李斯虽位至丞相，但其功不如蒙氏，也担心在秦始皇死后自己的利禄难保。胡亥因受到秦始皇的宠爱，也颇有夺嗣之心。于是，在秦始皇突然病死沙丘的情况下，赵高、李斯、胡亥便串通一气，秘不发丧，先以秦始皇的名义加罪于扶苏、蒙恬，皆赐死。扶苏被迫自杀，蒙恬不肯自杀，被拘革职，由王离接替蒙恬指挥军队，由李斯的舍人接替扶苏做监军，夺得了全部军权。然后才回到咸阳发丧，假称李斯受秦始皇遗诏，立胡亥为太子，由胡亥即位，做了二世皇帝。

二世即位后，在赵高的策划之下，首先杀了蒙恬，除去一心腹之患。接着，又恐沙丘之谋泄漏，诸公子和大臣不服，由赵高提出一个“严法而刻刑”、“灭大臣而远骨肉”、“尽除去先帝之故臣”⑤的建议，开始大规模屠杀宗室和大臣。除蒙毅等大批群臣被杀外，秦始皇的20余子中，有公子12人被杀于咸阳市，公子将闾等兄弟3人被迫自杀，公子高被迫随秦始皇从死，还有公主10人也被杀。这样，跟随秦始皇统一天下的众多文臣武将遭到残害，使最高统治集团的力量受到一次严重摧残和削弱，并出现人人自危的局面。

秦二世的昏暴还不仅仅限于屠杀宗室大臣，他还骄奢淫逸，“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⑥。他把秦始皇安葬完毕之后，紧接着又下令继续“作阿房之宫，治直道、驰道，赋敛愈重，戍徭无已”⑦，把秦始皇时就已经激化了的阶级矛盾，更进一步激化。他唯一信任的只有赵高一人，把赵高提拔为郎中令。赵高为了独揽

---

①②③④《史记·蒙恬列传》。

⑤⑥⑦《史记·李斯列传》。

大权，向二世建议说："天子之所以贵者，但以闻声，群臣莫得见其面故也。且陛下富于春秋，未必尽通诸事；今坐朝廷，谴举有不当者，则见短于大臣，非所以示神明于天下也。陛下不如深拱禁中，与臣及侍中习法者待事，事来有以揆之。如此，则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称圣主矣。"① 二世巴不得尽情享乐，遂用赵高之计、"乃不坐朝廷见大臣，常居禁中；赵高侍中用事，事皆决于赵高"②。从此，由秦始皇创立的至高无上的绝对皇权，便由秦二世手中转到了赵高手中，使秦王朝的残暴统治更加黑暗腐败。

二、广大劳动人民不堪忍受秦王朝的剥削和压迫

秦代的社会矛盾，最基本的是广大劳动人民同地主阶级的最高代表——封建统治集团的矛盾，突出地表现为无穷的徭役和残酷的刑罚。《汉书·食货志》说："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内愁怨，遂用溃叛。"这里的所谓"内兴功作，外攘夷狄"，主要有以下一些：

秦始皇二十六年，"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

秦始皇二十七年，"焉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郦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治驰道"。

秦始皇二十八年，"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僊人"。

秦始皇三十二年，"堕坏城郭，决通川防。……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

---

①② 《资治通鉴》卷八，秦二世皇帝二年。

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

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壻、贾人略取陆梁地……城河上为塞。……筑亭障”。

秦始皇三十四年，“適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

秦始皇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

以上仅是《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的统一天下后短短10年间所兴办的一部分巨大工程。其中，除了求仙、修阿房宫、筑骊山墓之类是秦始皇个人穷奢极欲之外，其余都是为了巩固统治，发展政治、经济、军事和国防建设的需要，是有利于统一事业的。但是，兴办上述事业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必须在社会经济允许的条件下进行。而秦始皇好大喜功、急于求成，超越了社会经济所能允许的程度。据《后汉书·郡国志》引《帝王世记》所载：“考苏、张之说，计秦及山东六国，戎卒尚存五百余万，推民口数，尚当千余万。及秦兼诸侯，置三十六郡，其所杀伤，三分居二①；犹以余力，行参夷之刑，收太半之赋，北筑长城四十余万，南戍五岭五十余万，阿房、骊山七十余万，十余年间②，百姓死没，相踵于路。”由此可知，在千余万的总人口中，每年仅用于筑长城、戍五岭、修阿房、凿骊山的兵役和徭役即达一百六十多万人，如加上京师和郡县的常备兵以及修驰道、直道等其他徭役，每年服役总人数则不下二百余万。正常的租赋制度不能满足需要，就横征暴敛，“收太半之赋”；正常的兵役和徭役制度不能满足需要，就强迫谪发，“先发吏有谪及赘壻、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③，最后则普遍发“闾左”贫民。在横

---

① 《通典·食货七》作“三分居一”。

② 《通典·食货七》作“三十年间”。

③ 《汉书·晁错传》。

征暴敛之下，人民若有所不满或反抗，则以严刑苛法相威逼，从髌、劓、黥、宫、笞，到腰斩、车裂、戮尸、枭首、弃市、烹、绞，以及灭家、灭宗、灭族、灭里，各种酷刑无所不用其极，以致“刑戮相望于道”①。这就是所谓秦王朝的暴政。正是这些暴政，即无穷的徭役和残酷的刑罚，给社会生产力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下去，把广大劳动人民拖入了苦难的深渊，从而大大激化了人民群众同地主阶级的最高代表——封建统治集团的矛盾。

三、社会各阶层对秦王朝的统治普遍不满

除广大劳动人民不堪忍受秦王朝的剥削和压迫之外，统治阶级中的中小地主、知识分子以及被秦王朝推翻的六国旧贵族的残余势力，也无不反对秦王朝的残暴统治。秦王朝“收泰半之赋”，不仅是对广大劳动人民的严酷剥削，对一切土地所有者，特别是中小地主阶层的利益，也是个很大打击，他们必须把自己从农民那里剥削来的收益的大部分转交给封建国家。秦王朝大征徭役和兵役，当然也包括各级土地所有者在内，特别是正常服役之外的“谪发”，既包括有罪的官吏在内，也包括一些无罪的商人以及由商人转化而来的地主及其子孙。秦王朝的苛法酷刑，更是广泛用于各阶级各阶层的人，这是自商鞅变法以来就留下的传统。商鞅本人即被车裂而死；李斯官至丞相，后来也具五刑，腰斩咸阳市；秦始皇的一些子女，也是死于“戮尸”和“磔”刑。当时，地主阶级内部的各个阶层，同秦王朝的矛盾也是很多的。正如贾谊所言：“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②正因为如此，出身于中小地主和下级官吏的刘邦、萧何、曹参等人，后来都参加了农民起义，成为推翻秦王朝的重要人物。

---

①② 贾谊：《过秦论》。

秦王朝同知识分子的矛盾，更有一段不解之怨。秦始皇三十四年（前 213 年）采纳李斯的意见，下令焚书："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① 次年，又在首都咸阳坑儒生四百六十余人。这就是历史上骇人听闻的焚书坑儒。我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学术思想空前繁荣，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一个宏大的知识分子群，在社会上具有重大影响，对我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发展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对我国古典文化是一次严重的摧残，对知识分子是一次严重的打击。从此，秦王朝对知识分子采取仇视态度，对一些知名之士就往往加以迫害。如秦已灭魏国之后数年，听说张耳、陈余是"魏之名士"②，便分别以千金、五百金购求此两人之头，逼得张耳、陈余只好隐姓埋名，逃跑至陈（今河南淮阳）避难。正因为这样，广大知识分子对秦王朝也采取同样的仇视态度，后来张耳、陈余以及极力反对"犯上作乱"的孔门子弟孔子的八世孙孔鲋，也都参加了农民起义的队伍。可见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很不得人心的。

此外，在秦始皇统一战争中被消灭的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其旧贵族的残余势力对秦王朝更怀有刻骨的仇恨，无一不准备伺机复仇，企图推翻秦王朝的统治。秦王朝曾对他们采取过一系列严厉的措施，如摧毁其政权，解散其军队，拆除其城郭堤防，设立郡县进行直接统治，把有势力的富豪迁往咸阳及边疆各地，等等。但他们的反抗仍然是疯狂而强烈的。如秦始皇二十九年（前 218 年）东巡时，走到阳武博浪沙（今河南原阳县境）就曾遭到力士的伏击，误中秦始皇的副车，险些击中秦始皇。这次

---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伏击的组织者就是原来韩国的贵族子弟张良。韩国灭亡时，张良还很年轻，当时有“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①。可见六国旧贵族的反秦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

秦代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是全面、深刻、复杂、激烈而严重的，其中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是广大劳动人民同秦王朝最高统治者的矛盾。到秦始皇死时，秦王朝已经是即将爆发的火山。但当时秦王朝掌握着强大的国家机器，秦始皇的“余威振于殊俗”②，还能维持暂时的统一局面。及至二世昏庸，赵高专权，不仅继续秦始皇的暴政，而且在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也造成分崩离析的局面，秦王朝的末日也就随之而来。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社会背景。

第二节　起义的爆发和发展

一、陈胜、吴广揭竿而起

陈胜字涉，是秦代南阳郡阳城县（今河南方城县东）人③，出身于雇农，曾给人庸耕，是个“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④。但他从小即立有“鸿鹄之志”⑤，并对贫苦农民寄予深切同情：“苟富贵，无相忘”⑥。吴广字叔，是秦代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出身于贫农，“素爱人”⑦，善于关心和团结群众。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秦王朝从汝阴（今安徽阜阳）、蕲县（今安徽宿县东

---

① 《史记·留侯世家》。

②④ 《过秦论》。

③ 阳城今址，历来说法不一，有河南登封、河南商水、安徽宿县、河南方城等诸说。本文从谭其骧著《陈胜乡里阳城考》一文，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

⑤⑥⑦ 《史记·陈涉世家》。

南）一带征发900名闾左贫民，谪戍渔阳（今北京市密云西南）。陈胜、吴广也在其中，并被指定为屯长。统率这900名戍卒的，是秦王朝的两个县尉。

当他们走到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刘村集）时，遇到连阴大雨，道路不通，不能前进，无法如期赶到渔阳。按照秦二世时的法律，“失期，法皆斩”①，于是这900人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在此关键时刻，陈胜、吴广开始暗暗谋划起义事宜。他们感到，现在逃跑也是死，不逃跑也是死，与其白白死去，还不如拼死干一番事业，遂坚定了起义的决心。陈胜又进一步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天下百姓痛苦地生活在秦王朝的残暴统治之下已经很久，起义一定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又认为秦二世是秦始皇的少子，“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②。吴广完全同意陈胜的分析。这一分析既抓住了秦王朝同广大劳动人民这一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又抓住了秦朝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以及秦王朝同六国旧贵族残余势力的矛盾，因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孤立秦二世、赵高等少数统治者，有利于发动以农民为主体的最广泛的反秦斗争。他们把公子扶苏和楚将项燕这两个毫不相干的亡灵联系起来，作为自己的策略口号，是颇有见解的。

为了进一步制造舆论、做好思想发动工作，他们又利用当时社会上普遍流行的迷信思想，采取鱼腹丹书、篝火狐鸣的办法，来提高陈胜的威望和增强其号召力。他们用朱砂在帛条上写下“陈胜王”三个字，然后把帛条填塞在鱼腹中。戍卒们买鱼烹食，剖鱼腹而见帛条和红字，非常惊奇，便互相暗暗传播开来。接着陈胜又叫吴广在夜间到驻地附近的荒庙中，点燃一堆火，假装狐狸的声音叫道：“大楚兴，陈胜王”③。戍卒们听见后更加惊异，都以

①②③《史记·陈涉世家》。

为陈胜是个非凡的人物，对他产生了信赖和拥戴之心。这一办法是陈胜、吴广从“卜者”那里讨教学来的，虽然具有迷信色彩，但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其影响和作用是很大的。

经过上述谋划和准备，陈胜、吴广终于找到一个发动起义的机会。当有一天统率戍卒的两个秦尉喝醉了酒的时候，吴广便故意散布要逃跑的言论，借以激怒秦尉。秦尉果然大怒，立即下令鞭笞吴广，引起戍卒们的愤恨不平。吴广遭到笞辱后不服，进一步激怒秦尉。秦尉拔剑欲斩吴广，吴广乘机夺剑杀了秦尉，在陈胜的帮助下，又杀了另一个秦尉。然后，陈胜、吴广把大家召集在一起，激励大家说：“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弟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则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① 大家齐声赞同，都团聚在陈胜、吴广的周围，光着右臂，设坛盟誓，号称“大楚”，以秦尉之首作祭礼，以扶苏、项燕的名义作号召，以陈胜为将军，以吴广为都尉。就这样，举起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革命旗帜。

二、起义军的发展壮大

起义爆发后，戍卒们“斩木为兵，揭竿为旗”②，在广大贫苦农民的支持、参加和拥护之下，同秦王朝统治者展开了英勇的殊死搏斗。起义迅速发展（参见附图4）。他们首先攻占大泽乡，发展队伍。接着夺取蕲县，起义队伍得到进一步壮大。于是，陈胜开始第一次分兵，令起义军将领符离（今安徽宿县东）人葛婴，率领部分兵力向蕲县以东发展，自己则亲率主力向西发展。陈胜所率主力，连克铚（今安徽宿县西南）、酂（今河南永城西）、谯（今安徽亳县）、苦（今河南鹿邑）、柘（今河南柘城西北）等五县，仅十多天的时间，沿睢水前进数百里，起义队伍得到迅速发展壮

---

① 《史记·陈涉世家》。

② 《过秦论》。

大。起义军进入陈境时，已拥有兵车六七百乘，骑兵千余人，步兵数万人，成为一支强大的农民武装力量，遂向陈郡的郡治陈发起了进攻。陈郡的郡守以及陈县的县令等均已逃跑，只有郡丞率兵抵抗，结果在丽谯门（陈县的城门）一战中郡丞战死，起义军胜利入陈。

陈在西周至春秋时曾为陈国都城，战国末楚国曾一度迁都于此，秦统一后成为陈郡的首府，是中原地区一重要城市；又是沟通黄河与淮河的鸿沟的流经地，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起义军攻占陈，即切断了秦王朝南北漕运的枢纽。这是自大泽乡起义后，不到一个月时间，所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起义队伍的扩大，要求起义军必须建立更严密的组织，提出更明确的纲领口号。陈胜入陈后“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①，共商国是。大家指出：“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②。但也有少数人持不同意见，如在陈避难多年的张耳、陈余等人这时也参加了起义队伍，他们向陈胜建议说：“夫秦为无道，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罢（疲）百姓之力，尽百姓之财。将军瞋目张胆，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为天下除残也。今始至陈而王之，示天下私。愿将军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为秦益敌也。敌多则力分，与众则兵强。如此野无交兵，县无守城，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则帝业成矣。今独王陈，恐天下解也。”③ 这一建议的实质，显然欲借农民起义的力量，推翻秦王朝的统治，恢复六国旧贵族的统治，因而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当时与会者们认为，为了领导反秦斗争，统一对秦王朝作战的指挥，陈胜必须“监临天下诸将，不为王不可”④。于是，陈胜在大家拥戴之下立为王，号曰“张楚”，意即张大楚国、统一天下，从而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政权，

---

①② 《史记·陈涉世家》。

③④ 《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并把“伐无道，诛暴秦”作为起义军响亮的纲领口号。这一政权和口号，不仅得到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劳动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而且有效地组织、动员、吸引了各阶级、各阶层、各方面人士投入到反秦斗争中来。当时不仅张耳、陈余等流亡的知识分子参加了革命队伍，连远在今山东的儒生、孔子的后人孔鲋，也“持孔氏礼器，往归陈王”①，做了陈胜的博士官。还有原楚国的一个封君（房君）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蔡赐，做了陈胜的上柱国（相当于宰相）。代表中小地主和下级官吏的“三老豪杰”们，极力颂扬陈胜的“功德”。六国旧王族的后裔如宁陵（今河南宁陵东南）君魏咎等，也投靠到了陈胜的门下。这样，一方面发展壮大了起义力量，同时也使起义队伍的成份日益复杂起来。但是，以陈胜为领袖、以广大贫苦农民为主体的起义军的革命性和阶级性，并未因此而被改变。所以，张楚政权的建立和“伐无道，诛暴秦”的纲领口号，对进一步发展起义大好形势是完全必要的和非常有利的。

张楚政权建立后，对各地广大贫苦农民和其他反秦势力，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使大泽乡点起的革命火炬，迅速燃成燎原之势。“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②，形成一个“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③，“天下云集响应”④，“从之如流水”⑤的局面。在这一大好形势下，陈胜以陈为根据地，决心彻底推翻秦王朝的统治，遂于秦二世元年七至八月，先后做出以下一系列决策和部署：

（一）以吴广为假王，统率楚军主力，指挥诸将西击荥阳（今

---

① 《史记·儒林列传》。

② 《史记·陈涉世家》。

③ 《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④ 《过秦论》。

⑤ 《汉书·晁错传》。

河南荥阳东北)，夺取入关中的要地，歼灭秦军在此地区的主力；

（二）以周文为将军，率军绕过荥阳，突入关中，直取咸阳；

（三）派宋留率兵定南阳，入武关，配合周文迂回咸阳；

（四）以武臣为将军，邵骚为护军，张耳、陈余为左、右校尉，率兵 3000 攻取原赵国地区；

（五）派邓宗攻取九江郡（郡治寿春，今安徽寿县）；

（六）派周市攻取原魏国地区；

（七）派召平攻取广陵（今江苏扬州西北）。

上述决策和部署表明，虽是四面出击，分兵略地，但其基本战略指导思想是，以主力西向关中，首先灭秦。因此，才以吴广用“假王”的名义，“监诸将以西击荥阳”①；在荥阳没有攻克的情况下，又派周文绕过荥阳而入关；同时又命宋留自武关迂回咸阳。对于广大的关东地区，陈胜既未派出众多的兵力，也未派出得力的将领。一心急于灭秦，这就是陈胜最基本的战略指导思想。

分兵略地的各路楚军都取得了各种不同情况的胜利；三支西进灭秦的楚军，也分别取得了一些重大的胜利。首先是吴广所率领的楚军主力，很快就击败了驻守在荥阳一带的秦军主力，夺取了荥阳周围各地，把李斯之子、三川郡郡守李由紧紧围困在荥阳城中。由于荥阳是秦王朝控制中原地区的军事重镇，兵精粮足，设防坚固，起义军一时未能攻克，战局遂呈胶着状态。其次是宋留所率的部队，顺利地攻占了南阳地区，但没有迅速地从武关向关中发展。取得成就最大的是周文。周文曾做过项燕军中的“视日”（占卜吉凶），又曾为春申君黄歇的门下之客，经历过抗秦斗争，具有较多的军事知识和战争经验。他率军西进，在吴广主力的掩护之下，绕过荥阳，直向关中插入，以巧妙而神速的行动，攻敌之不备，致使“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阖，长戟不刺，强弩不射”②，于秦二世元年九月，进抵距离秦都咸阳仅有百里之远的戏

① 《史记·陈涉世家》。

② 《过秦论》。

（今陕西临潼东北戏下村）。在进军途中，他们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起义军队伍空前壮大，到达戏时，周文军已拥有兵车千乘，步兵数十万，直接威胁着秦王朝的心脏——咸阳，大有一举毁灭秦王朝之势。

至此，由陈胜、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大起义，发展到了最高潮的阶段。仅仅 3 个月时间，就取得了惊人的胜利。

三、诸侯纷起叛秦

正当陈胜倾全力急于西进灭秦，并取得节节胜利之时，广大关东地区并没有统一在张楚政权的旗帜之下，而是逐步演成一个诸侯纷起、群雄并立的局面。这一局面，首先是由于起义军内部的某些分裂行动、旧习惯势力的影响以及六国旧贵族的割据行动所致。

武臣、张耳、陈余等奉陈胜之命北徇赵地，自白马津（今河南滑县东北）渡过黄河，在河北农民支持下，很快攻下三十余城，队伍发展到数万人，并于八月进入邯郸。他们一渡河就向原赵国各方面有影响的人士们鼓动说，陈胜“今已张大楚，王陈，使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于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非人豪也。诸君试相与计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无道之君，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此士之一时也”①。于是，在张耳、陈余等人的极力怂恿之下，武臣先号称“武信君”，接着又自立为赵王，以陈余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邵骚为左丞相，建立一个独立于张楚政权之外的赵国。陈胜闻讯后大怒，本“欲尽族武臣等家，而发兵击赵”②，但柱国房君建议说：“秦未亡而诛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贺之，使急引兵西击秦。”③陈胜从大局出发，采纳了这一建议，先加封张耳的儿子张敖为成都君，然后派使者向武臣祝贺，并请武臣尽快发兵入关，协助周文灭秦。

①②③《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而张耳、陈余却对武臣说："王王赵，非楚意，特以计贺王。楚已灭秦，必加兵于赵。愿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内（郡治朝歌，今河南淇县东）以自广。赵南据大河，北有燕、代，楚虽胜秦，必不敢制赵。"① 武臣听信了张耳、陈余的谗言，置大局于不顾，遂发兵"使韩广略燕，李良略常山，张黡略上党"②，一心发展自己的割据势力。

但张耳、陈余、武臣的如意算盘并未能如愿以偿。赵将韩广北徇燕地，很快占领了原燕国的一些地方。这时"燕故贵人豪杰谓韩广曰：'楚已立王，赵又已立王。燕虽小，亦万乘之国也，愿将军立为燕王。'"③于是韩广在二世元年九月自立为燕王，独立于楚、赵之外，又增加一个割据势力。

陈胜派出北徇魏地的周市，也深受旧习惯势力的影响，他很快平定了魏地，"诸侯皆欲立周市为魏王。市曰：'天下昏乱，忠臣乃见。今天下共叛秦，其义必立魏王后乃可。'"④ 他经过五次与陈胜交涉，终于在二世元年九月⑤ 立魏咎为王，自己做了魏相。

同年九月，原齐国王族田儋及其从弟田荣、田横等，也起兵杀了秦王朝的狄（今山东高青东南）令，并击败周市的部队，平定齐地，自立为齐王。

至此，借陈胜起义军进军关中的大好时机，在关东广大地区包括张楚政权在内共出现楚、赵、燕、魏、齐五国，只差韩国暂时尚未复国。陈胜在称王之前曾派葛婴向蕲县以东发展，葛婴打到东城（今安徽定远东南）时，便擅自拥立了原鲁国的贵族襄强为楚王。后闻陈胜称王，葛婴便杀了襄强，表示拥护陈胜，但陈胜仍诛杀了葛婴，使这支起义队伍受到一定削弱。陈胜派往徇九

---

①② 《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③ 《史记·陈涉世家》。

④ 《资治通鉴》卷七，秦二世皇帝元年九月。

⑤ 周市立魏咎为王的时间《史记·楚汉之际月表》作二世二年十二月。今从《通鉴》。

江的邓宗和徇广陵的召平，仍然还忠于陈胜，但没有取得重大进展。

除上述情况外，还有许多暂时尚未称王或暂时归属尚不明确的起义者，他们的企图和打算，也各不相同。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一些：

淮北方面，有秦嘉、董緤、朱鸡石、郑布、丁疾等人领导的起义队伍，他们攻占了淮北大部分地方，把秦王朝的东海郡郡守围困在东海郡治郯（今山东郯城北）。这支起义军人数颇为众多，被称为“郯下军”，曾一度在名义上接受陈胜的领导，但秦嘉等人又杀了陈胜派去的监军武平君畔，自立为大司马，使郯下军成为一支独立行动的部队。

江东方面，同年九月项梁（原楚国名将项燕之子）及其侄项羽，杀了秦王朝的会稽郡郡守殷通，召集吴中豪杰子弟，得精兵8000人，组成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部队，迅速略定江东地区。项梁自任会稽郡守，项羽为裨将，虽未称王割据，但也未统一在陈胜的旗帜之下。

其他方面，有沛县（今江苏沛县）人刘邦，在同年九月聚众起义，杀了沛令，自立为沛公，组成一支二三千人的队伍，攻占了沛县周围一些地方。高阳（今河南杞县西南）人郦商起兵于陈留一带，形成一支数千人的队伍。六县（今安徽六安市北）人英布与番阳（今江西波阳东北）县令吴芮，聚众数千，起义于番阳一带。东阳（今安徽天长西北）人陈婴，起兵于东阳，杀秦县令，聚众两万。还有沛人王陵，聚众数千，活动于南阳地区一带。这些分散的起义者，虽然还没有打出割据一方的旗帜，但他们都在力图发展扩大自己的势力，“名为亡秦，其实利之也”①。

这样，到秦二世元年九月为止，正当陈胜起义军在荥阳、关中一带同秦军浴血奋战的时候，广大关东地区，很快形成一个诸侯纷起、群雄并立的局面，基本上摧毁了秦王朝在关东各地的统

---

① 《过秦论》。

治势力，动摇和瓦解了秦王朝的统治。从广义上说，这也是秦末农民大起义所取得的重大胜利。但是，这一诸侯纷起、群雄并立局面的形成，也给秦王朝集中兵力、镇压陈胜起义军造成了可乘之机，给陈胜起义军的挫折和失败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并给秦王朝灭亡后出现一段较长时期的社会纷乱埋下了隐患。

第三节　秦军的镇压和起义军的严重挫折

一、秦王朝的紧急决策

秦末农民大起义的最显著特点，是来势猛烈，发展迅速，倾刻之间而天下大乱。但昏庸残暴的秦二世，居然在很长时间内不了解农民起义军发展壮大的真相，甚至不愿听到农民造反的消息，不允许下面报告起义军的情况。当陈胜已经在陈称王的时候，“谒者使东方来，以反者闻二世。二世怒，下吏。后使者至，上问，对曰：‘群盗，郡守尉方逐捕，今尽得，不足忧。’上悦。”① 这样，在关东的万里河山已被起义军分别占领的时候，除三川守李由率领原驻荥阳的重兵固守着通往关中的要地外，秦王朝几乎没有采取任何应急措施。直到二世元年九月，周文率领数十万大军打到距咸阳仅有百里的戏，秦二世这才大吃一惊。他急忙与群臣谋议，如何挽救危急。独揽大权的赵高、位居宰相的李斯等人，居然束手无策。只有少府章邯提出：“盗已至，众强，今发近县不及矣。郦山徒多，请赦之，授兵以击之。”②于是，秦二世按照章邯的建议，先后采取了以下三项措施：

（一）大赦天下，将在郦山和阿房宫服劳役的刑徒武装数十万人，以章邯为统帅，立即率领去抵抗起义军；

（二）征发关中、巴蜀地区的部队，由长史司马欣、董翳指挥，

---

①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

准备增援、补充章邯部队；

（三）抽调北部边区防守匈奴的部队，由王离指挥，准备增援和协助章邯作战。

于是农民起义军同秦王朝军队的浴血奋战开始了。

二、章邯率兵东击

秦二世元年九月，章邯统率由数十万郦山刑徒和奴产子武装起来的部队，向周文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当时双方的力量比较，不论数量或质量，农民军均处于劣势。周文的数十万大军绝大部分是沿途参加起义的贫苦农民，没有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缺乏作战经验，缺少指挥骨干，没有良好的武器装备，使用的是“鉏櫌白梃”，更没有后勤保障，而是随处“望屋而食”①，加之孤军深入，无后续部队应援，关中地区无各地起义相呼应，因而处于很不利的地位。章邯部队，仅郦山刑徒即达 70 万之众，虽然也是新编组成，但有精良的武器装备，大量的指挥骨干，充足的后勤保障，并有驻守咸阳和关中地区的精锐部队作应援，因而形成对周文军的巨大优势。结果戏下一战，周文军大败，不得不撤出函谷关，屯守于曹阳（今河南灵宝东）。

戏下之战，是大泽乡起义以来第一次遭受的失败，它给岌岌可危的秦王朝带来一个喘息的机会。周文军撤出函谷关后，章邯并没有立即跟踪追击，而是用两个多月的时间整训部队，把刚刚新编的部队训练成一支精锐大军，并做好各方面准备工作，然后再出关东征，疯狂反扑，企图全部消灭关东各地起义军。

三、起义军的分裂和失败

正当秦军调整部署，准备大举东征之际，以陈胜为首的关东

---

① 《过秦论》。

各地起义军，却毫无思想准备，仍然处于分裂、涣散、各自为战并不断发生矛盾与内讧之中。早在周文胜利进军关中的时候，陈胜就产生了“以秦政之乱，有轻秦之意，不复设备”①的轻敌思想。当时博士孔鲋曾提出：“臣闻兵法：‘不恃敌之不我攻，恃吾不可攻。’今王恃敌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悔之无及也。”②陈胜却满不在乎地回答说：“寡人之军，先生无累焉。”③及至周文败退出关，陈胜仍然没有采取任何增援周文部队的措施。吴广所率乃楚军精锐和主力，也继续钝兵在荥阳的坚城之下，没有采取适当措施去增援周文部队。宋留所率在南阳的部队，既没有趋武关策应周文，也没有北上增援周文。北方的赵国，这时又发生新的内乱，武臣被其部下李良所杀，张耳、陈余又击败李良，重新拥立原赵国之后赵歇为赵王；魏、齐、燕三国亦袖手旁观，他们皆有坐视秦楚相争之心，以伺机发展自己的势力。

在上述形势下，章邯于秦二世二年（前 208 年）十一月率兵出关，首先向周文部队猛扑。周文再次战败，退至渑池（今河南渑池西）。十多天后，章邯大军追及，周文兵败自杀，全军溃散。陈胜起义军中数量最多的一支部队，经过 3 个月孤军作战，终于失败了。

这时吴广的部下将军田臧等人感到大势不妙，相与谋曰：“周章（即周文）军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围荥阳城弗能下，秦军至，必大败。不如少遗兵，足以守荥阳，悉精兵迎秦军。今假王骄，不知兵权，不可与计，非诛之，事恐败。”④ 遂假传陈胜的命令杀了吴广；陈胜得报后，只好委任田臧为上将，接替吴广的指挥。于是田臧按照自己的想法，留李归等率兵一部监视荥阳，亲率全部精兵西去迎击秦军。这时的秦军业经整训，连战皆捷，士气正盛，锐不可当；而楚军则相反，周文之败，吴广之死，以及久疲于坚城之下，士气、军心受到重大影响，加之装备与兵力数

---

①②③ 《资治通鉴》卷七，秦二世皇帝元年。

④ 《史记·陈涉世家》。

量的劣势，不可能是秦军的对手。两军在敖仓（今河南荥阳西北）遭遇，结果楚军大败，田臧战死，部队溃散。接着章邯进军于荥阳城下，李归战死，部队溃散。这样，陈胜起义军的精锐和主力，几乎全部被歼。

章邯解荥阳之围后，又进一步得到秦二世所派、司马欣和董翳所率关中秦军的加强和补充，遂兵分两路南下：一部进至郏县（今河南郏县），击败楚将邓说军；主力进至许县（今河南许昌东），击败楚将伍逢（即伍徐）军，兵锋直指张楚政权的都城陈。邓说、伍逢率残部退至陈，陈胜焦急气怒，竟诛杀了邓说。这时陈胜已十分危急，便把柱国房君蔡赐派出，率兵抵抗秦军，结果楚军战败，蔡赐战死。最后，只剩下一支城西张贺军，陈胜亲自出城督战，又遭失败，张贺战死。陈胜已无力守陈，于是便率残部向汝阴（今安徽阜阳）方向撤退。同年十二月（约公元前 208 年 1 月），陈胜走到下城父（今安徽涡阳东南）时被其车夫叛徒庄贾杀害。庄贾随即投降秦军。

章邯攻占陈后，一方面留其左右校尉守陈，同时遣别将司马尸东徇楚地，进一步扫荡陈胜余部，自己则亲率主力，西下南阳，准备去消灭陈胜起义军的宋留部队。宋留在南阳听说陈胜已死，便放弃南阳，转兵东撤，至新蔡（今河南新蔡）时与章邯部队相遇，不战而降。章邯将宋留押送到咸阳，被秦二世车裂示众。

至此，陈胜起义军的各支主要部队——周文、吴广、宋留、张贺等部，均告失败，张楚政权历时 6 个月而灭亡。由陈胜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遭受严重的挫折和失败，暂时转入了低潮。

但是，陈胜起义军余部在农民革命中心地陈，同秦军又进行了反复殊死的争夺战斗。陈胜死后，其部将吕臣在新阳（今安徽界首北）组织一支皆头著青巾的苍头军，乘章邯主力西下南阳之时，突然向秦军左右校发起猛烈进攻，夺回了陈，杀了叛徒庄贾，安葬了陈胜。后秦军左右校复攻陈，吕臣撤走，与英布起义军联合，又一度击败秦军，夺回陈。之后，双方又进行多次争夺，充分表现了起义军英勇顽强的精神。陈胜起义军余部——吕臣、召

平、邓宗等部，后来与英布、项梁、项羽等起义军联合，终于发展成更加强大的起义队伍，成为推翻秦王朝的主力军。

第四节 反秦斗争的再度高涨和最后胜利

一、项梁、项羽起义军的发展壮大

秦军的疯狂反扑和陈胜的失败，给关东各地起义者一个深刻的教训，即必须联合起来，共同抗击秦军的镇压，才能进而推翻秦王朝的统治。所以，自陈胜被害以后，除个别分裂割据者外，联合作战的趋势日益发展起来。项梁、项羽起义军，就是通过不断的联合而得到发展壮大的。

首先发动与开展联合工作的是陈胜的部将吕臣、召平等人。吕臣最早与英布起义军联合，曾击败秦军于青波（即青陂，今河南新蔡西接息县界），后因宋留降，章邯主力自南阳返陈，英布、吕臣等才引军东撤。召平奉陈胜之命进军广陵，未能攻克。他听到陈胜兵败的消息，尚不知陈胜的存亡，便立即渡江去找项梁起义军联合。他假称奉陈胜之命，拜项梁为张楚政权的上柱国，劝项梁“急引兵西击秦”①。项梁接受了这一职务，于秦二世二年（前208年）二月率8000精兵渡江，与召平军联合北上。项梁渡江后，又派人同东阳的陈婴起义军联系。陈婴认为：“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②遂率领全部起义军两万余人加入了项梁的队伍。接着，项梁于同年三月渡淮，与英布、浦将军、吕臣等起义军相遇，英布等又参加了项梁的队伍，遂联合成一支六七万人的大军，进驻于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这时，一向同陈胜起义军闹“独立性”的秦嘉，驻军于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以东，挡住了项梁军西进和北

①② 《史记·项羽本纪》。

上之路。秦嘉乘陈胜兵败之机，拥立了原楚国贵族景驹为王，企图发展自己的割据势力，因而竟以武力阻止项梁军的行动。项梁认为："陈王（即陈胜）先首事，战不利，未闻所在。今秦嘉倍（背）陈王而立景驹，逆无道。"①遂于同年四月进兵击杀秦嘉，景驹逃亡而死，全部淮北起义军被项梁收编、联合。接着进兵胡陵（今山东鱼台东南），攻占薛县（今山东滕县东南），队伍发展到十余万人。这时刘邦领导的起义军已发展到九千余人，发展不甚顺利，也主动到薛县与项梁联合。项梁以"卒五千人，五大夫将十人"②加强刘邦的队伍，令其还军攻取丰邑（今山东丰县），发展扩大起义队伍。正当项梁准备从胡陵方向西进的时候，有两个情况发生了。一是楚将朱鸡石和余樊君在栗县（今河南夏邑）与秦军遭遇，战败，余樊君战亡，朱鸡石逃回。项梁诛杀了作战不力的朱鸡石，整饬了军纪。另一个情况是项梁渡江后曾派项羽率兵一部去攻襄城（今河南襄城），襄城坚守不下，项羽经很长时间战斗才攻克，取得了胜利，并获得了陈胜确实已死的消息，遂回薛县向项梁作了报告。

项梁渡江以来一直打的是张楚政权的旗号，听说陈胜确实已死，遂召集诸将及刘邦等共议大事。谋士范增向项梁建议说："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返），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今君起江东，楚蠭午（意谓蜂拥而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③项梁采纳这一建议，从民间找来为人牧羊的楚怀王的孙子心，于二世二年六月立以为王。为了"从民望"，仍称楚怀王。都于盱台（今江苏盱眙东北），以陈婴为上柱国，项梁为武信君。与此同时，项梁应刘邦的谋士张良的请求，册立了原韩国的公子韩成为韩王，由张良任司徒，率兵千余人到原来韩国去攻城略地，活动于颍川（郡治阳翟，今河南禹县）一带。

---

①③《史记·项羽本纪》。

②《汉书·高帝纪》。

至此，在陈胜被害后6个月，项梁、项羽、刘邦的势力发展壮大起来，由项楚政权取代了张楚政权；由以陈胜起义军为主同秦王朝的作战，发展为以项楚政权为主，联合齐、魏、赵、燕、韩各诸侯国反秦势力共同对秦作战。反秦斗争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逐步掀起了新的高潮。

二、临济、东阿、定陶之战

章邯在击灭陈胜各支主力军之后，便逐步将主要进攻矛头指向周市所建的魏国，企图各个消灭关东各诸侯国及各地起义者。约于秦二世二年端月① 即派部分兵力包围了临济（今河南封丘东）。但章邯因平定南阳地区，又回军至陈与吕臣、英布作战，接着又同秦嘉、刘邦、进攻襄城的项羽以及其他分散的起义军作战，先后用去近四个月时间。直至二世二年六月，章邯才亲率主力大军向临济发起猛攻。魏王咎一面坚城自守，一面派周市去求救于齐、楚二国。为了联合抗秦，齐王田儋及其弟田荣亲自率兵来救，楚怀王亦派项它率兵来救。章邯乘齐、楚联军远道而来、兵疲无备之机，采取"夜衔枚击"②的突袭手段，大破齐楚联军于临济城下，田儋、周市被杀，田荣、项它分别率残部逃归。魏王咎见大势已去，举城投降，然后焚火自杀，魏国灭亡。但其弟魏豹不肯屈服，逃亡到楚国，楚怀王授兵数千，令其返魏，相机攻城略地，重建魏国。

临济之战，是章邯继消灭张楚政权后取得的又一个重大胜利，不仅消灭了新建的魏国，而且击败齐、楚联军，杀死了齐王田儋，给新建的齐国以重大的打击。在此基础上，章邯又立即把攻击目标指向了齐国，企图乘齐王田儋战死之机，一举扫平齐国各地。他

---

① 参见《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二世二年端月，"章邯已破涉，围咎临济"。

② 《资治通鉴》卷八，秦二世皇帝二年。

除留兵平定魏国各地外，亲率主力追击田荣到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田荣收残兵固守，章邯日夜围攻。齐国各地的反秦浪潮也在不断高涨，闻齐王田儋战死，田荣被围于东阿，遂又拥立了原来齐国灭亡时齐王田建之弟田假为王，田角为相，田间为将，准备抵抗秦军对齐国的大举进攻。

这时正值二世二年七月，大雨连绵，项梁方率楚军主力西下，进攻亢父（今山东济宁南），忽闻齐楚联军败于临济，田荣被围东阿，齐国形势危急，便亲率楚军主力北上东阿，决心给秦军以迎头痛击。章邯没有料到齐楚联军刚败于临济城下，楚军主力居然北进东阿，结果被项梁大破于东阿城下，率败兵西撤。项梁本欲同田荣共追秦军，但田荣不肯。田荣听说齐国又另立了田假为王，田角为相，田间为将，怒不可遏，遂引兵东归去打内战。项梁独自率兵去追章邯，同时派项羽、刘邦从南面迂回到秦军侧后，断其归路。项梁追至濮阳（东郡郡治，今河南濮阳南）东，再次击败章邯军。章邯退入濮阳城内，整顿部队，收集残兵，请求援军，引黄河之水环城自固，加强防守。这时，项羽、刘邦攻占了城阳（今山东菏泽东北）。又转攻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定陶城坚未下。八月，项羽、刘邦绕过定陶西攻雍丘（今河南杞县），大败秦军，刘邦部下五大夫将曹参斩三川郡郡守李由，取得一次很大胜利。接着，项羽、刘邦又去进攻外黄（今河南兰考东南）、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陈留城），基本上切断了章邯军与洛阳间的联系。这时，项梁率楚军主力至定陶，再破秦军；魏豹也在魏地攻占二十余城，被楚怀王立为魏王，遂逐渐形成对章邯军的战略包围态势，形势发展对起义军十分有利。

东阿、城阳、雍丘、定陶、濮阳东等地作战的一系列胜利，使项梁逐渐产生了骄傲情绪，“益轻秦，有骄色”①。其部下宋义进谏：“战胜而将骄卒惰者，败。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为君畏之！”②项梁不听。他一面率主力屯驻于定陶，一面叫项羽、刘邦继续在

①② 《资治通鉴》卷八，秦二世皇帝二年。

外黄、陈留一带作战，一面叫宋义出使齐国，请齐国出兵，一道对章邯发动进攻。但这时的齐国发生了新的变化，田荣在同年八月击败田假，田假逃跑到楚国，田角、田间流亡在赵国；田荣重新平定齐地，拥立田儋之子田市为王，田荣自为齐相，田横为将。田荣提出，如果楚国杀掉田假，赵国杀掉田角、田间，齐国就一道出兵对秦作战；楚、赵没有答应田荣的要求，“田荣怒，终不肯出兵。”① 这时秦二世“悉起兵益章邯”②，北防匈奴的王离部队也调归章邯指挥，秦军的力量又迅速增强起来，遂使战局很快就发生了新的变化。

九月初，章邯见时机到来，乘项梁孤军围困定陶，项羽、刘邦远在陈留、外黄一带，齐、赵、燕皆未发兵助楚，遂集中全力，又一次采取突袭手段，自濮阳“夜衔枚击项梁定陶”③，与定陶秦军内外夹攻，大破楚军，项梁战死，楚军主力损失大半。至此，反秦斗争又一次遭到严重挫折，秦军重新取得中原战场的主动权。

三、巨 鹿 决 战

（参见附图 5）

定陶之战后，在陈留、外黄一带作战的项羽、刘邦、吕臣等人，深感形势不利，遂迅速引兵东撤，吕臣率部驻彭城东，项羽率部驻彭城西，刘邦率部驻砀（今安徽砀山县南），布成犄角之势，以利互相应援，严阵以待秦军来攻。接着，楚怀王自盱台徙都于彭城，将吕臣和项羽的军队合并，自己亲自统率；以刘邦为砀郡长，封武安侯，统率砀郡兵；封项羽为长安侯，号为鲁公；吕臣为司徒，其父吕青为令尹。从而进一步调整了部署，加强了政权建设，准备再次同秦军决战。

但是，章邯在定陶之战击败楚军主力之后，错误地估计了形

---

①② 《资治通鉴》卷八，秦二世皇帝二年。

③ 《汉书·高帝纪》。

势，“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击赵”①。赵国的情况，自二世二年端月张耳、陈余拥立了赵王歇，李良战败投降了章邯，李良在秦军的支持下，同赵军在信都（今河北邢台）一带展开了长期的战斗，因而赵军始终未能参与临济、定陶等会战。章邯取得定陶之战的胜利后，于二世二年后九月（即润九月）挥军北上，迅速击溃赵军，占领邯郸。并毁坏了邯郸的城廓，将当地人民迁往河内（郡治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以防止赵地人民再聚众据城反抗。赵王歇与张耳率残部退守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陈余北收常山（郡治东垣，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北）兵数万人，扎营于巨鹿城西；同时派人向各诸侯国呼救。章邯派王离、涉间、苏角等率绝对优势的兵力包围巨鹿，自己则率秦军主力驻军于巨鹿城南的棘原，派兵筑甬道与黄河相连，源源不断地把粮饷自敖仓输送给王离部队。王离兵多食足，巨鹿城中兵少粮尽，十分危急。张耳不断逼迫陈余拼死一战，陈余曾以5000人作一次尝试，结果全部被歼，无一人得还。

在巨鹿危急之中，为了顾全大局，各诸侯国都先后不同地派出了援军。燕王韩广派燕将臧荼率兵救赵；齐相田荣不顾大局，不肯发兵，齐将田都则背叛田荣，率兵救赵；原齐王建的孙子田安，攻下济北（郡治博阳，今山东泰安东南），亦率兵救赵；张耳之子张敖也从代郡（郡治今河北蔚县）集军万余人救赵。所有这些救赵的军队，都驻扎在巨鹿城北陈余军侧，共筑十余壁垒；因兵力寡弱，互相观望，不敢向秦军攻击。巨鹿危急日甚一日，唯望楚军到来，一决胜负。

在上述形势下，楚国于秦二世二年后九月做出了如下战略决策：

（一）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率楚军主力北上救赵；号宋义为卿子冠军，诸将诸军皆归其指挥。

（二）由刘邦率领部分兵力西进，收集陈胜、项梁失败后的零

① 《史记·项羽本纪》。

散义军，袭扰秦军后方，相机乘虚入关。

这一决策的关键在于北上救赵的成败：胜，则秦王朝的主力和精锐部队将被歼灭，无法逃脱灭亡的命运；败，则关东义军亦成瓦解之势，各诸侯国有被各个消灭的危险。

但是，在宋义率领下的楚军主力，进军至安阳（今山东曹县东北）便停止下来，一连驻止46天，不肯进军救赵。项羽建议说："吾闻秦军围赵王巨鹿，疾引兵渡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破秦军必矣。"① 宋义反驳说："今秦攻赵，战胜则兵罢（疲），我承其敝；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必举（破）秦矣。"②因而主张先让秦、赵互斗，待双方力量削弱之后，再伺机而动。并非常自负地对项羽说："夫被坚执锐，义不如公；坐而运策，公不如义。"③他恐项羽不听指挥，下令军中："猛如虎，很如羊，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斩之。"④

宋义拒绝项羽的建议后，继续按兵不动，又亲自到无盐（今山东东平东南）大摆宴席，送他的儿子去齐国为相，以发展扩大自己的势力。这时，天寒、大雨，军中缺粮，士兵忍饥受冻，巨鹿的赵军又十分危急，宋义的行动引起了将士们的公愤。项羽义正词严地指责宋义："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扫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⑤遂乘诸将"晨朝"上将军之机，项羽在军帐中杀了宋义。然后派人报告楚怀王，怀王任命项羽为上将军，率诸将诸军，北上救赵。

秦二世三年（前207年）十一月，项羽取得指挥权后，立即挥军北上。他首先派英布、蒲将军率兵2万渡河，切断秦军运粮的甬道。然后"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⑥。于是，在二世三年十二月

---

①②③④⑤⑥ 《史记·项羽本纪》。

向秦军王离部发起猛烈攻击，九战九捷，大破秦军。在赵军和救赵各诸侯军协助下，至二世三年端月①，全歼秦军精锐王离部，王离被俘，苏角被杀，涉间不肯投降，自焚而死。从而解了巨鹿之围，取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这一战充分表现了楚军灭秦的决心和英勇气概。开始时各诸侯救赵军皆不敢向秦军发动攻击，“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②。击败秦军后，“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③。经过这次战斗，项羽被公认为各路诸侯军的统帅，义军的声威大震，指挥更加统一，配合更加密切，士气更加高昂，给下一步全歼秦军主力章邯部队奠定了基础。

解巨鹿之围后，义军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项羽随即率各诸侯军渡过漳水至漳南，寻歼章邯军主力。章邯军虽然兵力尚很雄厚，但因巨鹿城下挫败，精锐王离部被歼，士气低落，军心涣散，不敢与义军正面迎战，一再在棘原一带退缩防御，敛兵自守，先后与项羽相持半年之久。这期间义军多次发动攻击，秦军连连失利，但未能大量歼灭秦军有生力量。秦二世、赵高多次责备章邯作战不力，章邯甚为恐惧，于同年四月派长史司马欣去咸阳请示有关作战问题，一连三日等候在司马门，赵高不肯接见。后闻赵高有怀疑之心，司马欣急忙绕道逃回军中。赵高果然派人追拿，未能捕及。司马欣回来后向章邯报告说：“赵高用事于中，下无可为者。今战能胜，高必疾妒吾功；战不能胜，不免于死。愿将军孰计之。”④这时陈余也给章邯写了一封劝降书，指出白起、蒙恬等屈死的先例，章邯面临的前途是“有功亦诛，无功亦诛”⑤，不如投降义军，合纵灭秦。于是章邯更加恐惧，全军上下都动摇起来。章邯遂秘密派人向项羽求和，未能达成协议。项羽派蒲将军

---

① 端月即正月。秦以十月为岁首。在二世三年即公元前207年中，端月在十二月之后。

②③④⑤《史记·项羽本纪》。

率兵一部，昼夜兼程渡漳水进至三户津（今河北临漳西），切断了章邯的退路。然后乘秦军动摇之际，发动一次猛烈攻势，再破秦军于汙水（漳水支流，在今河北临漳附近）上。章邯走投无路，再次派人乞降；项羽因军粮不足，遂允其所请。秦二世三年七月，章邯率二十余万秦军在洹水南岸的殷墟（今河南安阳西）投降。至此，巨鹿决战胜利结束。前后历时十个半月，秦军精锐和主力先后被歼，秦王朝的军事力量基本瓦解，灭亡的命运已无可逃脱。

这次决战胜利的取得，起主要作用的是项羽及其所率的楚军。项羽坚持抗秦救赵，从大局出发，在关键时刻杀了宋义，夺取指挥权，用"破釜沉舟"的精神歼灭了秦军精锐；又乘秦军主力动摇之际给予军事上的重创，因而使义军由被动转为主动，取得了决战的全面胜利，大大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章邯的根本失误有二：一是在定陶战后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未能认清主要抗秦力量仍是楚军，没有乘胜平定楚地，从而造成严重后果。二是在长期围困巨鹿时，未能抓住宋义驻军安阳46日的有利时机，集中全力将各诸侯军消灭于巨鹿城下，又未能集中强大兵力阻止楚军渡河，因而由主动转入被动，由胜利走向失败，直至全局无法挽回。

四、秦朝统治者内部互相残杀

正当章邯率军在关东苦战之时，秦王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危机一天天在加深。自从陈胜、吴广起义，周文入关，章邯东征，天下大乱，李斯曾多次想向秦二世提出一些改善政治状况的意见，但"二世不许"①，反而多次责备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盗如此！"② 并向李斯进一步提出："吾愿赐志广欲，长享天下而无害，为之奈何？"③李斯怀着恐惧的心情，为了保住自己的官爵，遂顺从秦二世的意图，提出一整套所谓"行督责之术"④的建议，劝二世

①③④《史记·李斯列传》。

②《资治通鉴》卷八，秦二世皇帝二年。

进一步加强酷法严刑，“独断”、“恣睢”，不许“俭节仁义之人立于朝”、“谏说论理之臣间于侧”、“烈士死节之行显于世”，“灭仁义之途，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揜明，内独视听”，从而达到“主严尊”、“臣无邪”、“天下安”、“所求得”、“国家富”、“君乐丰”、“所欲无不得”、“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的目的。李斯这一套倒行逆施的建议，深得秦二世的欢心，于是大行督责之术，以“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①。这样，把秦王朝残暴黑暗的反动统治，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秦民益骇惧思乱”②。秦王朝的末日亦随之加速到来。

此外，赵高、李斯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化。赵高虽独揽大权，但地位在李斯之下；赵高欲取代李斯之位，李斯欲排除赵高的专权。秦二世二年七月，关东反秦斗争再度高涨，章邯在东阿战败，李斯见形势日益恶化，便与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共同上书给二世，劝二世暂停修建阿房宫，“减省四边戍转”③。秦二世闻言大怒，立即将此三人下狱。冯去疾、冯劫在狱中自杀；李斯被赵高诬以“与子由谋反”④，即与其长子三川守李由通谋于起义军，结果“具斯五刑”、“腰斩咸阳市”、“夷三族”⑤。

李斯死后，赵高做了中丞相。他曾多次对二世讲：“关东盗无能为也。”⑥ 及至巨鹿之战后，王离被俘，章邯投降，刘邦率领的部分义军也打至武关附近，这时赵高才恐惧起来，深怕二世怪罪，“诛及其身”⑦，遂起杀二世之心。二世三年（前 207 年）八月，赵高乘二世去望夷宫（今陕西泾阳东南）祭祀泾水之机，遂发动一次宫廷政变。他以其弟郎中令赵成作内应，命其婿咸阳令闫乐以捕盗为名，率吏卒千余人进袭望夷宫，杀掉卫令，击杀诸郎及宦者，逼迫二世自杀。二世哀求欲做一郡之王或万户侯或普通百姓

---

①⑤ 参见《史记·李斯列传》。

②③④ 《资治通鉴》卷八，秦二世皇帝二年。

⑥⑦ 《资治通鉴》卷八，秦二世皇帝三年。

——黔首，均不得允许，被逼无奈而自杀。

二世死后，赵高下令去掉帝号，欲立二世之侄子婴（一说为始皇之弟）为秦王。子婴得悉“赵高乃与楚约，灭秦宗室而王关中”① 的消息，遂借赵高请子婴继承王位之机，刺杀赵高，夷其三族，徇于咸阳市。

至此，秦王朝不仅军事力量已经瓦解，其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各方面的重要人物，均已互相残杀殆尽，只剩下一个“孤立无亲，危弱无辅”② 的子婴。这时，项羽正率领各诸侯军和章邯的降军西进，刘邦已进军至武关。子婴的出路，唯束手待降而已。

五、起义军乘虚入关亡秦

自秦二世二年后九月开始，宋义、项羽、范增率楚军主力北上救赵，刘邦率部分兵力西进。为鼓励诸将勇敢作战，决心灭秦，楚怀王还与诸将相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③ 当时，秦军主力与各反秦军主力均集中于河北，这就给刘邦西进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但是，刘邦的军队不过万人，巨鹿决战刚刚开始，形势的发展变化尚难预料，西进入关绝非轻而易举之事。

刘邦接受怀王命他西进的任务后，积极准备，整顿内部，扩大部队。他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首先活动于砀郡及其周围，在城阳（今山东菏泽东南）、成武（今山东成武）一带打了一些胜仗。秦二世三年十月，刘邦在栗县（今河南夏邑）编并了刚武侯的反秦部队四千余人，并联合魏将皇欣、武满共同行动，声势渐大。秦二世三年二月，刘邦乘巨鹿决战的时机由砀率军北上，联合巨野泽（今山东巨野县境内）彭越领导的起义军千余人，进攻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不下，折而向西，过高阳（今河南杞县西南）

---

① 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及《汉书·高帝纪》。

② 《过秦论》。

③ 《汉书·高帝纪》。

时，采纳谋士郦食其的建议，攻破秦储粮地陈留，得到了充分的补给，并收编了郦食其之弟郦商的军队4000人，壮大了力量，为西进击秦进一步创造了条件。三月，进攻开封不下，与秦将杨熊战于白马和曲遇（今河南中牟）东，大败秦军。四月，刘邦因荥阳难攻，率军南下，攻占了颍川郡，又北攻平阴（今河南孟津北），封锁了黄河渡口，进到洛阳东，与秦军交战失利。便向南迂回，出轘辕关（今河南偃师东南）险道，准备由武关进入关中。为保证侧后安全，刘邦令韩王成留守阳翟（今河南禹县），牵制洛阳一带秦军；命张良率部分韩军与自己南下，进逼南阳。

六月，刘邦至犨（今河南平顶山市西南）东，大破秦南阳郡守吕齮的军队。吕齮退守宛城（今河南南阳）。刘邦急于入关，绕过宛城西进。张良进谏："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尚众，距险。今不下宛，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① 刘邦采纳了这一意见，连夜偃旗息鼓，绕道回师，黎明时包围了宛城。吕齮惊惶失措，被迫投降。

七月，刘邦军由宛城继续西进，同时占胡阳（今河南唐河南），西克郦（今河南南阳西北）、析（今河南西峡）两城，肃清了南阳地区的秦军。同时收编了高武侯鳃、襄侯王陵、吴芮别将梅销领导的反秦部队，进一步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力量。这时项羽已取得巨鹿决战的全面胜利，统率各诸侯军及秦降军大举南下、西进。后因扫荡洛阳一带残敌及在新安（今河南渑池东）坑杀二十余万有哗变之虞的秦降兵，拖延了入关时间。

八月，刘邦攻破关中的东南门户武关。这时，赵高杀了秦二世，欲与刘邦相约分王关中，被刘邦拒绝。九月初，子婴杀了赵高，派出秦王朝最后一支保卫咸阳的武装力量去防守峣关（今陕西蓝田东南），企图阻止起义军的西进。峣关前据峣岭，后靠蒉山，地形险要，是由武关北入咸阳的最后一关。张良认为不宜强攻。他建议一面在山上多张旗帜，作为疑兵；一面派人利诱守将，以松

---

①《史记·高祖本纪》。

懈其斗志。刘邦按照这一建议，乘守军戒备疏忽时，绕过峣关，翻越蒉山，大败秦军于蓝田（今西安市东南），进逼咸阳。

汉高帝元年（前206年）十月，刘邦率军进至霸上（今西安市东南）。秦王子婴无力抵抗，在轵道（今西安市东北）捧着封好的玺、印、符、节，"素车、白马，系颈以组"①，投降于刘邦。不久，项羽率兵入关，"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②。就这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强大而残暴的秦王朝，只有15年的历史，便被埋葬于农民大起义的革命烈火之中。

第五节 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原因和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历史意义及其经验教训

一、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原因

秦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封建王朝，正处于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上升发展的阶段。它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基本上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继承和发展。它并吞六国，统一中原，南平百越，北逐匈奴，是多么强大有力！它统一文字、统一车轨、统一度量衡，是多么生气勃勃！可是为什么只存在15年就灭亡了呢？为什么崩溃得如此迅速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秦王朝的暴政，导致了秦代社会全面而深刻的危机。

汉代政论家贾谊曾指出："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

① 《史记·高祖本纪》。

② 《史记·项羽本纪》。

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① 这就是说，秦始皇结束了春秋战国五百余年分裂战乱局面，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的，是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的，所以才“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莫不虚心而仰上”。这是秦始皇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但是，完成统一中原的事业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是“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也就是要与民休息，使人民安居乐业，使国家繁荣富强，使新生的统一的封建制度得到一个长期稳定的和平发展。对于这一历史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愿望，秦始皇曾一度有所察觉和注意，所以在统一中原后的最初几年，曾反复宣传和强调“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忧恤黔首，朝夕不懈”，“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②；“甾害绝息，永偃戎兵”③；“黎庶无徭，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④。因此，秦始皇统一后的最初六七年间，基本上是和平安定、生气勃勃的。这期间虽然也有修缮长城、开筑驰道和进兵岭南等重大行动，但基本上在正常服役制度和正常租税制度之内进行的，未引起普遍性的社会动乱和危机。

自秦始皇三十二年以后，情况发生了急骤的变化。一是北击匈奴，发兵三十余万；二是大规模修筑万里长城和直道，“发卒五十万”⑤；三是进一步大规模进军岭南，“南戍五岭五十余万”⑥；四是作阿房宫和修郦山墓，征发天下“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⑦。平均每年服役者二百万人以上，大大超过了社会总人口（一千余

① 《过秦论》。

② 秦始皇二十八年《琅邪刻辞》。

③ 秦始皇二十九年《之罘刻辞》。

④ 秦始皇三十二年《碣石刻辞》。

⑤ 《淮南子·人间训》。

⑥ 《秦会要订补·民政》。

⑦ 《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纪事。

万）和社会劳动生产率① 所能允许的程度。正常的服役制度不能满足需求，便以严刑酷法强迫“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壻、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②。正常的租税制度不能满足需求，便强行征收“泰半之赋”，先侵“贫人贱民”③，次侵“富人吏家”④，后侵“宗室大臣”⑤。于是陷入“亲疏皆危，外内咸怨，离散逋逃，人有走心”⑥的社会总危机之中。因此，汉人贾山正确地指出：“秦皇帝身在之时，天下已坏矣，而弗自知也。”“然身死才数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庙灭绝矣”⑦。

秦始皇的上述暴政，除修阿房宫、郦山墓等是其个人骄奢淫逸之外，大部分内容，如修驰道、筑长城、击匈奴、平百越等等，在历史上都有重大的积极的意义，都是为了巩固、加强、扩大秦王朝的统治，而结果却加速了秦王朝的危机、崩溃和灭亡。这个道理就在于，秦始皇好大喜功，急于求成，不顾客观上人力、物力、财力的实际可能，依靠酷法严刑、横征暴敛为所欲为。违反了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和广大人民的愿望，在经历五百余年的分裂、割据和战乱之后，不给人民一个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的条件，不给历史一个稳定、和平、发展的时期，结果受到了历史和人民的无情的惩罚。这就是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根本原因。

秦自商鞅变法之后，经过一百多年的斗争，统一了“天下”，一直拥有一支数量众多、装备精良、训练良好、组织指挥严密、战斗力强大的军队，它是秦王朝的主要支柱。这个“支柱”的瓦解，在上述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根本原因的基础上，还有以下几个具体原因：

（一）武装力量的布局外重内轻，失去了对中原地区的控制能

---

① 参见《社会科学》1980年第六期载肖国亮著《秦二世而亡的经济原因》。

②③④⑤⑥ 《汉书·晁错传》。

⑦ 《汉书·贾山传》载贾山《至言》。

力。秦代的百余万大军，北防匈奴三十余万，南戍五岭五十余万，屯卫咸阳约十万，绝大部分分布在南、北两边，驻守中原地区的部队极少，各郡县的常备武装力量也很散弱。而秦王朝的主要危机和矛盾，突出地反映在广大的中原地区。秦灭六国而王天下，各种传统反秦势力多在中原；秦王朝各种暴政的主要受害者是中原地区的广大农民。正是这种外重内轻的军事布局和中原地区的强烈反秦情绪，才使秦末农民起义在短短三个月内几乎全部瓦解了秦王朝在关东的统治。这样，作为统一政权支柱的秦王朝的军队，便失去了中原地区最广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源，使强大的秦军瞬息之间受到了极大的削弱。

（二）岭南部队的割据自保，使秦王朝的战略机动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50 万秦军在岭南，这是一支举足轻重的战略力量。当章邯率兵东征的时候，若有北防匈奴、南戍五岭这两支大军的南北呼应与配合，中原的形势也可能会有改观。但是，由于秦王朝的残暴统治，驻守岭南的部队没有选择支持秦王朝的态度。这支部队的基本成份是江南地区的楼船之士和中原地区被谪发去的戍卒，对秦王朝的暴政极为不满，一些将领也有伺机另图的打算。如这支部队中的重要将领之一赵佗，南平百越后“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①。这说明赵佗早就有在岭南称王的图谋。陈胜起义爆发后，岭南部队的最高统帅南海尉任嚣正在病危之中，他马上把权力移交给赵佗，叫他“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②。于是，秦王朝数量最多的一支战略部队，脱离了秦王朝的控制和指挥，使秦王朝的“支柱”崩溃了三分之一以上。不久，赵佗即率领岭南部队，诛杀了秦王朝所设置的一些官吏，换上自己的亲信，并“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③，走上了割据自保的道路。

---

①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伍被语。

②③ 《史记·南越列传》。

（三）章邯作战指导的失误，导致了秦军精锐部队的被歼。作为秦王朝最嫡系最精锐的部队是北防匈奴的部队，可以说是“支柱”的“支柱”。这支部队在王离率领下被章邯投入了巨鹿决战。“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从陈胜起义、周文入关、巨鹿决战直到刘邦入关亡秦，东方义军中的中流砥柱始终是楚军。王离部队的胜负，关系秦王朝的存亡；楚军的胜负，则关系东方义军的成败。当章邯取得定陶之战的胜利后，本应乘胜追歼项羽和刘邦的部队，并把王离部队投入作战，而章邯却“以为楚地兵不足忧”，把精锐的王离部队投入对赵作战，使项羽、刘邦得以重整旗鼓。以楚军特有的勇敢和项羽的无畏精神，在关东义军的联合之下，终于全歼王离部队。王离部队被歼，秦王朝的支柱基本宣告垮台。

（四）关中部队的瓦解，直接导致了秦王朝的灭亡。王离部队被歼后，章邯所率关中部队尚有二三十万人。这是秦王朝的最后一根支柱。倘使这支部队不瓦解，及时退守函谷关和武关，秦王朝也许还有一些苟延残喘的时日。这支部队的主要成份虽然是郦山刑徒，有强烈的反秦情绪，但其骨干力量皆为关中子弟，因担心关中的家属受诛连，不敢轻易背叛。随着王离部队被歼，这支部队士气一落千丈，已人无战心；加上二世昏暴，赵高专擅，章邯受到猜忌，遂加速了这支部队的瓦解——举军投降。

秦王朝的军队是我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它的瓦解过程表明，国家政治状况的好坏，对军队的影响至关重要。秦军瓦解的主要原因是秦王朝的苛政和秦二世的昏暴所致，其次才是作战指导上的某些失误。

二、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历史意义

由陈胜、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大起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斗争。它的伟大历史意义，首先就在于推翻了秦王朝的反动统治，促进了历史的发展和前进。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中说：“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

首事也。”如前所述，秦王朝虽然存在时间很短，但前后两个不同时期所起的作用却截然相反。前期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完成了统一中原的事业，建立了各项基本制度，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总的说来是相适应的，因而推进了历史的发展。后期则完全不同，无穷的徭役、残酷的刑罚、深重的剥削、昏乱的政治，使广大劳动人民处于饥饿、死亡和酷刑之中，社会生产力受到巨大破坏，社会简单再生产已无法维持，秦王朝的暴政已变成反动的上层建筑，破坏着自己的经济基础，成为历史发展的严重障碍和桎梏。在这种情况下，处于上升发展阶段的我国封建制度，只有推翻秦王朝的反动统治，打碎桎梏，铲除暴政，才能为自己开辟继续前进的道路。这一历史任务，恰恰是由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首倡而完成的。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① 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证明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其次，第一次农民大起义，揭开了我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中农民战争的序幕，给我国历史上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秦王朝以空前的强大和残暴著称于史，吞六国、击匈奴、平百越、筑长城、修驰道、建阿房、焚书坑儒、统一制度等等，几乎没有什么它做不到的事情，也几乎没有任何力量敢于同它公然对抗。但是，作为“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而迁徙之徒”的陈胜，居然敢于“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公然要推翻秦王朝的统治，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横扫了大半个中国，从根本上动摇了秦王朝的统治。这一事实充分表明，真正具有伟大力量的是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一旦反动黑暗的统治者迫使他们走投无路、奋起反抗的时候，他们爆发出来的革命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任何强大的统治者都可以被打倒和推翻。正是在陈胜、吴广等人开创的农民大起义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鼓舞下，我国历史上每当封

① 《毛泽东选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建统治者走到极端黑暗反动之时，总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爆发，广大农民及其他革命者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从而达到推翻和改造封建统治的目的，推动历史的不断前进和发展。

再次，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给了封建统治者一个深刻的教训，迫使他们之中的“开明”人物不得不改换统治手段和策略，采取某些“让步政策”，设法缓和阶级矛盾，研究“长治久安”之术，给人民以休养生息的条件，让历史在和平、稳定中发展前进。继秦而后的西汉王朝，从各个方面和角度总结了秦王朝二世而亡的经验教训，写出许多有价值的著作，如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等等。西汉政府正是由于吸取了这些经验教训，才把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第一次农民大起义所起的作用和结果。

三、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主要经验和教训

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显著特点是来势猛，发展快，起义一经爆发，迅速遍及关东各地。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是秦王朝的反动统治，天下积怨深久，“欲为乱者十室而七”①，只待有人倡导，便可立即云集响应。除了这一客观的革命形势和条件之外，陈胜、吴广在主观指导上的主要成功之处有三：

（一）公开举起反秦的义旗。早在陈胜起义之前，在秦始皇统治时期，就有很多人走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英布原来是一个受过黥刑的刑徒，被判处到郦山修秦始皇陵。郦山刑徒有数十万人，“布皆与其徒长豪杰交通，乃率其曹偶（指一部分刑徒），亡之江中为群盗”②。彭越也率领一些少年，“常渔巨野泽中，为群盗”③。刘邦是泗水亭长，给秦朝往郦山押送刑徒，因“徒多道亡。自度

---

① 《汉书·伍被传》。

② 《史记·英布列传》。

③ 《史记·魏豹彭越列传》。

比至皆亡之"①，这才将被押送的刑徒全部放走，率领一部分愿意留下来的人，"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②。还有与项梁、项羽关系密切的桓楚，也早已"亡在泽中"③。所有这些人的武装反抗活动都比陈胜、吴广早，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敢公开打出反秦的旗帜，只是以"流亡"、"隐匿"、"群盗"的形式从事武装反抗活动，因而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造不成革命的声势和影响。而陈胜、吴广则不同，一开始就明确要"举大计"，"为天下唱"，以公子扶苏、项燕的名义作号召，"从民欲"，"袒右，称大楚"与秦王朝相对抗，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④ 的理论推翻秦王朝取而代之。正因为公开举起了反秦的义旗，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所以才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使星星之火迅速燃成燎原之势。不是以"群盗"的形式，而是以公开的政治革命的形式开展武装斗争，这是第一次农民大起义最成功的创举。

（二）提出"伐无道，诛暴秦"的正确口号。起义爆发后首先消灭的是秦王朝的乡政权，进而消灭秦王朝的县政权、郡政权，直至大规模进军关中，锋芒所指，全在于"伐无道，诛暴秦"的政治目标。除此之外，起义军几乎没有提出其他任何要求。"伐无道，诛暴秦"这一口号的实质，并不是要推翻封建制度，也不是要打倒整个地主阶级，而是要进行一场政治革命，推翻秦王朝的统治，废除秦王朝的暴政。这一口号完全适应当时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抓住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击中了秦王朝的要害，既有利于发动广大劳动人民奋起反抗斗争，也有利于动员其他各阶级各阶层的反秦斗争，又有利于孤立、分化、瓦解秦王朝反动统治集团。在这一口号的指导下，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绝不仅仅限于农民阶级一个阶级的武装斗争，而是以农民阶级为主体，造成一个各阶级、各

①② 《史记·高祖本纪》。

③ 《史记·项羽本纪》。

④ 以上引文均见《史记·陈涉世家》。

阶层、各种反秦势力的空前联合的伟大斗争。正是这种空前联合的伟大斗争，才较快地、最终地埋葬了秦王朝的反动统治。在这场伟大斗争中，除以陈胜、吴广为首的农民阶级做出了最伟大、最主要的贡献之外，其他各阶级、阶层、各种反秦势力也做出了一定的重要贡献。

（三）及时地组织了政权和军队。在革命斗争急风暴雨般发展的形势下，没有统一的领导、统一的组织、统一的指挥是不行的。陈胜破天荒第一次开创了“平民”称王的先例，及时地建立了张楚政权，组建了各支农民起义军队，授予了各种不同官职和称号，从而比较有效地领导了第一次农民大起义，推动了起义的胜利发展。尽管由于经验不足和其他许多主、客观原因，政权和军队的建设都很不完善，并导致了起义的挫折和一度失败，但建立政权和组织军队这种大胆尝试的本身，就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给以后历代农民战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由陈胜、吴广直接领导的起义军，其伟大历史功绩虽然永垂后世，但仅仅 6 个月的时间即被秦王朝的疯狂反扑所镇压，教训也是极为深刻的。最主要的教训有以下几点：

第一，领导者骄傲自满，脱离群众，信用非人，使内部团结遭到破坏。陈胜自称王以后，渐渐地高高在上，既看不起老朋友，又疏远了起义将领，再也不率兵打仗，脱离了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只住在深宫中享清福，发号施令。他诛杀葛婴，任用朱房、胡武等酷吏，“以苛察为忠”①，独断专行，“诸将以其故不亲附”②。特别是对于谋杀吴广的田臧不仅没有给予处罚，反而让田臧当了上将，使义军的团结受到了严重损害。

第二，对于旧贵族分子的分裂活动，缺乏警惕，缺乏斗争经验和办法。从起义一开始，起义队伍内部成员就很复杂。张耳、陈余、周市参加起义后，利用起义军的胜利制造分裂、割据，严重地削弱、破坏了起义军的统一行动。陈胜、吴广对他们的分裂活

---

①② 《史记·陈涉世家》。

动警惕不足，也缺少同他们斗争的经验和办法，因而在大好胜利形势下，却由于起义军内部的分裂给了敌人以各个击破的可乘之机。

第三，未能联合各地起义军结成反秦同盟。在起义军的影响下，各地人民纷纷举旗响应，形势发展迅速，但陈胜没有注意联合这些新起的反秦力量，共同抗击秦军的反扑。在章邯大举东征时，赵、燕、齐、魏均袖手旁观，唯陈胜、吴广起义军孤军奋战，因而遭致严重的挫折和失败。

第四，在战略指导上起义军一经揭竿而起，便迅速出现了胜利发展的大好形势。起义的领导者只顾乘机迅猛地进攻，而不知及时巩固胜利。对敌己双方的实力缺乏冷静的分析，却冒然去进军关中。结果出现吴广顿兵荥阳、宋留滞留南阳、周文孤军深入的局面。这三支主力军缺乏统一指挥，不能协同作战，又没有注意发展强大的后备力量，所以一经挫折，很快便被打败。

尽管这次起义失败了，但陈胜和他领导的起义军将士，在战争危险关头，能以坚决的意志，顽强的精神，同强大的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搏斗，绝大多数人都牺牲在战场上。这种崇高的革命气节，是值得后人称颂的。

第七章　秦代军事思想和军事人物

秦王朝的巨大军事成就，不论在中国历史上或世界历史上都占有非常显著的地位，是古今中外所公认的。但是，由于秦王朝存在的时间很短，加之秦始皇采取焚书坑儒的严酷手段，"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言者，悉诣守、尉杂烧之"①，兵家的著作也同样遭到一次浩劫，以致统一后的秦王朝几乎没有留下片言只字的军事专著。虽然如此，秦代的军事思想仍可从下述三个方面寻其荦荦大端：一是成书于秦王政（秦始皇）八年（前239年）的《吕氏春秋》，该书虽非秦代官方意识形态，但可视为秦代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综合性的主要理论著作；二是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马俑，不仅是秦代军队情况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秦代军事思想的重要反映；三是见诸历史文献的秦始皇、王翦、蒙恬等人的军事言论和实践，尽管言论的内容很少，但实践的业绩宏大，从中可以看出代表秦代官方军事思想的主体，处于支配性的地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第一节　《吕氏春秋》中的军事思想

《吕氏春秋》又称《吕览》，系吕不韦召集其门客所撰。吕不韦在秦国为相13年，面临着全国即将统一的新形势，为统一国家而作理论准备尽了极大的努力。他效法战国末期的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楚国春申君、魏国信陵君等人的作法，大养宾客，从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关东各国招揽各派文人、学者，“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①。让他们“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②，“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③。全书原为161篇，现存160篇，是我国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集体编写的文集。该书的最大特点是对先秦诸子百家的理论观点兼容并包，即《汉书·艺文志》所云：“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贯，此其所长也。”这一特点，是当时我国封建经济、政治的发展强烈要求国家统一的反映，是诸子百家逐渐由相互对立走向相互融合的产物，也是中国历史发展大趋势的必然结果。虽然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在吕、嫪集团被清除之后，《吕氏春秋》一书没有受到秦始皇的青睐，但它所阐述的理论观点，确实反映了当时各界知识分子和社会实践的认识成果，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

正因为《吕氏春秋》是一部综合性的“杂”家代表著作，所以它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在军事思想方面也是如此。全书有20%以上的篇目讲到军事问题，既吸取了先秦诸子的一些军事思想，也吸取了先秦兵家的一些军事思想，并结合秦代面临统一战争的实际，阐发了一些新的见解和观点。其中，《荡兵》、《振乱》、《禁塞》、《怀宠》、《论威》、《简选》、《决胜》、《应同》、《义赏》、《爱士》、《长攻》、《权勋》、《不广》、《贵因》、《先识览》、《用民》、《召类》、《贵卒》等，都是很有价值的军事专篇；《先己》、《顺民》、《上德》、《适威》、《为欲》、《贵信》、《上农》等，虽非军事专篇，但都从很高的战略层次和角度论述到军队建设的问题；还有《慎人》、《遇合》、《悔过》、《察微》、《执一》、《爱类》等，也不是军事专篇，但也都论述了一些有关治军、作战的问题。概括起来看，《吕氏春秋》一书中的军事思想，主要有下述三个方面的显著特点：

---

①③ 《史记·吕不韦列传》。

②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一、主张用“义兵”推进和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

由于时代条件的不同，在今存我国古代第一部伟大的军事杰作《孙子兵法》中，对战争的性质、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以及用战争手段实现国家统一等问题，皆默无一辞。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在《吴子》、《孙膑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六韬》及大量的诸子著作中，才逐渐把“义战”和用战争手段统一天下的问题提了出来。在这方面《吕氏春秋》可堪称集大成者，并集中体现在《荡兵》、《振乱》、《禁塞》、《怀宠》等专篇专论中。

《荡兵》篇，作者对战争的起源、性质和作用做了一般的阐述，着重说明“义兵”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作者把战争的起源归因于人的本性即天性。认为：“兵之所自来者上矣，与始有民俱。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于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武者不能革，而工者不能移。”并认为战争自古以来就“不可禁，不可止”，“未尝少选不用”，早在“蚩尤作兵”之前“民固剥林木以战矣”。战争的结果是“胜者为长。长则犹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长。长之立也，出于争”。这就是战争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它可以形成各级统治者——君长和天子，造成一定的统治秩序并维护和巩固这一秩序，从而防止天下大乱。基于这一认识，作者极力主张“古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义兵”可以“诛暴君而振苦民”，像医生治病一样，是造福于天下的“良药”。这就是作者对战争的起源、性质和作用的基本观点。其中，关于战争起源的认识虽然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但它揭示了私有财产和阶级产生之后，战争就频繁出现于人类社会的这一客观事实，并主张用“义兵”来“诛暴君”、“振苦民”，建立和维护统一的社会秩序，这一点是有积极和进步的意义的。作者关于“义兵”的观点，不仅渊源于儒家的思想学

说，也是对先秦古兵书《吴子》、《司马法》、《孙膑兵法》的继承和发展。

《振乱》篇，则完全针对当时秦国面临的统一战争的现实性而发，极力歌颂了统一战争的正义性。作者指出："当今之世浊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天子既绝，贤者废伏，世主恣行，与民相离，黔首无所告愬。"这是对当时关东六国政治腐败、人民生活极端痛苦的情况的揭露和分析。在这种背景下，作者认为秦国的"贤主秀士"应该大兴"义兵"，"攻无道而罚不义"，使"天下之民且死者也而生，且辱者也而荣，且苦者也而逸"，使天下"长有道而息无道"，"则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否则，不敢兴"义兵"而推进统一事业，采取"非攻伐而取救守"的态度，那就是是非颠倒，对天下之民"利之而反害之也，安之而反危之也"，是助长"天下之长患，致黔首之大害"，"是息有道而伐有义也，是穷汤武之事而遂桀纣也"。作者的这些观点，显然是为秦国进行统一战争服务的，但在客观上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要求，是积极、正确而进步的。

《禁塞》篇，集中批判了墨家"非攻"、"救守"的理论。作者指出，在当时统一大势已经成熟的战国末期，主张"非攻"和"救守"的实质，就是"守无道而救不义"，从而反对和阻止正义的统一战争。他们一方面苦心焦虑，"日夜思之"，"单唇干肺、费神伤魂"地到处游说，"上称三皇五帝之业以愉其意，下称五伯名士之谋以信其事"，从而蛊惑人心；另一方面又亲自付诸实践，以武力作后盾，用不义的战争反对正义的战争。作者举出夏桀、殷纣、夫差、智伯、晋厉公、陈灵公、宋康公等七个史例，说明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对战争的正确态度，只能是赞成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如果不区分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单纯强调"非攻"和"救守"，其结果"则祸莫大焉，为天下之民害莫深焉"，"是长天下之害，而止天下之利"，是"大乱天下者也"。作者的这一精辟见解，对先秦兵家在战争观方面的思想，

是一个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怀宠》篇，是在上述三篇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义兵”的原则、条件和标准。作者极力反对战争中的“暴虐奸诈”行为，认为它与“义兵”势不两立。“义兵”必须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即“不虐五谷，不掘坟墓，不伐树木，不烧积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不虐待俘虏，只对极少数的抵抗者予以严惩。“义兵”必须师出有名，昭示敌国统治者“无道据傲，荒怠贪戾，虐众恣睢……上不顺天，下不惠民，征敛无期，求索无厌，罪杀不辜，庆赏不当”等罪恶，并宣布自己“救民之死”、“除民之仇”、“顺天之道”、“以诛不当为君者”为宗旨和目的。“义兵”还必须实行吊民伐罪的各种措施和仁政，即“克其国不及其民，独诛所诛而已矣。举其秀士而封侯之，选其贤良而尊显之，求其孤寡而振恤之，见其长老而敬礼之，皆益其禄，加其级。论其罪人而救出之。分府库之金，散仓廪之粟，以镇抚其众，不私其财”，等等。作者认为，如果做到了上述这些，那就可以收到“义兵至，则邻国之民归之若流水，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远，得民滋众，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的效果。这显然是极端理想化的“义兵”，不仅当时秦国的军队和秦王朝的统一战争做不到这些，也是其他一切剥削阶级的军队及其所进行的战争所做不到的。但是，它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都是不可忽视和否定的，不论对军队建设或战争指导都有重大的作用和影响，历史上的许多政治家和军事家正是利用这一理论而赢得了自己的优势和胜利。因此，《吕氏春秋》一书中关于“义兵”的理论，在我国军事思想发展史上有其一定的地位和价值，对后世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强调富国强兵与德教、义化相结合的建军思想

秦自商鞅变法之后，长期以来形成了传统的富国强兵思想，也

就是“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①。这一传统思想对于秦的强大和统一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这一传统思想是以法家的法治学说为其理论根据，过分强调酷法严刑和重赏严罚，加之在战争中提倡“首功”，公然执行屠杀政策②，因而使关东诸国对秦国产生了很坏的印象和观感，被关东六国普遍视为“虎狼之秦”。有鉴于此，《吕氏春秋》一书，既继承了秦国的传统建军思想，同时又吸取儒家的理论，十分强调和重视政治思想建设，把它同国家的兴衰、安危、强弱联系起来。

《上农》篇说：“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议，少私议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作者在这里分别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上农”的好处和“事末”的害处，都是从国家安危、战守出发的，既把“上农”作为国家和军队的经济基础，又把“上农”作为人民和军队的思想教育基础，这在当时自然经济的历史条件下，是有深刻道理的。本篇把经济建设中的“上农”作为整个国防战略的经济基础，显然是对富国强兵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简选》篇则着重论述了军队建设即强兵的问题，集中阐明了一个“精”字，即将领要精，部队要精，武器要精，指挥要精，从而建设一支战斗力强大的精兵。作者指出：“世有言曰，驱市人而战之，可以胜人之厚禄教卒；老弱罢民，可以胜人之精士练材；离

---

① 《过秦论》。

② 据《秦集史·首功表》的统计，自秦献公二十一年至秦始皇十三年，秦军在同关东六国作战中共斩首一百四十五万五千余人；秦始皇十三年以后的大规模统一战争中的斩首尚不计在内。由此可见一斑。

散係系（指部队散乱），可以胜人之行陈整齐；锄櫌白梃，可以胜人之长铫利兵。'此不通乎兵者之论。今有利剑于此，以刺则不中，以击则不及，与恶剑无择。为是，斗因用恶剑则不可。简选精良，兵械铦利，发之则不时，纵之则不当，与恶卒无择。为是，战因用恶卒则不可。”这就是说，不能因为偶而用乌合之众和锄头木棍打了胜仗，由此就否定精兵良将和坚甲利兵的作用；更不能因为精兵良将和坚甲利兵由指挥错误而打了败仗，就主张用乌合之众和锄头木棍去作战。接着，作者用商汤、周武王、齐桓公、晋文公、吴王阖闾等以精兵良将、坚甲利兵而取胜于天下的史例，得出结论说：“凡兵势险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选练角材，欲其精也；统率士民，欲其教也。此四者，义兵之助也。”也就是说，精锐的军队，先进的武器，严格的训练，正确的指挥，把这四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这就是《吕氏春秋》一书中最主要的强兵思想。

在强调经济建设、军事建设即富国强兵的同时，《吕氏春秋》的作者还十分重视和强调政治思想建设，并把它提到了关系国家安危的战略高度。《上德》篇说：“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此神农、黄帝之政也。以德以义，则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华之高、会稽之险不能障矣，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德教、义化的作用为什么这样大呢？《顺民》篇说：“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并以商汤为民祈雨、周文王向殷纣王辞千里之地为民请除炮烙之刑、越王句践与人民同甘共苦（“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视靡曼，耳不听钟鼓”、“内亲群臣，下养百姓”、“身亲耕而食，妻亲织而衣”等等）的史例，说明得民心的关键在于“取民之所说（悦）”，使人民高兴，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从而取得事业的成功和战争的胜利。《适威》篇说：“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灾，思致其福。故民之于上也，若玺之于涂也，抑之以方则方，抑之以圆则圆。若

五种（五谷之种）之于地也，必应其类，而蕃息于百倍。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不广》篇指出：“用武则以力胜，用文则以德胜。文武尽胜，何敌之不服！”这就是《吕氏春秋》的国防战略观，既强调富国强兵，又强调德教义化，做到“文武尽胜”，以服务于统一战争，推进统一事业。

《论威》篇论述了义、令、胜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义也者，万事之纪也，君臣上下亲疏之所由起也，治乱安危过胜之所在也。过胜之勿求于他，必反于己。人情欲生而恶死，欲荣而恶辱。死生荣辱之道一，则三军之士可使一心矣。凡军欲其众也，心欲其一也，三军一心，则令可使无敌矣。令能无敌者，其兵之于天下也亦无敌矣。古之至兵，民之重令也，重乎天下，贵乎天子。其藏于民心捷于肌肤也，深痛执固，不可摇荡，物莫之能动。若此，则敌胡足胜矣。故曰，其令强者其敌弱，其令信者其敌诎。先胜之于此，则必胜之于彼矣。”这就是说，只有“义”才能统一全军的思想，使其有一致的生死荣辱观，从而把军令看得重于天下，贵于天子，打起仗来就所向无敌。也就是说，由“义”之威而产生“令”之威；由“令”之威而产生“兵”之威；由“兵”之威而产生胜利。

《爱士》篇论述了仁和勇的关系。作者认为，两军交锋是你死我活的问题，如果“敌得生于我，则我得死于敌；敌得死于我，则我得生于敌”。只有“行德爱人”，“民亲其上”，打起仗来人民和士兵才能“皆乐为其君死”，从而产生最大的勇敢，使“敌得死于我”，而我“得生于敌”。作者还举了秦穆公在韩原之战中转败为胜、转危为安的战例，说明平时对人民和士兵仁爱，战时才能够激发出自觉地勇敢战斗的精神。

《义赏》篇论述了信和诈的关系。作者肯定了在战争中要使用诡诈之术，即所谓“繁战之君不足于诈”，“临难用诈，足以却敌”。但同时又必须在人民和士兵中加强培养“忠信亲爱之道”，使其“安之若性”，养成习惯，从而有利于国家和军队的巩固。作者指出，施用赏罚是以上使下的一种重要手段，“赏重则民移之”，对

人民和士兵养成什么样的思想、性格和作风具有重要影响和作用。如果以有无“忠信亲爱之道”为赏罚的标准，就利于培养人民和士兵的忠信性格。如果以战争中的诡诈之术为标准，久而久之，就会使人民和士兵都养成诡诈之风。诡诈之风一旦形成，即使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和成功，也会遭到毁坏和失败，即所谓“众诈盈国，不可以为安”。因此，作者把忠信称为“百世之利”，把诡诈称为“一时之务”，要求施用赏罚必须以有无“忠信亲爱之道”为标准，在部队建设中大力灌输“忠信亲爱之道”的精神。

此外，《用民》、《适威》等篇还论述了爱和威的关系。作者认为，“威不可无有，而不足专恃”，威的基础是“爱利之心”，“爱利之心谕，威乃可行。威太甚，则爱利之心息。爱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也就是说，对人民和士兵不能只讲酷法严刑，滥施淫威，而首先必须讲“爱利之心”；否则，用威过度，结果“令苛则不听，禁多则不行”，甚至还会引起“上下之相仇”的恶果。因此，作者认为用民必须以“爱利之心”为基础，用威必须适当。

总之，《吕氏春秋》一书在治军问题上，其主导思想是以仁、义、忠、信、爱等政治思想教育为主，这是一个明显的倾向。这一倾向固然渊源于儒家的理论和某些古兵书的思想，但作者都是针对现实而发的，是为了克服当时秦军只单纯讲酷法、严刑、厚赏的片面性，因而上述的议论和思想在当时都是有现实意义的，只是未被秦始皇和秦军所采纳而已。

三、强调义、智、勇相结合的作战指导思想

在作战指导方面，《吕氏春秋》继承了先秦兵家“知彼知己”的论断，如《察微》篇说：“凡战，必悉熟偏备，知彼知己，然后可也。”在这个基础上，《吕氏春秋》主要强调的是把义、智、勇结合起来。《决胜》篇说：“夫兵有本干，必义、必智、必勇。义则敌孤独，敌孤独则上下虚，民解落；孤独则父兄怨，贤者诽，乱

内作。智则知时化，知时化则知虚实盛衰之变，知先后远近纵舍之数。勇则能决断，能决断则能若雷电飘风暴雨，能若崩山破溃，别辨（即异变）霣（陨）坠，若鸷鸟之击也，搏攫则殪，中术则碎。”由此可知，在作战指导中《吕氏春秋》重视义、智、勇三个环节，把它视为克敌制胜的“本干”。

义，主要讲的是师出有名，加兵于昏乱之敌。对于己方来说，所进行的必须是正义战争；而对于敌方来说，所进行的则是不义战争，其内部混乱瓦解，孤立无援，内乱不止。这样，在战争中就能确保自己的优势和胜利。《召类》篇也详细论述了这个问题，指出：“凡兵之用也，用于利，用于义。攻乱则服，服则攻者利。攻乱则义，义则攻者荣。”又援引历史经验说：“三王以上，固皆用兵也。乱则用，治则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乱而弗讨，害民莫长焉。”这就是在打击对象上攻乱不攻治的原则，也就是以义攻不义的原则。

智，主要讲的是发挥主观能动性问题。所谓“知时化”、“知虚实盛衰之变”、“知先后远近纵舍之数”以及《权勋》篇所讲“利不可两”，要“去小取大”等等，都是讲的要按客观规律去指导作战，这是用智的依据和原则。在这方面《吕氏春秋》最有价值的思想是提出并从多方面论证了“贵因”说。“贵因”的实质就是重视因敌制胜。在《决胜》篇中作者指出，两军相争的胜负，归根结底取决于双方各自的内在条件，即“不可胜在己，可胜在彼”。因此，“凡兵之胜，敌之失也。胜失之兵，必隐必微（意谓隐蔽行动而微妙莫测），必积必抟（意谓集中兵力攻敌要害之一点），隐则胜阐矣，微则胜显矣，积则胜散矣，抟则胜离矣”，也就是说，在战争中胜利的取得，都是利用敌人失误的结果，一旦发现敌人的失误，就要以集中的兵力和隐蔽的行动去击败分散而暴露弱点之敌。这就是因敌而制胜。作者由此得出结论：“凡兵，贵其因也。因也者，因敌之险以为己固，因敌之谋以为己事。能审因而加，胜则不可穷矣。胜不可穷谓之神，神则能不可胜也。”在《长攻》篇和《贵因》篇，作者还进一步总结了大量历史经验，

认为古往今来的“治乱存亡，安危强弱，必有其遇，然后可成”，大禹治水成功是“因水之力”，尧舜禅让是“因人之心”，汤、武以千乘战胜夏、商是“因民之欲”，故“三代所宝莫如因。因则无敌”。在这里，作者已经把“因”理解成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正确结合，这是对《孙子·虚实》篇关于“兵因敌而制胜”这一科学论断的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勇，主要讲的是先发制人的问题。《贵卒》篇说：“力贵突，智贵卒”，在敌己双方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快速与先手就会取得优势和胜利。《论威》篇说：“以木击木则拌（折），以水投水则散，以冰投冰则沉，以涂（泥）投涂则陷。”这就是快速与先手的好处。因此，“凡兵欲急疾捷先”，也就是先发制人。要做到“急疾捷先”，就必须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虽有江河之险则凌之，虽有大山之塞则陷之，并气专精，心无有虑，目无有视，耳无有闻，一诸武而已矣”，这就是勇和先发制人的关系。作者把勇敢精神的发扬，看作是善于鼓舞士气、正确组织指挥和平时良好政治基础的结果。在《决胜》篇中作者指出：“民无常勇，亦无常怯。有气则实，实则勇。无气则虚，虚则怯。怯勇虚实，其由甚微，不可不知。勇则战，怯则北。战而胜者，战其勇者也。战而北者，战其怯者也。”因此，在“怯勇无常”变化反复的情况下，必须善于掌握和鼓舞士气，必须有正确的组织指挥造成一种勇敢战斗的必然之势，还必须有良好的政治条件作基础，这样，在关键时刻人民和士兵才能发挥出最强大的战斗力来。否则，“军虽大，卒虽多，无益于胜”；搞得不好的话，“军大卒多”甚至“为祸（指失败）也亦大”。

以上就是《吕氏春秋》一书中的一些主要军事思想。它在综合诸子百家和继承先秦兵家思想的基础上，在战争观、国防建设、部队建设和作战指挥等方面，结合政治思想的因素进行论述。它的许多观点和理论虽然没有被秦始皇所采纳，但对后来的战争实践，特别是一些统一战争的实践，都发生过一定的影响和作用，是值得我们分析、总结和研究的。

第二节　秦始皇陵兵马俑及其所反映的秦代军事思想

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于1974年，位于陕西临潼秦始皇陵东侧1.5公里处，是秦始皇陵园总体构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共有4个兵马俑坑，其中第四号俑坑没有建成，总面积2.4万余平方米。根据长期试掘的情况判断，在一、二、三号俑坑内计有战车100余乘，陶马600余件，各类武士俑7000余件，以及大量的实用兵器，仅已出土的青铜兵器即达万余件之多。不仅兵器和战车同当年的实物一样，而且陶制武士俑和马俑的高低、大小、装束、形象、特征等等，也都同当年的真人、真马一样，再现了两千多年前秦代军队的雄武英姿，为我们研究秦代军事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并反映了秦代的某些军事思想。

一、兵马俑的布局与内涵

全部兵马俑坑都是地下坑道式的土木结构建筑。其中一、二号俑坑因经火焚早已塌陷，三号俑坑因棚木腐朽而自然塌陷，四号俑坑则因秦末农民起义的爆发而未竣工。史载项羽入关灭秦后曾“燔其宫室营宇”，秦始皇陵园的地面建筑均被焚毁，至今瓦砾犹存，因而各号兵马俑坑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一号俑坑呈长方形，坐西面东。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面积1.426万平方米。东西两端各有一条南北长60米、宽3.45米的长廊，南北两侧各有一条长约180米、宽约2米的边廊，中间有9条长180米、宽3.5米的过洞。共有兵马俑6000个左右，分为前锋、后卫、两翼和主体。前锋由面向东方的三列横队组成，除3名铠甲俑外都是轻装弩兵俑，人人手执弓弩，背负鞴矢。后卫亦由三列横队组成，有两列面向东方，最后一列面向西方，皆为轻

装弩兵俑。两翼各由一列轻装弩兵俑组成，分别面南和面北。主体由38路纵队组成,有30多乘驷马战车同数千名手执戈、矛、戟、铍的步兵甲俑、袍俑相间排列。

二号俑坑位于一号俑坑的东端北侧，两坑相距20米，呈曲尺形,坐西面东。东西最长处124米，南北最宽处98米，面积约6000平方米，有兵马俑近1000件。分为4个单元：第一单元在二号俑坑的东北角，近似方形（26.6×38米），四面各有1条环廊，排列着174个立射式弩兵俑。中间有4条东西向过洞，排列着8路蹲跪式弩兵俑，每路20个，共160个。此单元西北角有一双手拄剑的将军俑和一中级军吏俑。第二单元在二号俑坑的右半部，近似方形（52×48米），中间有8条东西向过洞，排列着8行战车，每行8乘，共64乘。每乘车上有甲士3人：一为御手，一为车左，一为车右，车后没有步兵跟随。第三单元在二号俑坑的中部，呈长方形（68×16米），中间有3条东西向过洞，由战车19乘、步兵264人、骑兵8人分成三路纵队排列。19乘车中有将军乘坐的指挥车1乘，位于该单元的左后角。其余战车每车有甲士3人，即1名御手，1名车左，1名车右。每乘战车后一般跟随步兵8人，有的指挥车跟随步兵28人或32人。最后以8骑为殿军。第四单元在二号俑坑的左侧，呈长方形（50×20米），中间有3条东西向过洞，由战车6乘、骑兵108骑排成三路纵队。每路纵队有战车2乘、骑兵36骑，编为11组；第一、三组各为1乘战车，其余9组为骑兵，每组4骑。

三号俑坑位于一号俑坑的西端北侧，两坑相距25米，坐西面东，呈“凹”字形，东西长17.6米，南北宽21.4米，加上各突出部分，面积约520平方米。坑内有车马房、长廊和南、北厢房以及悬挂帷幕的设施。车马房中停放驷乘车1乘，车上有4人，1名御手，1名军吏，2名甲士。长廊和南、北厢房内有手执仪卫武器铜殳的武士俑64件，作夹道形排列，显然是军队指挥部的所在。

四号俑坑位于一号俑坑的中部北侧，呈长方形，面积为4608平方米（96×48米）。因未竣工，无兵马俑排列。（各坑情况主要

见袁仲一著《秦始皇陵兵马俑》及《文物》所载有关报告。)

上述一、二、三号俑坑的主要出土文物为战车、骑兵俑、步兵俑和大量青铜兵器。战车均系木质，单辕，车前驾 4 马。供将军乘坐的指挥车，装饰比较华丽，通体髹黑漆，上绘精致的几何形图案，设有华盖和钟鼓，车上 3 人：将军居左，御手居中，车右居右。供将军必要时换乘的副车（佐车），车上只有御手、车右 2 人。作为部队导行、先驱、挑战用的驷乘车，车上有 4 人，即 1 名军吏、1 名御手、2 名甲士。一般战车无华盖、钟鼓，车舆后边两角除有木柱外又各立 1 根铜柱以资加固。车上有甲士 3 人，备有戈、矛、弓箭等兵器。骑兵俑着短甲、短靴和紧袖胡服，头戴圆形小帽，手持弓弩。马身长约 2 米，通首高 1.72 米，至髻甲高 1.33 米，与睡虎地秦简所载相同，除马镫外其他装备都已齐全。步兵俑的种类甚多，最高级的是将军俑，身高 1.95 米，戴鹖冠，穿长襦，着鱼鳞甲，双手拄剑。其次是中级军吏俑，戴双版长冠，有的穿胡服，着齐边甲，有的穿汉服，着胸甲，手中握剑。再次是下级军吏俑和士兵俑，分轻装与铠甲两种。军吏有冠，士兵无冠。轻装军吏既持剑又持长兵，铠甲军吏有的持长兵，有的持弓弩。轻装士兵持弓弩，铠甲士兵持长兵或弓弩。上自将军，下至士兵，皆不持盾戴盔，以显示其英勇无畏的气概。出土兵器分为三类，远射的有弓、弩；长柄的有戈、矛、戟、钺、殳、铍；短柄的有剑和弯刀。车兵装备的是弓、弩、戈、矛、钺；骑兵装备的是弓箭；步兵则各种武器皆备，主要是弓弩和戈矛。

从上述出土兵器的刻辞纪年看，最早的是秦始皇“三年”，最晚是秦始皇“十九年”。《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载：“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三十七年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二世二年载章邯语曰：“盗已至，众强，今发近县不及矣。郦山徒多，请赦之，授

兵以击之。”这三段记载表明，秦始皇陵墓的修建前后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其规模空前宏大，其设计空前复杂，而作为陵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兵马俑坑，其工程进展当然要排在陵墓主体工程之后，所以直至秦始皇死后仍未竣工。

二、兵马俑的主题和秦军的基本构成

秦始皇为什么要以宠大的兵马俑群作为自己的陪葬，兵马俑的主题是什么，学术界的看法颇不一致。有秦始皇送葬卫队说、秦始皇陵墓卫队说、秦始皇东巡卫队说、秦代首都咸阳卫队说以及秦代军队缩影说，等等。其中以最后一说较为合理。

其实，秦始皇陵园之所以修建三十多年之久，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事死如生”的指导思想，陵园设计的要旨皆在于此。秦陵兵马俑和整个秦始皇陵园一样，每项设施内容都体现着“事死如生”的原则，都是把人间世界搬入地下世界的缩影。例如，秦始皇陵园有内外两道城垣，这是京都咸阳宫城和外廓城的象征；在高大的陵墓之下有深邃的地宫，这是秦始皇所居皇宫的象征；陵园内城里有寝殿、便殿、寺园吏舍，这是对所谓“前朝后寝”制度的模拟；陵园的地面、地下有无数宫观、珍宝以及厩苑、骏马、苑囿和供皇帝出行用的乘舆，这是对秦始皇穷奢极欲、豪华淫逸生活的模拟；地宫里有百官次位，这是秦王朝政治统治机构的标志；还有用水银做成的“百川江河大海”、“上具天文，下具地理”，这是秦始皇生前统治全部人间世界、死后要进而主宰全部阴间世界的标志。同样的道理，军队是国家政权的支柱，秦始皇生前的一切成就和历史伟业都同他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密切相关，因而也必须把这支军队带到地下去。他在晚年曾极力追求长生不死，企图永做人间的“千古一帝”，但又觉得很没把握，人似乎非死不可，所以才不得不幻想做地下的“千古一帝”。为此，他决不满足于仅仅把送葬卫队、守陵卫队、咸阳卫队、东巡卫队带入地下，而要把秦王朝的武装力量带入地下，这样才能维护他在阴间

世界里至高无上的权威。这就是秦陵兵马俑的真正主题。

正是在这一主题思想的支配之下，秦陵兵马俑以高度逼真的艺术手法再现了秦军的形象，不仅真实地反映了秦军的组织编制和武器装备，补充了文献记载的许多不足，填补了秦代军事史的某些空白，而且，通过各号秦俑坑的不同内容和布局上的不同特点，主要反映了秦代军队的某些构成和概貌。

一号俑坑的突出特点是规模宏大，气势磅礴。不论占地面积或兵马俑的数量，都远远超过其他各号俑坑的总和。其内容以步兵为主，车、步结合，在布局上既有前锋、后卫和两翼，又有 38 路纵队为主体，给人以雄师百万、气吞山河、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坚如磐石、严不可犯的强烈印象。这是秦军“带甲百万”的象征和标志。所谓“带甲”，自战国时代起即指步兵而言，步兵是秦军的主力和中坚，因而一号俑坑的规模最为宏大。但当时步兵作战往往离不开战车，战车是步兵的重要屏蔽，所以一号俑坑的布局特点是车、步结合，以步为主。

二号俑坑的突出特点是以战车为主，车、步、骑、弩紧密结合，兵种齐全，装备精良。其规模虽然不大，但战车的数量却相当于一号俑坑的三倍。而布局又十分复杂，既有一个相对独立的车兵队，又有一个相对独立的骑兵队和一个相对独立的弩兵队，还有一个相对独立的车、步、骑混合编队。给人以战车辚辚，战马萧萧，强弩蹶张，铁戈长矛，坚甲利兵，所向披靡的深刻印象。这是秦军“车千乘”的象征和标志。车兵车战盛行于春秋，到战国时已退居次要地位，所以二号俑坑的规模要远比一号俑坑小得多；且因军队构组情况变化，单纯的车战形式早已被历史所淘汰，因而二号俑坑以车、步、骑、弩相结合的形式，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布局特点。

三号俑坑的突出特点是在庄严肃穆的统帅部中没有统帅，只有兵卫、中级军吏和各种指挥设施。而没有统帅人物的出现，这个特点不是偶然的，是秦代军制中掌兵之制的一个重要体现和标志。秦代的百万大军平时并不命将设帅，而是分别由各地、各部

门、各部队的郡尉、关都尉和校尉以下军官统领，到了战时才由皇帝临时任命的将军作统帅，负责战场上的统一指挥；战争一结束即将还于朝，兵归其郡，将不得专其兵。整个兵马俑所代表的是全国武装力量，是平时的状态而非战时的状态，所以统帅部中没有统帅是理所当然的。

四号俑坑因未竣工，要准确判断其性质和特点存在一定困难。有人认为它是拟建的中军，即一号俑坑为右军，二号俑坑为左军，四号俑坑为中军，这是不能成立的。把军队的编成和作战固定为左、中、右或上、中、下三军，是春秋车战时代较为普遍的作法，到战国之后则发生了变化，以步兵为主的野战取代了以车兵为主的车战，迂回、包围、突击、奇袭、埋伏等战法层出不穷，左、中、右或上、中、下的固定模式已有变化。且秦俑各号坑的规模、兵力、兵种、布局等都相差悬殊，指挥部不在四号坑内，而独立在三号坑中，四号坑不在一、二号坑之间，而在二号坑之后，所以四号坑不是中军，同一、二号坑也构不成左、中、右的关系与配置。还有人把四号坑理解为后勤部队“左追蓐”，这也是不能成立的。《左传》宣公十二年邲之战中的“左追蓐”并不是指后勤部队，而是指行军中战车两侧徒兵的不同分工。邲之战中楚军确实有后勤部队（或曰分队），是在战斗结束后到达战场的：“丙辰，楚重至于邲，遂次于衡雍。”可见后勤部队始终在楚国左、中、右三军和楚王所率二广部队的后面，根本不和作战部队及统帅部配置在一起，秦俑四号坑在一号之左、二号之后、三号之前，不可能是后勤部队。这个位置恰恰是一支强大的战略机动部队的位置。其形制比较简单，没有复杂的结构，与二号坑中骑兵队的形制颇为相似。其规模为96×48米，等于二号俑坑中骑兵队面积（约50×20米）的4倍多。由此推测，四号俑坑很可能是一支500余骑俑的骑兵部队。秦军是一支“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① 的武装力量。一号俑坑代表的是“带甲百万”（其形式是车、步结合，

---

① 《史记·张仪列传》。

以步为主），二号俑坑代表的是“车千乘”（其形式是车、步、骑、弩结合，以车为主），那么四号俑坑代表“骑万匹”（其形式是车、骑结合，以骑为主），就较合理。

《史记·秦本纪》载，昭王四十八年十月下令：“秦军分为三军”。这三军叫什么名称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不是左、中、右或上、中、下，而是和“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密切相关。秦俑一、二、四号坑的布局和编组恰恰是“秦军分为三军”的反映和标志，即步兵要同一定的车兵相结合，车兵要同一定的步兵、骑兵、弩兵相结合，骑兵要同一定的车兵相结合。这种划分，就是秦代军队的基本构成和概貌，是完全符合当时的作战方式的，也是和秦陵兵马俑的主题完全一致的。

三、兵马俑所反映的秦代军事思想

秦陵兵马俑各号俑坑的布局特点各不相同，这不仅反映了秦代军队构成的不同，而且反映了当时历史条件下一些作战原则和军事思想。其中比较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一）车、步、骑相结合，充分发挥各兵种的优长。以二号俑坑为例，其布局配置分别由相对独立而又互相联系的弩兵队、骑兵队、车兵队和车、步、骑混合编队共同组成，是多兵种紧密结合的一个典型。弩兵利于远战，步兵利于近战，骑兵利于机动，车兵利于掩护和攻坚，从而充分发挥每一个兵种的特长，并构成多兵种的总体威力。二号俑坑的主体是车兵，车兵与步、骑、弩的结合，既体现了秦代的主要战术原则之一，又体现了车兵在多兵种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车兵为主，同徒兵相结合，是春秋时代最主要的战术原则之一；战国以后则不同，单纯的车战已不存在，车、步、骑相结合成为最主要的战术原则之一，这是军事史上一个很大的进步。二号俑坑的布局恰恰是这一进步的战术思想形象化的体现。在战国以后，车兵虽然在总体上居于次要地位，但它与步、骑相结合，既可以增强进攻的冲击力，又可以增强防御

的守卫力，因而仍是军队构成中的一个重要兵种。《孙膑兵法·八阵》中说："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就是指在一定条件下，车兵仍可以成为局部战场上的主要兵种。二号俑坑的布局完全证实了《孙膑兵法》的这一战术理论，即在兵马俑总体布局中二号俑坑居于次要地位，但二号俑坑本身的布局却是以车兵为主，也就是说，在车、步、骑相结合的原则下，针对不同的作战对象和作战环境，车兵可以成为一定条件下的主要兵种，发挥主要作用。

（二）远、长、短相结合，充分发挥各种不同武器装备的综合作用。不论一号俑坑或二号俑坑，都是把弩兵配置在前锋，以利在较远的距离上能够大量地杀伤敌人。位于主体部分的车兵和步兵，都以手持矛、戈等长柄兵器为主，以利于近战格斗；同时步兵还配以相当数量的短剑，以利护身和肉搏。处于机动位置上的骑兵部队，则都以弓箭为主要攻击手段。骑兵行动神速，弓箭可杀伤人于百步之外，从而把快和远结合在一起，就能更加有效地给敌军以突然猛烈、出其不意的打击。从总体上看，把远、长、短三种武器互相配合起来，其中突出地强调在远距离上消灭敌人，这是秦陵兵马俑在武器配置上的一个很鲜明的特点。这一特点，同武器的发展和进步，特别是同弩的发明和在部队中的普遍装备，以及同弩兵和骑兵等新兵种的大量出现都是密切相关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又一个新的、重要的战术原则，是技术决定战术、战术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更新的体现。

（三）攻与守相结合，适应于各种情况下作战的需要。进攻和防御是战争中最基本的两种作战形式，任何一支部队都不能只有进攻而无防御，也不能只有防御而无进攻。尤其在战术上更是如此，在战略上攻与守也同样是依条件的变化而相互转化的。根据不同的情况，攻与守有主有从，相互结合，二者兼备，做到能攻能守，寓攻于守，这是我国古代兵书中的精华思想之一。这一思想在秦陵兵马俑的布局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总体布局上看，以攻为主，攻守结合是十分显然的。各号俑坑都一律坐西向东，马

欲奔腾，车欲飞驰，人欲怒斗，时刻准备，待命而发，这恰恰反映了秦军在以往作战中不断东下的进攻方向，是以攻为主的重要标志。整体上以一号俑坑为主，二号俑坑为辅，四号俑坑为机动，则显然是攻守兼备的布局。从每一俑坑的具体布局上看，也都是以攻为主、攻守结合的。一号俑坑的38路纵队和前锋都是面向东方以攻为主的，而两翼和后卫中各有一列分别面南、面北、面西，则是攻中有守、攻守兼备的布局。二号俑坑的车兵队、骑兵队以及车、步、骑混合队和弩兵队中的主体部分，都是面向东方以攻为主的，而弩兵队中的四周弩兵，至少有三面是用来防御的，从而充分体现了二号俑坑以攻为主、攻守兼备的布局特点。至于二号俑坑中每一个相对独立的小队，也都适合于进攻与防御两种作战形式的需要。例如，相对独立的弩兵队，在进攻中有利于远距离杀伤敌军，给大部队开辟通路；在防御中有利于远距离击退敌军，稳定自己的阵角。相对独立的车兵队，进攻时是有力的攻坚力量，防御时则有利于遏制敌军的冲击，巩固自己的阵势。相对独立的骑兵队，既可在进攻时用于迂回、包围、断后、追击、奇袭，又可在防御时相机出击，给进攻之敌以突然猛烈的打击。相对独立的车、步、骑混合队，更为机动灵活，不论进攻或防御，都可随时增援到需要的方向。由此可知，不论各号兵马俑坑的总体布局或每一俑坑的具体布局以至每个队的布局，都充分体现了攻与守相互结合的战术思想和原则。

（四）奇与正相结合，体现了“以正合，以奇胜”① 的思想。奇正结合，是我国古代传统军事理论中的精华思想之一，其精神实质就是灵活机动，因敌制胜，反对墨守陈规和恪守死板的军事教条。秦陵兵马俑不论从宏观上看或微观上看，都体现着奇正结合、出奇制胜的思想。从宏观上看，一号坑俑可以视为一支强大的正兵，有利于同敌军正面交锋；二号坑俑是一支以车兵为主的综合性机动部队，可以配合正兵从侧翼打击敌军；四号坑俑如果真是

① 《孙子·势篇》。

一支大规模的骑兵部队，则可以出其不意地配合作战，打击敌军。这样，一、二、四号俑坑在宏观上体现了奇正结合，“以正合，以奇胜”的思想，而且不是简单地一正一奇，而是一正二奇，像《孙膑兵法·八阵》中所讲的那样：“以一侵敌，以二收。”从微观上看，二号俑坑的布局更富有奇正结合的特色，即弩兵队和车、步、骑混合队可以视为正兵，而骑兵队和车兵队则可以视为奇兵，从而构成一个二正二奇的布局。《孙子兵法·势篇》中说：“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秦陵兵马俑正是这一思想的生动体现。

此外，秦陵兵马俑在装备上还有轻与重相结合的特点。这个特点主要体现在步兵和弩兵之中。轻装步兵（无甲袍俑）多配置于前锋、两翼和后卫，以利灵活机动地应敌作战；重装步兵（铠甲武士俑）多配置于主体重心，以利于攻坚格斗。弩兵也是如此，如二号俑坑中的弩兵队，四周皆为轻装袍俑弩兵，中间八路纵队则为重装铠甲弩兵俑。这种轻与重相结合的特点，对于有效地发扬战斗力具有重要的意义，二者互相补充，各用其长，既有利于灵活应敌，机动趋利；又有利于激战恶斗，攻坚克锐，是灵活性与坚韧性的统一。

综上所述，秦陵兵马俑体现了丰富的秦代军事思想，秦代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文字的兵书，但可以说秦陵兵马俑就是一部真实生动的文物兵书。

第三节　主要军事人物及其军事思想

从历史上看，秦的统一事业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战争。孝公至昭王时期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奠定了统一的基础。但这期间的一些重要军事谋略家和名将，如商鞅、张仪、司马错、范雎、白起等等，都是属于战国时代的人物。如从秦王政（秦始皇）开始谋划统一战争算起，到秦王朝灭亡，前后不过三十多年。这三十多年内成就显著的军事人物，主要有秦始皇、王翦、蒙恬等三人。

一、秦始皇的军事思想

秦始皇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是一个有巨大历史功绩同时又犯有严重历史错误的历史人物。总的说来功大于过，对我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应该给予肯定。他是统一中国的第一个帝王，不论在统一战争中、北击匈奴和南平百越的战争中以及国防建设中，他都表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不愧为一个杰出的地主阶级战略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历史文献的不足，秦始皇没有给后人留下专门的军事论著，即使是有关军事方面的言论也十分罕见。因此，我们只能根据有限的历史文献，结合他的武功和成就，对他的军事思想作些概略的分析。

（一）正确制定方略破纵攻赵，充分运用主动、有利、后发制人的策略。

秦始皇统一战争的基本方略是：先赵后楚，由西而东，由近及远，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这一方略的大部分内容是李斯、尉缭等人提出的；但其最关键的内容——先赵后楚，首先把攻击矛头指向赵国，是秦王政（秦始皇）亲自作出的决策。这一方针的实质，就是把秦国一百多年来对关东各国所实行的蚕食战略，转变为统一战略，即完全彻底地消灭关东各国的战略。其成败、利钝，主要取决于对战略全局指导的策略是否正确，能否防止在战争初期造成关东各国联合抗秦的局面。恰恰在策略的运用上，秦王政（秦始皇）表现了高度的艺术天才。首先，把蚕食战略转变为统一战略，没有操之过急，没有采取急风暴雨的形式，而是在开始阶段长期运用传统的“蚕食”形式来贯彻新的统一方略。对赵作战前后 9 年，没有一次采取长平之战的大规模形式。长平之战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立即招致了东方各国的合纵抗秦，使秦军不久败于邯郸城下，使统一事业受到一次较大挫折。秦始皇吸取了长平之战的教训，用“蚕食”的形式逐步灭赵，从而顺利揭

开了统一战争的序幕，没有在灭赵过程中招致东方的合纵抗秦，这一指导艺术是很高明的。一俟灭赵①之后，取得了全局的主动权，这才开始以空前的大规模形式展开对燕、楚、齐的进攻。

秦王政（秦始皇）在统一战争过程中，都十分注重主动、有利和后发制人的原则。秦始皇曾说："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约，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庶几息兵革。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故举兵击灭之。魏王始约服入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②秦始皇所讲的消灭六国的各种理由，都是出于策略的需要，是给自己在统一战争中争取主动、有利和后发制人制造条件和借口。实际上，消灭关东六国的方针在秦王政十年就已经确定。但是，为了给自己争得主动和有利的地位，每当灭掉一国的时候，秦王政都要找到后发制人的"理由"：灭韩，是因为韩已纳地称臣，然后又暗与赵、魏合谋叛秦；灭赵，是因为业已约盟，并归还了其人质，然后赵国又策反秦的太原郡；灭魏与灭韩的理由相同；灭楚，是因为楚国献出青阳以西的土地后又发动对秦国南郡的进攻；灭燕是因为荆轲行刺引起的；灭齐是因为齐绝交于秦引起的，等等。这些都与事物本质毫不相干，秦灭六国是坚定不移的既定方针。但秦王政非要找到一定的借口不可，恰恰说明他指导战争的策略比较高明。每灭一国都有其在当

---

① 秦王政十八年（前 229 年），秦军第五次攻赵，次年（前 228 年）秦军展开猛烈进攻，进克邯郸，俘赵王迁，赵国实际上灭亡。赵公子嘉率数百人逃往代郡，自立为代王，实为赵之残余势力。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纪事。

时看来名正言顺的理由，这样就可以师出有名，既有利于动员己国的军民，又有利于麻痹敌国和邻国，从而减轻敌国军民的抵抗程度，并不易招致关东各国的合纵抗秦。正是这一策略的运用和开始阶段对赵的“蚕食”作战，才保证了统一战争全过程中的各个击破，顺利成功。由此可知，处于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寻衅伺机制造理由，后发制人，发动进攻，从而争取更大的主动和有利，这是秦始皇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推行“强本弱末”①、内重外轻、依托关中威制天下的战略。

统一中原之后，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的措施，如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拆毁原关东六国的城池险阻，销毁部分兵器，把全国绝大部分武装力量控制在中央手里，派驻于关中和边防地区，各地郡县只掌握很小一部分兵力。这一切都是强本（中央）弱末（地方）、内（中央）重外（地方）轻的体现。当讨论这一战略决策时，李斯提出：“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② 秦始皇完全赞同这一意见，他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③从此在我国历史上开创了空前统一的局面。秦始皇维护这一统一局面的根本战略思想，就是雄据关中，东向以制天下，这是自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以来就长期坚持的基本战略思想。贾谊在《过秦论》中就曾指出：“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

---

① 此处“强本弱末”，意为加强中央的军事、政治力量，削弱地方军事、政治力量，不是指经济上的重农抑商。参见王安石文集《王文公文集·周秦本末论》。

②③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纪事。

囊括四海之志，并吞八荒之心。”正是遵循这一战略思想，秦军历经一百多年的战斗，终于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在这一百多年的战斗历程中，关中的特殊战略地位，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①。具有“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②，“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③ 的有利形势。正如贾谊在《过秦论》中所说：“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穆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在秦国的历史上，随着国力的增强、秦军的东进，政治中心曾多次东移。但秦始皇在东灭六国之后却没有像他的先人那样进一步东迁首都，其奥妙就在于关中地区的特殊战略地位。他完全明白，以关中为根据地夺得了天下，还必须以关中为根据地巩固对天下的统治，所以才确定了“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④、都于关中而制御天下的战略思想，这是秦始皇的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这一战略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但后来由于开发边疆用兵过急、过多，边防建设急于求成，反而造成兵力部署上外（指南、北边防）重、内（指关中和中原）轻的局面，这是在秦末导致秦王朝在军事上迅速崩溃和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失败的教训，并不是上述强本弱末、内重外轻、依托关中威制天下的战略思想本身带来的，而是贯彻执行过程中的问题。上述战略思想是秦始皇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秦王朝初期贯彻执行是很成功的，对于维护、巩固、发展统一的秦帝国具有积极而重大的意义；后期贯彻执行的不利，关键在于边防用兵过多，忽视了对中原地区实行强有力的控制。

（三）坚决进攻与积极防御相结合、开发边疆与建设边疆相结

---

① 《史记·留侯世家》。

② 《读史方舆纪要·陕西方舆纪要序》。

③ 《汉书·娄敬传》。

④ 贾谊《过秦论》。

合、边防建设与内地建设相结合的思想。

秦始皇后半生的主要精力，大部分用在了经营国防上。在这方面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为我国建立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奠定了历史基础。他建设国防的方针、原则，是其军事思想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历史上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西汉时期的国防思想，就是在秦始皇的国防思想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起来的。秦始皇的国防思想，首先表现在坚决进攻与积极防御的结合。对于匈奴这一强大的游牧民族，秦始皇一开始就采取防御方针，命蒙恬率重兵长期屯边，同时做好各种进攻的准备。后来时机成熟，准备就绪，则坚决予以军事打击，收复河南地区，解除对关中的威胁，把匈奴赶至阴山以北。接着又转入积极防御，大规模修筑万里长城，并准备匈奴来犯时再次给予进攻性的打击。这就是坚决进攻与积极防御相结合，而总的立足点是积极防御。秦始皇采取这一方针，是完全适合匈奴的特点和北方自然环境特点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秦始皇既没有能力把匈奴赶至天涯海角，也没有能力把匈奴改变成一个可以定居、从而可以长期稳定统治的农业民族。我国历代中原王朝的北部边患比较严重，根本原因是我国北部的自然条件和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在生产力没有获得高度发展，游牧民族没有定居之前，中原王朝很难在这里建立起稳定的统治，北方游牧民族同中原农业民族之间的矛盾，必然呈现出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的特点。秦始皇对匈奴采取伺机进攻与积极防御相结合、以积极防御为主的方针，这是完全正确的。正如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所说："秦始皇虽以一世之雄，并吞六国，统一中原，然彼自度扫大漠而灭匈奴，有所未能也，而设边戍以防飘忽无定之游骑，又有不胜其烦也，为一劳永逸之计，莫善于设长城以御之。"其次，把开发边疆与建设边疆结合起来，是秦始皇边防思想的又一创建。他不仅大量徙民开发建设了新秦中，重设了九原郡，沿河置44县，而且在岭南，开发与建设的成就更大。岭南与塞北不同，虽然岭南百越落后于中原，但其地理条件和百越人民的生活方式颇利于农耕，既能够开发，也便于开发，又

可以建立起巩固稳定的政权。因此，秦始皇进军和开发岭南的决心异常坚定，不仅平定百越，设置南海、桂林、象郡和闽中郡，而且修筑新道，开凿灵渠，并大批移民岭南，全面发展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使开发边疆和建设边疆紧密结合在一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历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再次，把边防建设与内地建设结合起来，这是秦始皇国防思想的又一个重要方面。诸如大规模地修建驰道和直道，大规模地建立战略储备体系，等等，使边地与内地和首都紧密联成一个整体，有雄厚的人力、物力支援，有严密的城、塞、亭、障作屏蔽，从而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空前强大而统一的国防，直至秦亡，未有边患发生。当然，秦代由于国防建设操之过急，用兵过多，人力物力消耗过大，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个问题，正如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所说："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代的国防制度是好的，秦始皇的国防思想是积极的，但国防建设必须和国力相适应，操之过急，好事就会变成坏事。

以上就是秦始皇的主要军事思想。他虽然未曾直接率兵作战，也没有著书立说，但在战略思想和国防思想方面，都有很大的创建，加以他在其他方面的历史功绩，被后人称为"千古一帝"①、"千古英雄"②，是当之无愧的。

二、王翦的军事思想

王翦是秦时频阳（今陕西富平东北）东乡人，"少而好兵"③，经过长期战争实践，成为智勇双全的优秀将军。秦王政（秦始皇）十一年（前236年）他率兵伐赵，夺取了阏舆等九城，顺利地揭开了秦统一战争的序幕。秦王政十八年（前229年），他再次

① 《藏书·世纪列传总目》。

② 《史纲评要·后秦记》。

③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大举率兵攻赵，在秦将杨端和等配合下，经过一年多战斗，灭亡了赵国，“尽定赵地为郡”①，从而给统一战争的胜利发展奠定了基础。秦王政二十年（前227年），他率兵大败燕、代联军于易水之西，进而攻拔燕都蓟，基本上灭亡了燕国，燕的残余势力逃至辽东。秦王政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前224～前222年），王翦统率60万大军灭楚，经过三年苦战，消灭了楚军，灭掉了楚国，平定了楚国各地，并乘胜平定百越部分地区，给尔后秦军大规模进军岭南创造了有利条件。秦灭六国的战争，实际上最主要的是同赵、楚两国作战，赵军的战斗力很强，楚军的实力最为雄厚，解决这两个强敌，完成统一战争中关键而艰巨的任务，都是由王翦率军承担的。秦灭六国，王翦实灭其三，在整个统一战争中功居第一，无与伦比。因此，在统一中国的事业中，王翦是个做出了巨大历史贡献的人物。

王翦的军事思想，最出色的特点是知彼知己，老谋深算，量敌用兵，因敌制胜，尤其善长于后发制人。灭赵战争是整个统一战争打开局面的关键。赵军不仅战斗力强，而其统帅李牧更是个与王翦棋逢对手的名将。李牧曾大破匈奴，威名远扬，又曾屡挫秦军，使秦军望而生畏②。在这种情况下，王翦没有和李牧正面硬拼，而是在两军相持之中，暂缓进攻，采取先除其将，后破其军，再灭其国的方针。他不惜用重金收买赵王的宠臣郭开，散布李牧与秦联合反赵的流言，致使赵王杀死李牧，临敌易将，军心涣散。王翦遂乘机发起猛攻，不到三个月就消灭了赵军主力。接着攻克邯郸，俘虏赵王，平定赵地。这是后发制人的一种形式。攻燕则变换为另一种形式。首先屯兵中山，威临燕国，但不发动进攻。燕国在恐惧之中，不得不把燕、代联军集中于易水之西，以图固守。

---

①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② 参见《资治通鉴》卷六，秦始皇十五年纪事：“王大兴师伐赵，一军抵邺，一军抵太原，取狼孟、番吾；遇李牧而还。”胡三省注：“秦军畏李牧，不敢战而还”。

当敌军主力集中之后，王翦突然以优势兵力发起猛攻，消灭了敌军，并乘势攻克燕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历史上赵军曾多次大规模围攻燕都，均未得手，王翦所以能顺利成功，就是因为他首先把燕军主力调动至易水之西，引其出洞，聚而歼之，从而避免了钝兵坚城。这也是一种后发制人。灭楚作战时，王翦把后发制人的战术发展到了更高的水平。他根据楚国地广、人多、兵众、实力雄厚的特点，提出非用60万人不可。秦始皇不肯相信，派将军李信率20万人灭楚，打了败仗，这才采纳王翦的意见。王翦率60万大军攻楚，其规模是空前的，但他并不恃兵多而发动猛烈进攻，也是后发制人，以逸待劳，伺机破敌。楚将项燕率领全部楚军来抗击王翦，王翦却按兵不动，固守不出，并与士卒同甘共苦，加强训练。王翦以优势兵力与敌相持，且不深入敌境，后勤保障又很方便，这自然对楚军不利。楚将项燕求战不得，持久不利，乃不得不引兵东撤，以图在机动中另寻战机。但是，王翦乘楚军撤退之机，突然发起猛烈攻击，大破楚军，穷追不舍，直至蕲南，杀死项燕，全歼楚军主力。接着平定楚国各地，俘虏楚王负刍，并南征百越之君，取得秦统一战争中最大的一次胜利。

在历史上后发制人往往是弱军战胜强军的一个重要手段，如春秋时的齐、鲁长勺之战就是这样。但王翦却在拥有极大优势兵力的条件下，善于后发制人，并针对各种不同的敌情，运用各种不同的后发制人的手段，使自己的战胜攻取建立在更加扎实、可靠、稳妥、顺利的基础之上。这是王翦在军事上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值得兵家研究和探讨的。

三、蒙恬的军事思想

蒙恬出身于将门。他的祖父蒙骜在秦昭王时官至上卿，曾多次击败韩、魏、赵、齐等国，为秦国夺取大片土地，是仅次于白起的名将之一。蒙恬的父亲蒙武也是一著名将领，在灭楚作战中担任王翦的副将，随王翦破楚军、杀项燕、虏楚王、征百越，立

下很多战功。蒙恬少时曾学习狱法，作狱官，典文学，相传写字用的毛笔即蒙恬所创制，实乃善于“开思运巧”的聪明之人。秦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 年），也就是统一中原战争的最后一年，“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①，与王翦之子王贲一起，参与了统一中原的最后一战——灭齐之战，顺利地攻克齐都临淄，降服齐王建，平定齐国，结束了秦始皇统一中原的大业。在这次作战中蒙恬崭露头角，因功“拜为内史”②。但蒙恬并没有回京师做内史的高官，而是继续过戎马生活，率领数十万秦王朝的大军，北防匈奴，缮修长城，驻军上郡，保卫关中和咸阳。秦始皇三十二年（前 215 年），蒙恬奉命率 30 万大军北击匈奴，一举收复河南地；次年又渡河取高阙，攻占阳山、北假，把匈奴赶至阴山以北。接着，蒙恬指挥数十万军民，大规模修筑万里长城和著名的军事交通——直道，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之一。自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天下，到秦始皇三十七年去世，蒙恬一直是数十万秦军主力的统帅，曾先后“暴师於外十余年”③，“威振匈奴”④，深得始皇信任。他是秦王朝最强盛时期的最重要的军事人物，对秦代国防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秦始皇死后，蒙恬被赵高、秦二世杀害；随着蒙恬之死，秦王朝也开始走向灭亡。

蒙恬的军事思想，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在作战指挥上，他十分善长于侧面攻击的战术，往往采取突然袭击的形式，抓住敌人的要害和弱点，一举突破，速战速决。灭齐之战时，正当“齐王建与其相后胜发兵守其西界”⑤，主力西调，国内空虚之际，王贲和蒙恬却从燕南发起攻击，从侧面直插齐都，“猝入临淄”⑥，使齐军来不及调动和抵抗，齐王被迫投降，遂平灭了自春秋战国以来长期号称强大的齐国。这种战术，战国中期的孙膑曾在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中两次使用，两次都以奇

①②③④ 《史记·蒙恬列传》。

⑤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纪事。

⑥ 《资治通鉴》卷七，秦始皇二十六年纪事。

袭大梁为手段，取得了调动敌军、歼敌主力的胜利。蒙恬、王贲则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战术，以奇袭临淄为目的，取得了迫降齐国的全面胜利。这种战术，蒙恬在北击匈奴的战争中也运用得很好。正当匈奴主力远在阴山中部之时，蒙恬率30万大军突然侧击其右翼——河南地区的匈奴势力，一举收复河南地。接着，当匈奴主力在头曼单于率领下企图夺回河南地时，蒙恬又从侧翼发起攻击，攻占了阳山、北假一带。头曼接连失利，不得不率部远徙，撤到阴山以北。这就是蒙恬运用侧击战术得到的胜利。

（二）在边防建设方面，蒙恬和秦始皇一样，注重积极防御。这里的所谓积极防御，着重体现在能守、能攻这两个方面。蒙恬坚决贯彻执行秦始皇的意图，不惜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修筑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使秦军守有所据、防有所依，限制了匈奴骑兵的活动，形成一强大的防卫屏障，整个北部边防有了安全感。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蒙恬奉秦始皇之命，亲率重兵长期屯边，能攻能打，随时准备歼灭来犯之匈奴骑兵，使匈奴被迫北却七百余里，不敢南下。把能守能防和能攻能打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这就是秦始皇和蒙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积极防御的思想。这一思想，在秦代得到了完全的实现和成功，奠定了我国历代边防思想的基础。

秦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大统一的王朝，虽然它的寿命很短，但却创立了我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的一系列基本制度，因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它所从事的统一战争，它所建立的统一军队和统一的国防，在我国军事史上都是光辉的篇章，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给我国二千多年中封建社会军事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借鉴。秦王朝灭亡后，我国历史在曲折的道路上继续前进，我国的军事史也翻开新的篇章。

后　　记

研究秦代军事史，迄无专著。本书初为草创，谨就正于海内外同仁。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三易其稿，先后得到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部长谢国良同志、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中国古代战略研究室主任吴如嵩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李祖德同志和军事科学出版社编辑同志的指导、审查和斧正。在此深致诚挚的谢意。

霍印章

1993 年 2 月 16 日于北京